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邁向自由經濟之路

匈牙利社會主義制度的轉向



自由主義
名著譯叢

János Kornai / 著
王健全、黃美齡 / 譯

【作者簡介】

雅諾斯·科奈 (J. Kornai, 1928~)，匈牙利最著名的經濟學家，雖在匈牙利取得博士學位，但對西方經濟學也有頗深功力，亦曾任教於英美多所重要學府。科奈堪稱是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泰斗，他的學說深深影響中國大陸青年學子，在舉世一片由共產邁向自由經濟潮流中，科奈的主張更顯現其重要性。

達流出版公司

自由主義
及實踐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Copyright © 1990 by János Kornai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1994 by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自由主義名著譯叢①

邁向自由經濟之路——匈牙利社會主義制度的轉向

原書名 /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原出版處 / Raszter-Print Ltd.

作者 / János Kornai

譯者 / 王健全、黃美齡

校訂者 / 吳惠林

發行人 / 王榮文

出版者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02) 365-3707

傳真號碼 / (02) 365-8989

發行代理 / 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 (02) 365-1212 傳真號碼 / (02) 365-7979

著作權顧問 / 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 / 王秀哲律師 · 董安丹律師

排版 /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1994(民 83)年 6 月 1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20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 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2270-1 (原文版 ISBN 963-02-8710-2)

邁向自由經濟之路

匈牙利社會主義制度的轉向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János Kornai / 著
王健全、黃美齡 / 譯

目 錄

譯 序／王健全

校訂者的話／吳惠林

前 言／Lal Jayawardena

美國版序

中文版序

誌 謝

導 論27

第一章 所有權31

一、私人部門31

二、政府部門45

三、兩個部門比例的變動：私有化的過程60

四、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關係70

五、其他形式的所有權71

六、結論：雙重經濟75

第二章 穩定化的手術81

一、停止通貨膨脹82

二、恢復預算平衡89

三、總合需求的管理104

四、合理價格的形成108

五、統一的匯率和可兌換性之引進	114
六、爲什麼要同時進行?	117
七、人道主義和經濟的儲備存底	120
八、國際環境中的穩定化手術	122
九、消除短缺的經濟	126
十、手術和復原	130
第三章 從政治觀點看經濟轉變的工作	137
一、計劃的接受性	137
二、緊張關係的來源	145
三、強勢政府之必要性	155
後 記	161
參考書目	163

譯 序

隨著柏林圍牆的倒塌、蘇聯的瓦解，整個東歐的社會主義世界進行著一場巨大的變革，企圖由政府高度管制的封閉體系，改造成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但是，目前若干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產生了高度的通貨膨脹、失衡的政府預算及資源的錯誤配置等後遺症，到底其改革過程出了什麼問題呢？

科奈教授在本書中剴切地指出匈牙利經濟自由化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在管制的經濟體系下，臃腫而又缺乏效率的國營企業，吸收了過多的社會資源，也因而排擠了私人部門的發展。

第二，他認為引發通貨膨脹的主角是政府，尤其在管制經濟下，政府對物價、工資、信用體系等方面的影響力，遠甚於資本主義體系，更助長了通貨膨脹；加上社會主義政府為了彌補國營企業的赤字，不斷增加鈔票的發行，以至於通貨膨脹一發不可收拾。

第三，政府推行的只是「半調子」、「枝節」的改革，這種局部小變動導致政策缺乏一致性，不但無法解決目前的難題，反而加深了問題的嚴重性。同時，廠商、人民的舊價值觀裡，普遍缺乏利潤、競爭觀念，無法適應遽變中的社會。

因此，他指出，所有邁向自由經濟的改革措施(如停止通貨膨脹、恢復政府預算的平衡及價格自由化等指施)，必須「整套」而且「同時」進行，

而不是僅進行局部小變動。此外，不只要尋求典章制度或經濟措施的變革，也要在思想上有革命性的轉變。

嫻熟東歐計劃經濟，而又長期浸淫西方自由經濟學的科奈教授，對匈牙利經濟改革的觀察不僅透徹，提出的政策建議更是中肯而具可行性；不但足以成爲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借鏡，其中若干觀點也可以爲臺灣經濟自由化的努力提供相當的啓示。

王健全

序於台北市

校訂者的話

到底哪一種「制度」最能增進人的福祉？這是一個自古以來就困擾著人類的重要課題，隨著經驗的累積及各家言論的辯難，簡單地形成「自由」和「共產」兩種極端體制的選擇，而在近數十年的激烈變動後，似乎已有比較明確答案。以往實施共產主義的東歐諸國、蘇聯，甚至是中共，都不約而同的拋棄既行的共產而走向自由經濟。這是人類的一頁血淚經驗史，至少在經濟學理上，提供了一項彌足珍貴的素材，讓研究制度轉變的學者有了豐富的真實資料。

雖然由共產轉向自由的方向甚為明確，但應以什麼方式、何種速度轉變，而且到底要抵達什麼樣的自由經濟境界，卻是沒有標準答案的開放難題。過去十多年來，生活在西方自由經濟體系中的專家們，曾接二連三的提供不少藥方，但似乎往往有著隔靴搔癢的苦處，如果能兼具自由經濟學理且生長於共產世界的學者，也許事情會好辦些，而匈牙利的科奈就是這麼一位難得的人物。

多年來科奈已有不少著名的學術論著，即使在西方的學界，科奈也具崇高地位。在目睹匈牙利處於空前變局，而且展現無窮新希望時，科奈毅然決然的提出「一整套」改革策略。大體上他較傾向於「長痛不如短痛」的看法，也就是像弗利曼的治療法，弗利曼曾以「既然要斬狗尾巴，與其一段一段的斬，不如一次斬斷整條，痛苦較低」。這裡，重點是痛苦的程度的比較，亦即「支付成本」的大小，不可能會有「不

需成本」就能轉變成功的便宜事。在此理念下，科奈端出了整盤的菜，他自信滿滿地認為，在幾十年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以及瞭解該制度是如何運作後，以一個活生生事實的觀察者和分析家寫下這本小書，在充滿「神聖使命感」的心態下，對其政府和國會提出改革建言。

本書份量雖不多，而且是作者在短時間寫成的，但並不表示急就章，反而因其淺顯易讀，以及言簡意賅而較能發揮影響力。本書對研究大陸經濟者也將是極具參考價值的讀物。

在遠流的《自由主義名著譯叢》系列裡，本書與米塞斯那本《反資本主義的心境》應屬同類(篇幅少而易讀、易懂)，不同的是，本書具有「實用」價值。除了一般讀者外，政策制定者更不可錯過本書。

吳惠林

1994年4月於台北市

【作者簡介】

吳惠林，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研究，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台灣大學兼任教授。

前 言

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所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簡稱WIDER) 在聯合國大學的贊助之下, 於一九八四年在芬蘭的赫爾辛基成立。該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 提倡全球性的與政策迫切相關的發展問題之研究, 以及不同國家在其國際環境背景下所產生的問題之研究。我們的研究中有一個很明顯要優先探討的論題是, 對社會主義制度政治經濟的權威分析, 這是由畢生從事這項問題之研究, 且聲名卓著的科奈教授的觀點來瞭解。當他在赫爾辛基當詹姆斯·麥當勞傑出學者 (James S. McDonell Distinguished Scholar) 時, 我很幸運地能說服他撥出部份的時間, 來作一份對社會主義全面的研究, 這可能需要花上好幾年密集的工作。這份工作還在孕育當中, 但是一九八九年後半年, 東歐事件的壓力已經迫使分枝另行成長——即本書的誕生。有時候全面性的研究讓路給能夠以決定性的方式幫助影響政策, 更為通俗、熱情的路線是必要的。

科奈教授的著作最明顯的特色是, 提出目前困擾著匈牙利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令人耳熟能詳的問題, 必須「同時」解決的論點, 因為這些問題迄今已被有力地證明無法個別解決, 例如總合需求持續超出總合供給、國內貨幣的超額窖藏 (overhang)、通貨膨脹 (公開的或被壓抑的) 和物質短缺、高估的匯率、通貨的不可兌換、失衡的預算、無法獲利的公營企業、廣泛的消費者和生產者補貼、相對價格的錯誤

結構，以及普遍性的資源錯誤配置。僅是列出這些問題就可以看出，這些問題也是許多開發中國家所固有的，此一事實使得科奈教授的作品有更寬廣的關連性。

在許多國家裡，穩定和總體調節的任務與整個社會和政治結構的改變有很密切的關連，首先是要在財產關係上作改變。科奈教授一生都提倡採用整「套」的改革措施，而不是只進行一些小變動卻反而造成了許多不一致和矛盾。這種哲學是他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分析，和對「市場社會主義」實驗之批評的邏輯結果。至於總體穩定方面，他建議用大手術。關於所有權關係的轉變，他力促採革命性的過程，這種過程可以經由適當的政策來加快速度。科奈教授和許多批評傳統的穩定和調節計劃的其他分析家都辯稱，如果資源許可的話，調節轉變上的痛苦，可以利用對學童和領養老金這些特別受到影響的團體之保護而得以減輕。不過，這必須是在中斷扭曲價格的補貼，並代之以定額補助，或學校書籍和基本配額的代用券的限制下，才可以進行。

雖然每個國家首先必須倚賴本身的人力和實體資源，外來的資源也是非常需要的。波蘭進行類似這裡所提倡的穩定計劃，就得到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其他政府機構充份的外來援助。其他國家在轉型和總體穩定的過程中也有類似的需求。本書所描寫的這種手術，需要比平常國際金融機構所能提供的還要多的實質外來資源。

對於非洲和拉丁美洲好幾個目前正經歷持續的超級通貨膨脹和其他的總體失衡現象的地區，如果能得到適當的外來經援後採取適當的行動，那麼科奈教授的處方可能會大大改變這些國家的前景。事實上，社會主義和開發中的國家可以創造必要的國內環境，以有效地吸收目前日本和德國的貿易收支盈餘，在國際局勢和緩的氣氛下，美國和其

他國家已經不再需要將之用於軍事建設。

由於科奈教授鼓吹全面性的做法，因此對於社會主義和開發中國家的決策者而言，本書應該是必讀之物。

Lal Jayawardena

1990年2月於赫爾辛基

美國版序

本書原來是為匈牙利的讀者而寫的。我受邀為未來幾年的經濟政策提出一些建議，以做為一九九〇年春天自由選舉之後所組成的新國會和新政府的參考。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演講時，與會的有好幾個反對黨的經濟專家，以及和當前政府一起運作的國營公司的一些官員和經理人員。目前這本小書的手稿便是出自這次演講的筆記。

我有自信，這裡所提到的核心觀念，不只適用於匈牙利，也適用於所有由社會主義政權轉變為自由經濟的國家。但是，在指出這群國家轉型的共通性之前，有數言是關於匈牙利情況中獨一無二的特色，必須率先提出。

在一九八八～八九年劇烈改變之前，有一長串非常重要的事件。我們必須從一九五六年的革命說起，這個革命建立了儘管只維持了數天的多黨政治體系，但表達了人民轉向真正民主的政治意願。革命結束於蘇聯坦克的入侵，接下來幾年是殘酷的壓制。在反抗的中樞被打散之後，極權控制漸漸地鬆懈下來。匈牙利成為消費者導向之經濟政策（西方稱為「Goulash 共產主義」）和緊縮政策的獨特混合物，國營企業更具自主性（本質上為「市場社會主義」），在它們經營的事務中有成千的干預，僵固的中央控制和自由市場，以及對私人財產和私人活動更為容忍也更多官僚限制的態度。這些特性構成的混合物，在政治圈中存在著同樣的不明確：雖然官方上維持共產黨的政治壟斷，但是對於與

盛行的政治結構和主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持反對態度的人，又有一套不可預測的可容忍和不可容忍之混合做法。

自一九五六年起這一段漫長的歷史裡，可以看出匈牙利首先致力於改革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接著，在一九八八～八九年之後，踏出改革的限制，在整個政治和經濟體系上展開了非暴力革命性的轉型；而在這些行動上，匈牙利都扮演著先鋒的角色。誠如這本書美國版的副標題所指出的，我們所處這個轉型的時代，是要促使東歐國家脫離社會主義制度。當這些改變的時機成熟之際，就某些意義而言，匈牙利比東歐的其他國家做了更好的準備。在當權的共產黨之內，有一具影響力的小派系致力於朝向民主和市場經濟之轉變。有某些有組織的政治團體可以提出道德權威，和他們過去做為異議份子奮鬥所得到的經驗；有些知識份子已經證明了他們思想的自主性；還有些歷史悠久的政黨回復到史達林主義以前的時代。在經濟上，企業和私有財產已經存在，雖然還被限制於相當狹窄的領域。匈牙利社會的轉變不必從一無所有開始。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其他東歐國家也具有的一些共通的基本特性。當本書的初稿以匈牙利文寫作時（1989年9月），波蘭和匈牙利是唯有的兩個正式廢除共產黨政治壟斷的國家。今天，在撰寫本文時，東德、捷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都已加入相同的行列，南斯拉夫也可以見到類似的發展。雖然這些國家在歷史、文化、當前的政經情況，都有顯著的差異，但是也都有著明顯的共同特性，在未來幾年他們也都會有類似的困難。

公共部門在所有這些國家中都扮演著壓倒性的角色，因此，如果他們想要朝著經濟私有化的道路前進，必須克服類似的障礙。雖然有

些只是真正市場機能的零星要素，但是典章制度、法律支持，以及同樣重要的運作良好的自由市場的文化和倫理，也尚未發展出來。價格、利率和匯率都受到扭曲。這些國家都是屬於小型開放的經濟（small open economies），也就是和國外有非常廣泛的貿易關係，迫切需要成爲世界經濟有機體的一部份，但是，其產品的組成和品質標準還完全不能符合世界市場的需求，龐大的官僚體系滲透到經濟有機體的每一個細胞，縱使不同的東歐國家比例有所不同，相似的疾病都弱化了它們的經濟：真實產出和消費的停滯或蕭條，公開或壓抑的通貨膨脹、長期的短缺，以及大部份國家都有的龐大外債負擔。社會的緊張威脅著社會的平衡。在大部份的例子中，工人都不滿爲了穩定的緣故，要求他們長期忍受犧牲，愈來愈多的人陷入貧窮；同時，以前政權所選出來的科技官僚、官僚和管理人員則害怕「護身符的改變」。

本書回應以下的問題：在以上這些情況下，未來兩三年所應該追求的經濟政策是什麼？答案依照匈牙利的情況而有所調整，如果這項政策的基本原則或權變做法要應用到別處，必須特別注意特定國家的狀況。當然，東歐其他小國家的情況非常類似於匈牙利。但是，即使在這些個經濟體系中，也無法機械地模仿他國的政策，這麼做的結果可能反而是有害的。

當我在寫作的時候，蘇聯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帝國的情況，和目前東歐的情況非常不同，但是，在許多方面類似於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蘭一九八九年劇變前的情況。我想蘇聯和中國的讀者把他們自己的情況，和近日東歐的情況加以比較，應是頗具教育性的。也許從我們目前的情況，可以看出他們未來的一些情況。研究當代東歐有助於瞭解改革社會主義和拋棄社會主義之間的差別；利用「市場社

會主義」來刺激市場和引進真正的自由市場之間的差別。

四十多年前，海耶克寫下他經典之作《到奴役之路》，指出了嚴格的中央計劃、國家壓倒性的權力，以及私有財產的廢除，也會危及政治自由。本版的書名是海耶克書名的反響，但卻是從相反的方向來考慮這條道路的第一段。我們身在東歐的人是走在一條自由社會和自由經濟的道路，我們必須學習如何克服路上的障礙。這是我們所有居住在厄爾巴島(在義大利南方)到黃海這廣大區域的人都必須嫻熟的學習過程。

我很清楚我的提議是相當具爭議性的，而且可能會遭到強烈的反對和批評。但是我相信，至少本書所討論的問題，都是在所有這些國家應該知道的主要問題之列，我所列出來的問題並不完整，但是，沒有一個可以被認為是不相干而可加以刪除的。不管喜不喜歡，這些問題都是未來幾年必須解決的。這本書並沒有為我們所有的困難提出一個奇蹟似的、普遍適用的處方。但是，其方法可以用於所有從事類似改變過程的國家。

本書的寫作是爲了說服讀者財產關係朝向私有化的轉變(第一章)，穩定化、自由化和總體調節所需要的整套措施(第二章)，以及加強這些變革的政治支援(第三章)，它們是交織在一起，無法分離的。這些工作沒有哪一項是可以不用完成其他項就能達成的。任意選擇某些目標而忽略其他的，可能將會招致與預期相反的結果，而導致失敗，並有損民主化和經濟改變的過程。就此意義而言，該計劃的好幾個部份(以及本書的各部份)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並爲改變提供一全面的計劃。這就難怪這套建議，首先嘗試以書籍形式提出這種全面的計劃，有著許多弱點。然而，這也許有助於對這些熱門話題的爭論，因爲書中所提

倡的是對全面解決之道的研究，而不是探討任意的、特定的和局部的措施。

在澄清了本研究對「東方」潛在的讀者可能的用途後，會引起更進一步的問題：那麼美國或任何其他「西方」的讀者，為什麼要對這個主題感興趣呢？「歷史的」一辭近來使用得相當隨便，常常是用來描寫國會一個小法案，甚至是一場棒球比賽，但是，真正不虛此名的事件，是由社會主義制度進入民主社會和市場經濟的轉變，在這過程中，每一人的生活都受到影響。我們有更多的理由可以期望全球的和平。雖然可能不是在最近的未來，但必然在稍後的某一階段，不再需要花費龐大的資源在國防上，因此更多的資源就可以用於其他的目的：如經濟成長、福利、科學和文化，以及對國內外窮人之援助。

除了對這個主題有一般性的興趣外，不同群體的人可能有其不同的興趣。研究共產主義制度的學者專家，必然會注意原本屬於社會主義政權，而目前正朝向其他制度轉變的國家所發生的變化。他們研究轉變過程的課表中，必然包括所有與社會主義、中央計劃和比較經濟制度有關的計劃。當然，對這個題目抱有特別興趣的人，不限於學者專家。這包括了參與國際政治形成的政治家、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外交家、國際組織的官員，以及經濟顧問。這也包括了報導這一部份世界裡的事件，並足以影響輿論的新聞記者和其他大眾媒體工作者。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擴及想要進入這些新市場的銀行家、生意人和進出口貿易商。

所有這些群體的人，都有必要瞭解東歐的新局勢。許多個別的成員已到過該地區多次，並已得到某些印象。在某些例子中，他們的理解可能是正確的，但是在其他的情形下，則可能是隨機的觀察，如果

這些團體的知識愈深刻愈平衡，則其對東歐事務的影響也會愈有效。

一個相當普遍的錯誤是過份簡化，並建議他人模仿自己的例子。訪客到達東歐時就給予保證立即成功的現成處方，「就照我們國家所做的去做，一切都會沒問題的。」也許沒問題——也許不是如此，本書一再提醒讀者，我們必須把轉變過程特別的「原始情況」牢記在心。出發點是公共所有權的支配力量，以及深入每一個事業單位、每一個家庭，以及每一個個人的數百萬隻全能的官僚體系的手。

在這些國家中，個人的主權、自治權、私有財產和私人事業、政治和知識的自由、民主的機構和法律的規則，這些理想已經被壓抑了好幾十年。這些原則唯有藉著歷史的過程才能重建和產生。這個過程可以、而且應該加快速度，但是，絕對無法在短短的數星期中完成，我們必須學習西方的經驗，但必須是有選擇性的；我們要小心區別馬上就可以遵循的例子，以及其他應用時必須經過長久演進的情況，最後必須拒絕某些完全不適用(或不值得一用)的類型、機構和習慣的例子。這些社會胡亂硬加上的人工移植，必然會被其有機體所排斥。

我們所需要的不只是在機構、制度方面，而且是要在思想上有革命性的改變。新的價值將取代舊政權幾代以來烙印人心的舊價值。讓我們只來看一個例子。西方讀者可能會覺得：為什麼本書提到如果一個人在生意上較成功，這個人有權利比別人賺取更多，這樣枝微末節的事呢？但是這種對美國人而言是不辯自明的真理，對一個波蘭人或東德人來講，一點也不是自然的事。

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在生命的每一個階段，從進入幼稚園的童年開始，到年老時退休進入養老院，一直被告以不是生意，唯有工作（更精確地來說，在公共部門企業或組織的架構下所完成的工作）才是唯一合法

的所得來源。他被教以某些不平等是可以容忍的，甚至可能有助於提供人們物質的誘因，但是不應該有「太多」的不平等。從來沒有人告訴他，違反這項原則最驚人的，是那些具有特權的精英份子，因為他們的特權是如此地小心隱藏，不讓公眾發現。現在，雖然開始了新的時代，但是許多不同政治團體的人，甚至在強烈反共運動份子中，都還有人處身於這種極端平等價值的前教義的魔力之下。他們認為獲利和高所得是不道德做法的結果，而投機和貪圖暴利自然是不可接受的貪婪象徵。

我的目標不只是提出有關消除通膨和短缺，以及緩和負債負擔的實用建議，也要表明實際政策建議和深層的價值與哲學之間的關係。無庸贅言，本書並不代表東歐人人所共有的哲學和道德觀念。書名指出了中心思想是自由。這是採自由主義思想的方法（所採用的自由這兩個字是根據歐洲的傳統意義）。書中所強調的是對自主、自決和個人權利的尊重。因而，其所倡導的是國家活動範圍應縮小。書中大聲疾呼反對國家父權的角色，反對把公民看成是無助的兒童，需要由聰明（或愚笨而殘忍）的政府來保護。書中建議公民應該自己站起來，靠自己的力量和動機。也許稍後我們可以考慮政府的角色，但是，現在在改變一開始的時候，人們已經受夠了國家過度的干預，和官僚體系極權的力量。也許歷史前進的方向不是一條直線而是有如鐘擺，是無可避免的事。在盛行大政府幾十年之後，現在也許是大步朝著小政府邁進的時候了。也許以後的世代能夠想出更為中庸的做法。

此時，也許是解釋出現於本書書名的「自由經濟」這個概念的時候了。自由經濟當然是市場經濟，但是其中的概念更為豐富，不只是指經濟活動的主要協調者是一特定的機制，即市場這一事實。自由經

濟允許不受阻礙的進入、退出，以及在市場上公平競爭。自由經濟的概念也隱含了財產權的某種架構，以及某種制度和政治的結構。這個制度促進私有財產的建立和保有，並鼓勵私有部門提供最大的產出。這個制度鼓勵個人的動機和企業家精神，將這種動機從過度的政府干預中解放出來，並由法規來加以保障。自由經濟蘊含於民主政治秩序之中，民主政治的特色是政治力量和信念可以自由競爭。假設我有自己的價值系統，這些自由的保證就有相當高的內在價值，並且在經濟的決策上應享有最高的優先權。

我對東歐未來的發展沒有任何預言。到目前為止，我在大部份的作品中都是集中心力在探索現存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並詳述解釋性的理論；一項正面的解釋性理論應該是具有預測的力量。本書的目的則不同，我並不是要試著回答未來東歐國會的角色會是如何的問題，而是其角色應該如何的問題。可能有些議員倡導地方或局部的利益，也可能有腐敗的事情發生，或是因為缺乏專家阻礙了國會監督的效率，等等。然而，本書所倡導的是，自由選舉產生的國會，在檢查行政活動和監管政府所擁有的龐大國營部門上，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有一部份的目的則是教育性的。我想要向未來的議員建議，他們要注意到國家的責任，不只考慮狹隘的地方利益，而且不要向壓力和威脅低頭。

如果有人要我提出預測，我會承認，最近的未來極有可能產生劇烈的工資變動、鬆散的工資指導原則，以及貿易聯盟運動上的民粹主義和煽動行爲。但是本書力促：不要走那條路！因為這麼做是在傷害勞工長期的利益，勞工長期利益需要的是嚴格的工資原則以求穩定、快速調節因應外貿的需求，以及最終的加速成長。這是社會上各階層

——包括藍領工人——開始穩定增加實質消費唯一安全的方式。

匈牙利版原來的書名是《匈牙利經濟轉變過程之熱情手冊》，本書並不是要充當「技術」手冊之類的教學書本。這是訴諸讀者的理性和情感，描述在行動上、制度上和價值上所需要的改變為何。我相信我的建議不是不切實際的，考慮目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這些建議應是可行的。但是成功與否，則有賴於東歐內外所有參與其事的人之意志，以及是否能百折不撓地克服擋住通往自由經濟之路的許多障礙。

中文版序

我很高興這本書的中文版已經準備付梓。這本書是在一九八九年秋天最先以匈牙利文刊行，至今已有五年的時光。這本書一開始就引起我的國家匈牙利以及其他各地（中文是本書第十六種發行的語言）熱烈的辯論。從真心的支持到千篇一律的駁斥，各種意見真是南轅北轍。如果我說即使是那些不同意我所說的每一點的人，也因為我的書而思考了其中所探討的問題，應該不算是誇大之辭。

這本書的子題是：「匈牙利社會主義制度的轉向」。我想中文版的讀者最先會提出的問題應是，這對於中國大陸現在正在進行的變革、或是未來一定會發生的變革，是不是也有用呢？我想我可以非常肯定地給予正面的答案。

一九八九年的匈牙利和一九九四年的中國大陸，顯然有非常大的差別。其中的一些差異容後討論，在此請讓我先強調其中最顯著的差異：匈牙利是個居民只有一千萬人的小國家，而中國大陸則是一個人口高達十二億的大國，兩國的歷史和文化傳承也有所不同。匈牙利的每人所得比中國大陸高得多，而且其經濟結構也較為進步。舉例來說，農業佔生產的比例小得多，而工業和服務業部門所佔的比例則大得多，而且匈牙利的建設也較為進步。

與本書主題最有關係的差異在於，當時匈牙利的政治結構和現今中國大陸的政治結構。起始點當然是相似的，也就是共產黨在兩國都

長時間地有獨裁的勢力。但是請容我直言，匈牙利的政治改革，即使是在一九八九年，也要比現在的中國大陸前進得多。當時，已經有其他的黨派在組成；最後，經由一黨選舉所產生的國會已經宣佈有意召集首次的多黨選舉，民主形式的公眾生活已經開始成形，而獨立於政府之外的自由新聞媒體也已然出現。我的書在一九八九年時對將於一九九〇年首屆自由選舉產生後的國會和政府，做了一些經濟政策的提議，而中國大陸則尚未到達那個階段。但是，往後在中國大陸出現類似一九八九年匈牙利的情況，也並非不可能。

同時，匈牙利和中國大陸也表現出與本書主題有關的強烈相似特徵。首先，最近幾十年來，兩國的經濟歷史非常相似，此即兩國都長時間地採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她們剛開始的時候都是遵照史達林蘇維埃模式，後來都開始放棄這種完全僵固的體系，而走上改革的道路。而她們的改革也出現共同的特徵：管制經濟被間接的官僚控制所取代；在某些限度之內，私人企業是被允許的；而與西方世界的貿易和金融關係也開放了。特別是在改革的初期，中國大陸的改革者非常仔細地研究了匈牙利的經驗，而且從中得到了不少概念。

兩國改革過程的特色都是採漸進的方式。匈牙利長時間都被東西方的社會主義和後社會主義專家認為是漸進主義的最佳典範；而後來中國大陸漸漸繼承了這種示範性的角色。

這些基本的相似點使我相信，那些主要是對中國大陸而非對東歐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有效地閱讀本書。當然，我們心中一定不要忘了差異的存在，因為每一個國家本身都是個獨特的組織，而在每一個國家之內，經濟政策永遠是和特定時刻有關的情況密不可分的。說出這種警語之後，且讓我提出一些中國大陸可以由本書得到的教訓。

(一)本書提到「市場社會主義」這個概念，這也正是許多專家現在正在探討的問題，而他們所引用的典型例子正是中國大陸。本書提出的論點是：真正的市場機制只能與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共存一段時間；但是，是呈現一種半運作、半麻痺的狀態。市場機制都會起而反抗那大而無當的政府部門、官僚凡事介入的欲望，以及政治體系所加諸的各種限制。真正相信市場的人也必須相信私人產權的擴張；雖然他們可以贊成政府在經濟上扮演活躍的角色，但是，却必須反對扼殺私人動機過多的政府作為。

(二)本書適切地調整了經濟極度快速私有化的期望。我們所做的預測是，在任何以龐大政府部門開始的體系中，政府和私人部門會繼續平行共進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是隨著私人部門的擴張和政府部門的縮減，兩者之間的比例將穩定地改變。這種長期共存的預測，已經由東歐這幾年的經驗得到證實。除此之外，中國大陸經驗所表現出來的另一種模式是複式的共存，也就是還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傳統和混合產權的形式、公有和私有制混雜在這裡面。有時候是在合法的，有時候是在半合法的，而有時候是在非法的架構之內。

(三)在我看來，書中即使用在今天也依然適切的是，與政府部門關係之警告。採用「軟性預算限制」的危險還是存在，也就是國有企業的經營在財務失靈的時候，要靠國家來助其脫離困境。這種期望破壞了生產的效率，國有企業不能以足夠的嚴謹態度來對付勞工紀律的缺陷，或是工廠大門之內失業問題的存在。國有企業傾向於過度投資和進口，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和官僚之間的各種關聯是貪污腐敗的溫床；因此，嚴格的監督是必要的。但是，管制不能只以官方的方式來運作，絕大部份的責任應由公眾來負責，最主要的便是新聞媒體。這些經驗

對於今天的中國大陸是非常適切的。但是，最終的解決之道只能將政府部門局限在一個較小的範圍之內，而且政府部門大部份的資產也應該加以私有化。私有化的過程在中國大陸才剛剛開始，要走的路還很遙遠。

(四)本書全力支持私有企業的自由。這並不是說這種自由應該沒有任何的限制。反獨佔的立法是必要的，在某些部門政府的監督也是必要的（如銀行、保險等等）。如果有一種自然獨佔居優勢，則價格必須加以管制。環境也必須以行政手段來加以保護。但是在經濟要脫離社會主義的階段，則必須強調減少官僚干預的情形。經濟需要特別大劑量的私人企業，以作為先前官僚制度麻痺效果的解毒劑，這正是本書所強調之處。光是期望私人企業數目的自動增加是不夠的；政府還必須以信用保證，初期的租稅減免，以及解除官僚障礙來積極鼓勵。這個建議似乎也與中國大陸有關。

(五)一九八九年匈牙利總體經濟狀況的特色和目前中國大陸的情況是不同的，但是即使所提出的特定規則並不適切，然而所建議的經濟政策路線也是與當今的中國大陸有關的。下面我簡單地列出這些政策：(i)通貨膨脹必須加以防範，特別是加速通貨膨脹。這不僅指超級通貨膨脹，凡是年通貨膨脹率在20%~40%之間就會有麻煩，而且在這種背景下也很難建立市場經濟。(ii)要注意貨幣供給和信用供給不可過大，因為這將引發通貨膨脹的危險。(iii)如果預算赤字變成永久的，則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傷害。這是指以發行通貨來平衡赤字，而導致通貨膨脹產生的因素之一；或是以國內債券發行的方式來彌補，而這種平衡赤字的作法將大幅排擠投資；或者可以到國外舉債，而這些負債往後會變成經濟上嚴重的拖累。本書喚起對在改革的情況下徵稅困難的

注意，因此，不斷地解除各種補助被認為是必要的。

(六)去除社會主義經濟自然是有贏家也有輸家。失業的情況會出現且會擴大；有許多人會失去他們原來的物質特權，不僅某些原先的政治精英如此，所有享受特殊待遇補助部門的員工也都將面對這種情況。這意味著需要一張「福利安全網」來防堵那些輸家在財務上的崩潰。我已經感到幫助那些變革的輸家在中國大陸也成了當務之急；這不僅是出於團結民心的人道理由，還因為不滿所造成的緊張氣氛有破壞穩定的影響。

(七)最後一個我想要大家注意的問題是：變革的政治情況。本書回顧了東歐的經驗，提到變革可以開始於共黨的保護，只要提倡改革力量的本意居於優先即可。開始的時候可以如此，但是結束時却不可以如此。為了使變革徹底地實行，為了鞏固變革，並且使之無法再走回頭路，必須要有新的政治結構。而這種新的結構是不能倚賴共產黨的壟斷力量，也不能以暴力來維繫；因為該黨的傳統雖然有些意識型態是保留先前的，而有些已加以修正，但是並沒有對私人財產的安全性給予足夠的保證。因此，擁有一個私人企業家也能利用政治代表來維護其利益的政治結構，早晚都是必要的。(譯者注：這應該就是我們所稱的民主政治。)

本書特別強調，最能適合變革的艱鉅任務的政府，是得到廣大支持的政府。不管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這個政府都應該具有聯合內閣的性格。這個政府應能在共識和不同黨派妥協的基礎下，極力維護其意志，而且也應該有足夠的合法性，讓民眾能為往後才能感受到的好處做犧牲和努力。

感謝遠流出版公司使本書能以中文和讀者見面。我特別要感謝本

書的譯者王健全先生和黃美齡小姐、校訂者吳惠林先生、主編曾淑正小姐，以及所有促成翻譯和出版事宜者。我希望所有關心脫離社會主義體系和邁向自由經濟，以及有意要鼓勵此種轉變的中文讀者都能讀到本書。

科奈

1994年5月於劍橋，

麻州—布達佩斯

誌 謝

我要利用這個機會表達對所有支持本書寫作的個人和機構之謝意。過去好幾年來，我一直在研究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這是我一項長期研究計劃的一部份。本書可以說是這項較大計劃的副產品，這計劃幾乎迫使我必須面對最近事件的壓力。我要感謝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哈佛大學、Sloan基金會，McDonnell基金會，以及聯合國大學的WIDER（在赫爾辛基），感謝他們支持我的計劃。

我也要感謝所有提供其具啟發性評論的個人。我特別要感謝給我極大幫助的Zsuzsa Dániel。我非常感謝哈佛大學的Jeffrey Sachs，他讀了匈牙利版最初的英文譯稿，並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我也由其他同仁那裡得到許多意見：Béla Balassa, Tamás Bauer, Martin Feldstein, Benjamin Friedman, János Gács, Mihály Laki和András Nagy的意見特別有幫助。

實際上，本版不只是翻譯，而是由原版得到的反應而做的修訂版。

我感謝所有協助我孕育出匈牙利文和英文原稿的人，特別要感謝我最密切的合作者 Mária Kovács 和 Carla Krüger 兩人大方而且有效率的幫助。我非常感激所有參與翻譯工作的人：Tibor Szendei, Brian McLean, Julianna Parti 和Anna Seleny.

最後，我要表達對美國出版商W. W. Norton的感謝之意，特別是Edwin Barber, Donald S. Lamm和Susan Gaustad等人的鼓勵以及

在編輯上的幫助。

科奈

1990年1月於麻州劍橋

導 論

本書不是要對匈牙利經濟發展較長期的目標加以評論。而是要把焦點放在未來幾年的重要工作，並處理三個主要的問題：所有權、總體經濟的穩定，以及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但是，我們應該強調，這三個主題沒有哪一個處理得盡善盡美，而在本研究範圍之外的好幾個主要問題也將不會加以探討。

我並不自限於只提出原始的新觀念。過去幾年，在廣泛的討論中，好些重點已經出現於專業的文獻、黨派的演講台和政治的辯論上。我的訊息中的某些部份和某些眾所皆知的觀點可能不謀而合，而在其他地方我則陳述不同的意見，甚至向某些教義挑戰。❶如果讀者發現這本書有創新的話，應該不是只在於某些部份，而應該是在於整本書，也就是在於其政策提案的特定架構，和其與基本經濟、政治哲學的關連性。

匈牙利文原版的書名是：《匈牙利經濟轉變過程之熱情手冊》(A *Passionate Pamphlet in the Cause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Hungary*)，我稱這本書為「手冊」的目的是要引導讀者注意，我不認為本書是恰當的科學研究。科學作品的主要準繩是作者的陳述可以驗證。抽象理論的作品首先出自於文字的假設，再由假設歸納為法則。這些可經由嚴格的邏輯推理來證明。其他有些情形是作者分析過去特定時段的事實，由此產生可以推導出一般化的結論。通常，人們期望研究者能把整體的

事實告知讀者，並透露導致這些事實的某種詮釋之推理。但是，唯有在純理論的領域，或是作者只論述與過去和現在有關的事實，這些嚴格的準則才行得通。

反之，那些邁入「應該做什麼」領域的人，註定要踏出定義狹窄嚴格的科學領域之外。有關經濟政策的提案，無可避免地隱含了一種政治立場，即使是來自「全職」的科學研究者亦然，因此必然會包含主觀和客觀的因素。當然，在這本書中，我也訴諸科學研究慣用的方法，也就是邏輯推理和參考事實。但是，同時，我的政治和道德價值、我個人的失望、希望和信念，也清晰可辨。我非但沒有隱藏這一點，反而選擇了在匈牙利原版的書名上用了「熱情」這個字眼來強調。

我並不希望向讀者隱藏我知識的有限。當然，有許多專家可能對匈牙利所面對的債務問題，或是黨派間會議的概括論點更有研究。但是，我希望那些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並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日常經濟和政治問題的人，能對這辯論增加一點色彩。我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位理論研究者（這裡所強調的是一般性的社會主義制度，匈牙利經濟只是其中的一部份）。我嘗試探索、並由理論來分析這個制度的特色和常規。在我早期的作品中，我曾多次嘗試把社會主義制度拿來和其他社會經濟組織，主要是與各種資本主義的現代形式加以比較。我嘗試將這初步的知識應用在這裡。

本書所處理的一些問題是廣泛爭辯的主題。也許批評家會把我的想法判斷為錯誤的。即便如此，我也不會以沈默謹慎的態度、且在表達之時就刪減了一半的方式，來解釋我的訊息，以保護自己免於被反對或攻擊。我寧願冒著因清楚明確、肯定，有時甚至是嚴厲的陳述而增添的風險，因為這樣可能促進對這些問題更透徹的檢視，並激發辯

論。

這本書不是一項預言。我並沒有追蹤匈牙利未來可以走的不同路線，或是考慮每一種可能的情形的或然性，而只是描繪出必須做的工作，並指出應該避免的路徑。讀者在第三章可以看到執行這些重要工作關鍵所在之政治條件的摘要。

最後，我們必須對本書所討論的暫時事件和變革的動力再提出一點初步的評論。有些過程必然是漸進的，但是，其他的改變必須一舉引進，即使這可能會造成不小的震撼。第二章將描述並提議屬於後者的大手術。實際上，我認為盡可能地及早實施這種單一劇烈的手術式干預是絕對必要的，這自然要看有利成功條件之創造而定。

因此，正確地決定我們議程中的每一點屬於哪一「類」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屬於必須小步進行的漸進過程，或是必須一舉執行「整套」規定中的一部份。一方面，需要一舉進行的一系列必要措施不應該拖延。另一方面，在可以、而且應該只採漸進的情形，不可尋求突然的解決之道。這種差異將會一再地加以強調。

註釋

① 本書所用的許多論點，無論是在批評政府政策、拒絕某些理念，或是建議實際措施，都已經被匈牙利或海外的許多作者提出過。但是，要給予原創者適當的功勞，則需要對辯論有更進一步廣泛的研究，以及詳細許多的參考清單。因為這件事是如此緊急，所以沒有時間做這樣的研究。於是我參考一些重點放在「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思想史的書籍和論文。在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我們共同奮鬥的程度，即使在我們意見有所不同的地方亦然。有關由社會主義轉

型這個問題繼續不斷的辯論，總結於一些傑出的研究中。在此我僅指出漢基斯 (E. Hankiss, 1989)、倫吉爾 (L. Lengyel, 1989, 他對長期以來刊行的匈牙利社會科學文獻提出了回顧性的摘要)，和萊基 (M. Laki, 1989, 他評估了反對黨的經濟計劃)。科瓦克斯 (J. M. Kovács, 1990) 則對「改革經濟學」提出了較為寬廣的國際概觀。當然，轉變的快速發展和動盪的政治生活，使得摘要無法趕上最近的發展。但是，這些研究對於不同的觀點提出詳細的參考資料，並包含必要的書目。

第 1 章

所有權

以下這節主要集中於私人和政府部門的討論。我也會論及是否應該有第三、第四等部門這個問題。❶

一、私人部門

爲了清楚起見，最好在一開始就明白說出私人部門的構成要素。以下就是這些要素。

1. 家計單位被視爲一經濟個體；家計單位內爲了滿足其自身的需求而從事生產或提供勞務。

2. 正式的私人企業，指的是符合法規而運作的企業。其規模有所差異，從一人企業到大規模的企業都有。

3. 非正式的私人企業，即生產或提供勞務的活動以及發生於私人個體間所有的交易，卻沒有取得有關單位特別的執照，或是爲正式的私人或政府企業提供生產或勞務的無照私人個體。

4. 私人財富或私人儲蓄的任何利用，從出租私人公寓到個人間的借貸。

這四個類別在某些程度上有所重疊。

雖然一般常說匈牙利整體而言是陷於經濟危機中，但是我不能完

全同意這種看法。平實的說，總體經濟層面上表現出嚴重的緊張關係和不安定，影響遍及所有經濟的進行，和所有匈牙利人民的生活。雖然最大的部門，即國營企業經營得沒有效率。但是，私人部門這一部份的經濟卻是健康的。雖然這個部門也有許多重大困難纏身，但依然是沒有掉入危機的部門。實際上，本國的經濟情況比官方統計資料所顯示的要好，這乃是因為在過去一、二十年來私人生產和私人財產有相當的發展。私人部門確實是經濟最重要的「隱藏性的穩定者」。我認為私人部門的發展是截至目前為止，匈牙利經濟改革過程中最重要的成就。

私人部門的活力，可由其在冷漠和不友善的環境中居然能夠有所發展這一事實獲得證明。著名的匈牙利作家István Örkény常被人引用的作品《一分鐘故事》中，描寫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在遭受原子彈轟炸之後幾天的情況。這個城市遭到老鼠的入侵，突然我們可以看到：「一棟房子的廢墟張貼著一張紙。上面寫著：『Varsányi太太用客戶的燻肉來殺老鼠。』」過去二十年來，我們在這裡也看到類似的事情。私人部門、私人動機和私人財產幾乎成爲一系列的國家化、集中化和沒收活動的受害者。但是，某些限制的放鬆就足以使私人活動再度欣欣向榮。只要對那些罔顧法律規定的人睜隻眼閉隻眼，就足以使通常被認爲是第二經濟的一部份的所有活動大受歡迎。

私人部門的活力最有力的證據是具有擴展的**自發性**。政府部門的組織架構、管理和協調必須經由來自上層的中央措施的人爲安排。但是私人部門一直是在草根的基礎上，不用中央指示，**藉由自身**自行發展。私人部門的各單位無須刺激、煽動或指示，即能沿著市場的路線行動，因爲**依循市場**而行動本來就是他們存在的自然模式。相反的，

即使不斷的鼓勵、甚至命令國營企業去遵循市場法則，它還是無法做到。

實際上，沒有人確切知道今日匈牙利私人部門有多大。雖然統計數字充斥，但是對這個經濟面還沒有做出任何精確的調查。根據兩三年前的一項估計，匈牙利人口花費其總工作時間的三分之一在被歸類為私人部門的活動上。②很可能在那之後這個部門又獲得進一步的擴展。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私人部門已經成長為經濟中強而有力的部份，而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議題之一是進一步的成長會不會獲得成功地推動。

今天，在匈牙利，所有提倡各種經濟理論和政治潮流的人都體認到發展私人部門的必要，但是關於這點的許多說法都相當籠統，甚至模糊。這種籠統的情況使得和這問題有關的經濟學家、政治家或黨派，保持曖昧的態度。我在以下提出與私人部門發展有絕對關係的六項具體條件。我故意清楚地強調問題，而不是含混其辭，因為兩極化的陳述可能有助於顯示不同意見的提倡者贊成或不贊成之處。

我還必須提出另一項解釋：如果這些條件真要付諸實現，在某些點上可能需要應用某些經過仔細考慮的特例，而且暫時的妥協也可能是必要的。這些特例和妥協的細節遠非本書討論的範圍。與其採用數以百計將使這些條件界線模糊的小心保留的做法，我寧願冒著使用稍微簡化陳述的危險。

1. 私人部門必須完全真正地自由化。不必要採用數以百計的新規則討論如何對私人部門的官僚管制作重大修改，或者在到底在某一點該讓步還是在另外一點該抑制之間游移不定。由相反的方向來處理這個問題可能更為方便，即給予清楚嚴格的法律條文，其原則是私人部

門在經濟中的範圍沒有限制，③例外的只是超乎經濟考慮的活動（如，禁止欺騙或暴力行動的理由完全正當）。當然，某些基於經濟考慮的法律限制也是必要的。譬如，私人部門必須繳稅，有遵守環境保護條文的義務。既然這些限制人盡皆知，便沒有必要在這裡詳述。我們所強調的是做為一種規則的基本原則，即私人部門應該完全不必面對任何禁制性的措施。④

自由化條件的實質內容並非不證自明的。實際上，這需要許多構成要件；我在這裡只列出最重要的。

- 成立公司的自由；自由進入生產體系。
- 以買賣雙方自由契約為基礎的自由價格。
- 出租私人擁有的財產之權利不受限，同樣的，租賃雙方是以自由契約為基礎。這些交易應包括自由出租私人擁有的公寓或不動產，其租金由租賃雙方自由協議。
- 如果僱主屬於私人部門（家計單位或私人擁有的公司），則在任何狀況下，僱用人員的權利應不受限。僱主和僱員必須自由議定工資。
- 累積、出售、或購買任何有價物品（如稀有金屬）的權利應不受限。
- 私人部門之間，或者匈牙利人和外國人之間，透過交易而累積、出售或購買外幣的權利應不受限。
- 攜出和帶進本國和外國通貨的權利應不受限。
- 自由的外貿活動，其中私人部門的成員進出口的權利應不受限。⑤
- 借錢給人的權利應不受限，信用條件應由借貸雙方自由議定。

- 可以自由地對其他個人的私人企業進行金融投資。
- 可以以自由價格自由買賣任何私人擁有的公寓、不動產或其他資產。

將這些條件和匈牙利目前的情況加以比較是很有價值的。本書的範圍不在於做一點一點的比較，但即使隨意的測試，也就足以顯現出阻礙私人部門自由化的數以百計的法律障礙。非正式第二經濟的存在、「影子經濟」、灰市和黑市、不可見的所得(即在非正式經濟所賺取的所得，而不是用於報稅之用)等等，都是根植於阻礙私人活動和私人財產利用的諸多限制之上。第二經濟的這種現象，大可以視為一種特別的「公民不服從運動」，這種運動是要反對不合理的法律規定和行政限制。政府未能將大部份的官僚限制加諸私人部門不過是較輕之罪惡。換句話說，政府似乎已經讓步到將這些活動視為灰色的、而不是黑色的地帶。現在是把整件事情清楚表達的時候了。

為了避免可能的誤解，我應該清楚地說明，以上所指出的所有自由，只適用於私人部門中的任一成員和另一成員做生意的交易，也就是說買者和賣者、租客和房東、借方和貸方等等之間的契約。政府或某些政府機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關連將於稍後再檢視。

讓我們來看看**外匯交易**這個例子(我引用這個議題，只是希望大家對這個例子有清楚的觀念，而不是因為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條件)。我也要明白指出我並不建議，在沒有同時考慮採取其他措施的情況下立即引進以下的措施。唯有成為私人部門普遍自由化的有機體中的一部份，外匯交易的自由化才會成功。這也就等於假設了我們將在第二章討論的穩定計劃已實施的情況。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例子。

第一項條件並沒有使得國家銀行有義務賣給持有匈牙利福林(for-

ints, 匈牙利貨幣單位)的匈牙利公民數量無限的外匯，國家銀行必須將匈牙利福林兌換成外國貨幣的情況，以及所兌換之數量這個問題，實際上應該和第一項條件分開解決。上面所提到的「自由條件」意思是，我應該有可以當著警察的面在街上賣美元的自由，以及在同樣的情況之下買美元的自由。我應該也能善意地自由在家中持有我所希望的外匯數目。我所要擔心的只是小偷，而不是警方或外匯當局。我應該有權向國家銀行出售美元購買匈牙利福林，而沒有告知美元來源的義務。如果我不喜歡國家銀行所掛出的匯率，我應該有權將我的美元賣給任何提出較佳匯率的人——這種權利也使我可以將我的匈牙利福林賣給維也納的私人銀行，或是那裡任何的個人私自以換取奧地利先令(schilling)。我也應該有權帶著我的匈牙利福林到維也納或任何其他的地方，並盡我所能購買大量的可兌換貨幣。⑥

雖然這樣的交易是法律所禁止的，但是在今天卻是普通的事。人們盡可能地避開警方，但是，即使警察看到了這種交易，通常也會視若無睹。這種曖昧的情況產生兩種選擇。第一是認真地看待法律並強制執行，第二是解除限制。我建議採用後者。

讓我們再繼續來看看外匯交易這個例子。這種自由條件如何影響了匈牙利福林的可兌換性？這種自由允許匈牙利福林和可兌換貨幣之間真正市場匯率的演變，以及每一位顧客由自己的口袋掏錢付帳的私有市場。這種條件在這裡簡化成爲**私人匯率**清出一條既不是黑也不是灰，而是雪白的道路。⑦換句話說，匈牙利福林在私有市場上應是可兌換的。這種匯率不應該由官僚來決定，而應該以真實市場上匈牙利福林對可兌換通貨的價格爲基礎。這裡的匯率應該可以表達奧地利先令或美元對**自掏腰包**付帳的匈牙利公民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之下，除

開一般的交易成本，匈牙利福林對奧地利先令的價值，在布達佩斯和在維也納應大致相同。

很自然地，私人外匯流通的合法化並沒有解決與匯率有關的基本問題。只有國家銀行體系所保證的一般可兌換性，以及單一的匯率，才能產生全面真正的、令人安心的解決之道。在第二章，我會再回到這個主題。在此，我把我的評語縮成：外匯操作的自由化是私人部門基本經濟權利一個重要的部份。

我們不應該把這些自由條件視為政府所特許的大恩惠，而應視為基本的民權，只是長久以來匈牙利的公民幾乎完全沒有享受過這些權利。雖然匈牙利公民的經濟自由隨著改革的過程有所增加，但是被許可的活動範圍依然相當有限。匈牙利所需要的不是這些有限的自由，而是真正的自由化。^⑧

2. 私人契約的強制必須以法律來保障。對於私人契約的任何違犯，應使受到傷害的公民有權訴諸法庭聽證，契約的履行應該真正是可以強制的。這將需要規模適當的司法機構、人數足夠的律師、一份現代且詳盡適當的民法體系等等。這種法律架構的運作費用應由私人部門來負擔。也就是說，私人部門應該付出必要的費用以支付民事法庭的成本，而律師費用則由律師和顧客之間自由議定。另一方面，私人活動不應該太過突出，以至於使私人契約中的一方，一開始就覺得沒有認真看待契約的必要，因為根本沒有強制個人權利的機會。

關於政府該扮演什麼角色這個時常重複的問題，有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在立約雙方衝突的時候，政府應執行正義，但不應該涉入公民間的交易。

為私人儲蓄和投資提供誘因，構成了以下四個條件的指導原則。

但是這裡所應用的方法不是說服，而是創造可以激勵私人企業家自願儲蓄和投資的環境。

3. 應該加強宣導私人財產絕對的安全性。澄清如何達成這點目標並非本書的工作。當然，保證應該包含於法律、黨派的計劃，和主要政治家的意見中。

追溯取消所沒收的私人財產，並非這方面的第一優先。除了一些特定、實際上相當重要的例外，通常無法做到，農地可能是一個例外。至於未來投資的意願，最重要的是以讓人可以相信的態度宣佈以後絕對不會再有另一次徵收。

4. 稅制不應該抑制私人投資。稅制將於稍後論及，因此在此我僅提出幾點。那些認為私人投資佔總投資比例應該增加的人，必然會同意私人儲蓄佔總儲蓄的比例也應該愈來愈大。但是私人儲蓄只能隨著個人所得的增加而增加。這即是意味著應該允許人民盡其所能賺取最多的所得。唯有在私人財富有相當的累積之下，私人生產才能增加、現代化，並提高到成功的現代大公司的水準。

許多政客和經濟學家所採取的立足點，表現出一種特別的曖昧。一方面他們抗議政府過度膨脹的權力，以及政府預算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太高。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贊成私人部門有過高的所得。但是，我們無法兩者兼得。你必須選擇：到底要抱怨什麼？

5. 私人投資以及私人資本的形成和成長必須透過信用來提升。在我看來，兩個部門「機會平等」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實際上，自從一九四九年國有化以後，機會就沒有再平等過，而今天，各個部門也並沒有被放在等高的發射台上。首先，政府部門、官僚機構、國有銀行累積了龐大的資金，而國營企業也介入其中。而且，知道該從事什麼

活動的，主要也是政府部門。我們怎麼能夠期待私人部門和這龐大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力量之間能夠有平等的機會？

立法也應於政府每年計劃的架構內決定保留給私人部門的信用佔經濟總信用供給的大小。這一部份的大小應該包括每一種信用型態擁有兩三種基本信用配額。譬如，決策應該明示，下個會計年度政府銀行部門將把總投資信用中多少比例分配給私人部門。保證政府部門想要從私人部門吸收這些配額的強烈企圖無法達到是很重要的。⑨如果政府的這項動議先於國會，強調的重點必然要從偉大的修辭轉移到具體的數字這個層次。要決定的具體議題是，投資信用中到底是百分之五、二十五、五十還是其他比例應歸於私人部門。

雖然第五項條件是要保衛私人部門信用的權利，免得政府部門把所有的信用都吸收掉，但是絕對不是暗示信用應任意地加以分配。我們要提醒讀者：信用來源有一項是根植於第一項條件，即信用是私人部門中一個成員給予另一個成員的。此類信用的條件絕對是相當嚴苛的。沒有哪一個心智正常的人會把口袋裡的錢掏出來借給別人，而不確定是不是能把這筆債收回來。但是，國家銀行也應該訂下嚴苛的條件。信用體系的正統工具，也就是各種形式的證券、附屬擔保品和抵押都必須用上。

第四項條件要求私人部門的成員可以自由地、盡其所能地賺取最多的錢。我在此還要補述：如果他們不能償還債務的話，他們也應該負擔投資損失的風險。根據信用市場眾所皆知的型態，應該會產生不同的條件。一宗生意的出資者可能會答應相對於由投資者本身的資源所花費的金額更多的信用，條件是債務人保證以其全部的私人財富來償還債務(無限責任)。而保證並不超過私人投資數額的有限責任，應該

只能吸引到較少的信用。但是不管特定的信用條件為何，如果碰到金融困難的時候，私人企業主都應該面對破產的威脅。換言之，私人部門應該面對真正嚴格的預算限制過度的保護，或是想要讓私人部門像是純粹的標本在玻璃瓶裡「成長」，只會使這個部門和靠政府補助的國有公司一樣脆弱。

在我看來，「企業主」這個詞的使用應該嚴格地限制。任何使用國家的金錢，並要國家為其損失付出昂貴的代價的人不可以稱為企業主。企業主是指那些、也只有那些願意冒個人金錢損失的人。

6. 應發展社會對私人部門的尊重。如果用反面的說法，這項條件就更明白了：對私人部門的煽動應該停止，不管是有節制的，或是明目張膽的煽動。今天，人們對於在自家田地上工作的農夫，或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勞動的工匠，一般都有相當的敬意。人們閒言中傷的目標並不是朝向他們，而是衝著「專賣店」的業主或是私人的雜貨商等。此時是停止因出於純粹的嫉妬或人民黨的煽動，而將生意興隆的企業主標上「鯊魚」或「利己主義者」的標籤。這種原始反資本主義的態度，不合於市場的習性，市場上最理想的狀態是達成交易的每個人應該買得便宜，而賣方應該盡可能地要求高價，這完全是無可厚非的。如果買方需要商人所提供的產品，而且願意付商人所要求的價格，那麼商人的活動可以被認為是有益於社會。⑩那些買得貴賣得便宜的人做成的是不好的交易，這種交易形式整個國家都已太過熟悉，為此也已經付出了重大的代價。聰明的商人值得尊敬而不是責罵。

既然我們已經大概看過可以確保私人部門之發展的六項條件，我認為現在是對這六點增加一些評論的時候了。

最近有人爭論，我們需要的到底是可以辨認的「有血有肉」的企

業主，還是不具人格特性的合資公司。我在這裡只對完全屬於私人的合資公司的問題加以論述(政府或非營利機構所發行的股票，將於稍後詳細討論)。

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會把重點放在社會經濟的層面，而不是法律的層面。我們在追求社會轉型時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新中產階級**的發展，新中產階級的核心是由想要在社會上力爭上游的、勤奮節儉的企業主所組成。從這些中小型事業單位的業主中，終將產生經濟進步的先鋒和大企業的創建者，因為這是市場自然選擇的結果。^①稍後這些企業主身邊將圍繞著本身不參與新組織之創造、也不組織新公司，但願意利用購買股份或其他方式來投資於經濟的人。

社會主義國家財產最重大的缺失在於所有權的非個人特性：國家的財產屬於所有人但又不屬於任何人。在匈牙利正在進行的轉型中，正是強調這種矛盾的時候。我願意看到人們用自己的財富來冒一冒險；反過來說，我也願意確定他們的失敗會變成他們真正的損失。如果一位企業主能夠說服他人把錢託付給他，就這樣吧！他應該也可以自由地加入匿名合夥人，如果這些人精明的話，必定會對處理他們金錢的這個人有詳細的研究。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我們就可以看出一些私人辦公室或是仲介機構的興起，這種單位使匿名合夥人可以買賣他們的股份。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可以預期這些發展早晚都會導致真正的私人股票、真正的私人合資公司，和真正的私人股票交易之興起。

所有的這些改變都會發生在私人財產有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並不建議，也許也不可能跳過歷史發展的這個階段，雖然也許可以利用適當的措施來縮短時間。事件發生的途徑在這裡並不是對稱的。雖然我們可以利用政府的命令來清算私人部門，但卻不可能以類似的

方法來使之發展。我們在此必須把好幾十年的脫節也考慮進去。整整好幾代人都被迫忘記保障私人所有權、私人財產以及市場有密切關係的公民原則和價值。我們不能忽略這種情形，只是模仿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最精緻的法律和商業形式，不足以確保其一般應用之成功。¹² 那些想要引導非洲部落、或是亞洲落後的村莊社區直接進入共產主義的人已經做過相當的嘗試。不必要再給「大躍進」另一次嘗試的機會。

在最近的政治辯論中，突然出現匈牙利應該採用十九世紀或是二十世紀的市場經濟形式這個問題。當然，不用說也知道我想要後者。但是我們的希望和現階段的發展，以及我們的希望和改變真正的步調之間是有著很大的差距。讓我們來看看當今匈牙利私人部門真實的情況。除開一些例外，我們所找到的標準相似於本世紀初巴爾幹國家，或是目前開發中國家的情形。匈牙利和丹麥或者美國私人農民所使用的農具，有著相當大的差距。匈牙利的農民並不擁有卡車、曳引機，或是貯藏室，擁有私人的電話更是在夢想之外。讓我們來看看工匠擁擠的工廠，讓我們來看看私人部門在勞務或貿易方面是如何運作的。我們所看到的是街頭小販搖搖晃晃的小攤，和狹窄破爛的商店。整體私人活動中絕大部份還是採半合法的方式，設備不但不足，而且常常是從政府部門借來的或是侵佔來的。在許多方面，匈牙利目前的水準大大不及十九世紀末期私人部門的特色。

這不只是單純要政府定出匈牙利的私人部門何時會脫離這種悲慘、巴爾幹化、和未開發的標準，並追上二十世紀後期西方私人部門的日期就可以了。當然，我們必須加快這種發展，主要是透過符合上述之條件，我們必須把一部份政府財產轉入私人部門。但是事實上，急躁的躍進將是不合理性的。我們必須期待很久以後，不同世代的私

人部門單位，在法律形式和商業方法的現代性，以及科技稟賦彼此將有相當的差異。我們會發現，其中有些屬於十九世紀，而有些則完全跟不上時代。

這一點引到第二項評論：逐步的改變是私人部門發展的特色。利用騎兵的攻擊來制定私人財產是不可能的。中產階級的形成需要相當長的歷史過程，¹⁰在匈牙利，這個過程於一九四九年遭受巨大的斷裂，結果是延遲了好幾十年。一九六〇年代這個過程在某些領域復甦了，可見於家計單位扮演了較重要的角色，合法私人活動範圍的擴大，以及地下經濟的成長。¹¹今天，可能的情形是形成中產階級的這個過程會聚集動力。我們可以想像得出，這個過程在不同的部門將會有不一致的發展。在資本較不密集的服務部門和國內外貿易將會特別地快速。但是，即使加快這種過程，私人部門能夠提供大部份的生產，還是需要好多年的時間，很可能一個真正已開發、現代的、**成熟的**私人部門成形需要比上述過程更長的時間。¹²

我不想暗示目前的論證是要將一般的私人部門，或特別是匈牙利目前的私人部門之角色加以理想化。我相當清楚多麼容易就可以發現有些私人企業主貪婪地想要加快賺錢的速度，甚至不惜欺騙顧客或欺詐政府。他們不願意花上未來幾年或幾十年的時間，穩健誠實地建立自己的事業，而認為在最短可能的時間內賺取最大的利潤，是他們的優先考慮。這種企業主會放棄生產性的投資，而選擇顯眼奢侈的消費主義。這樣的企業主也有對顧客不禮貌的傾向，並採取一種與政府部門短缺經濟所創造出來的自大行為相似的「愛買不買」的態度。這些濫用會導致輿論反對私人部門。因此就形成不分青紅皂白的公眾情感，對於完全只靠公平的方法來擴張事業的誠實、勤奮和節儉的私人企業

主也採取不公正的嚴苛態度。

當然，我們可以利用更進一步的教育，以及推廣公平交易，節儉和長期的生意行爲，私人部門的組織和企業聯合也應該對違反道德的做法採強烈的態度。法律規定是必要的，其中包括目標在消滅競爭對手的卡特爾措施，以及禁止勾結、壟斷和不公平競爭。但是我所抱持的意見是，這些都可以扮演次要的角色，唯有在實現了那六項條件後才能發生重大的改變。私人部門長期的考慮和投資，必須在對私人財產具有安全感的這個條件之下。中斷短缺經濟競爭和對手的產生，以及對事業失敗之恐懼——這些都是使得私人企業主注意顧客的動機。

最後一點評論與引進外資有關。在我看來，外來投資的關鍵應該由匈牙利本身的私人部門之發展中來尋找。我自己就不認爲光是憑藉著所提供的特別條件，能吸引龐大的外資投資於匈牙利的經濟。目前，有一些政府的法令給予外資比匈牙利私人公司更爲優厚的條件。但是任何腦筋清楚的外來投資者都會知道，這些優惠很容易就可以取消。外來投資者最多只會投入其安全性由自己的政府所保障的投資。結果，外來投資必然成爲母國的政府政策之一項功能。

這也許會使我們有些進展，但絕對是走不遠的，上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而且，這種情況也可能吸引追求快速豐厚報酬，但是一有風吹草動就可以把錢撤走的詐欺者。真正嚴肅認真的外來投資者，會想發現私人企業在匈牙利的真實情況。假使每一個匈牙利公民都可以自由地以其勞力、金錢和財富做想做的事，假使所有人都被允許參與沒有限制的外貿活動，那麼外來投資者就沒有理由認真地擔心什麼。我認爲匈牙利在外的政治家想要利用說服性的語言吸引外資到匈牙利，是相當幼稚的行爲。當外來投資者感到在這個國家能有安全保障，而

且不再畏懼無數的官僚限制時，自然會水到渠成。⑯

二、政府部門

在此，我暫時將所有不同形式的公家所有權都包括在內（較細的區別將於稍後提出）。顯著的區別標準是負面的：即屬於政府部門的實體便不屬於私人所有權。或者，如財產權的經濟理論家所說的：收支之間的差異所產生的剩餘所得並不進入自然人的口袋，而其損失也不為同樣的自然人所負擔。

在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社會主義的國家，「市場社會主義」的原則已經成為改革過程的指導概念。這是個相當複雜的教條，⑰因此，在此我只著重問題的核心。在這種原則之下，政府的公司應該繼續保留在政府所有權之中，但是經由適當條件之創造，這些公司的行為應該做到有如市場的一部份。以下我對「市場社會主義」這個辭的使用和挑戰，也僅在於這有限的意義上：**市場社會主義 = 政府財產 + 市場協調**。

在此，我希望用不加任何修飾的強烈字眼來表達我的意見：市場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只會如泡影般地消失。南斯拉夫、匈牙利、中共、蘇聯和波蘭都是這種做法失敗的見證。面對這個事實並放棄市場社會主義的原則的時機已經到來，雖然有些人還想繼續捍衛這項教條，我無法與他們苟同。實際上，我們必須注意以下的事實。

市場機能是私人部門活動的自然協調者。這與在市場機能下決策者的自治權，以及市場機能的運作和保護私人財產兩者之自由契約的中心觀念有關。期待政府單位表現得有如私人擁有的單位，而且會自發地表現得有如市場導向的機構是白費心機的。現在是徹底放棄這種

空想的時機了，永遠不要再抱持這種希望。因為政府擁有的公司不過是官僚階級有機體的一部份，因此，政府部門永遠會再創造出官僚來，這實在是不足驚訝的。

在改革過程一開始的「天真」時期，我們都抱持一種想法，希望僅是中斷計劃命令便足以創造國營企業的市場調節。但是，這項希望並沒有成真。幾項一九六八年之後的分析透露，政府部門的**直接**官僚管制反而被**間接**的官僚管制所取代。政府當局可以找到一百種方法來干涉公司的生存。¹⁶如果有一項活動好不容易才去除一種形式的干預，馬上又會產生別種干預，這種官僚協調是政府財產存在的**自發**效果和自然模式，就如同市場協調之於私有財產一般。匈牙利二十年的經驗，和其他所有心向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都證明了這已經不再是一個爭辯的論點，而是個必須被接受的**事實**。

稍後，關於政府部門所佔的比例如何能和應該如何減少這個問題，將個別論及。我們希望在這種過程之後，政府部門的公司只提供總生產中較少的比例。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出來，一旦國營公司成為私有經濟大海中的小島，他們也會被迫表現得有如私有公司。但是，問題在於目前這和事實相去甚遠，現在，和未來的一段時間，我們必須處理相反的情況：私人部門的小島被國營公司的大海所包圍。以下的說明將推論出這個事實。我的思路當然是可以爭論的，但是和諸如「法國的雷諾也是一個國營的公司，但是卻是利潤和市場導向的」這種論調並無矛盾之處。

以匈牙利現行的情況和社會學的意義來看，我認為國家所有的公司部門是政府官僚體系的一部份。國有公司是屬於「政府」而非「商業」的領域。因此，應該被當作政府的一部份來加以處理。政府部門

不能毫無條件地「自由化」，我們必須小心地監督。實際上，政府領域的每一個組織，似乎都有不受拘束花用民脂民膏的傾向。當然，這些強烈的傾向必須加以抑制。

這個問題在許多理論和實證的研究上都已經探討過。¹⁹舉例來說，讓我們來看一看，一個辦公室的領導對履行其責任賦予很高評價的例子。這個「局」的領導決定盡可能地擴大自己的預算。但是，在決定這個局的預算時，作為其監察者的立法體系則有必要抗拒這項追求。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國會民主和政府行政部門中的任何分支機構，比如說軍隊之間的關係，美國國會的議員必須明智地計算國防部支出的傾向。政府預算的目的便是要對這些需求加以設限，而預算原則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要強制執行這些限制。當然，國會會受到政治壓力，而軍方也想利用壓力來增加其預算。他們通常所訴諸的做法和社會主義經濟處理政府投資的方式沒有多大不同：那就是開始估計一項新軍事設施或新武器的成本是十億元，但是一旦開始進行生產，真正的支出就會變為原來估計的兩倍或三倍。到了這個節骨眼，要廢除整個計劃已經太晚了。這不過是維持國會控制的另一個原因。因此必須透過專業委員會來監督軍事支出，反對黨也會盯著這些開支。如果發生濫用情況，很有可能被發現。

軍方和國會之間的關係，不過是執行者（即官僚體系）和自由選舉的國會之間更為一般性關係的一個例子。前者必然是傾向於擴張的，因此後者的主要責任之一便是抑制這種擴張。官僚體系所花的錢是來自公民，而不是自己的口袋，監督公民的錢之花費是國會的工作。

不過是一年前，要是提起這一點，會被認為是幻想。今天，即使在我寫下這些話的時候，以立法來監督政府部門的政治和組織條件也

還沒有實現。這樣的改變需要自由選舉的國會，其代表必須把精力完全用在國會的工作上，而每一位國會議員都必須能利用這個機關，等等。從各方看來，今天有產生這些條件的**機會**。因此，嚴肅地提出以下建言的時刻已到：「我們**不要**賦予國營企業的經理人無限的權力！」

正因為我是經濟自由化的擁護者，所以我希望對自負盈虧的公民和私人公司所有人採寬大的態度。反過來說，我希望看到對於納稅人的錢支出的方式能得到嚴密的控制。就這一點而言，我把國營企業的經理人列入政府官員之一。如果這個經理做得好，我不會吝於給他豐厚的薪水；要是他經營不善，就得遭炒魷魚了。但是我們不要心懷幻想，國營企業的經理人畢竟不是企業主。他和其他政府機關的首長一樣，必然會盡可能地擴大其花費的限制，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實。

國營企業的經理人當然也想要做更多的投資，獲得更大數額的強勢貨幣(如美元、馬克等外匯)，從強勢貨幣市場中進口更多的機器設備，做更多的旅行，也讓同僚有相同的機會。當然，他也想要支付更多的工資，因為這樣可以提高他在員工中受歡迎的程度，並緩和周圍的緊張關係。到目前為止，他可以自由地按照這種方式來做，因為他用不著和保護自己的荷包免於此類過度花費的私人擁有者來競爭。如果這個經理人的支出超出限度，實際上他有機會可以得到紓解：政府預算或銀行體系必然會幫助他脫離困境。只要政府部門還是全國經濟的優勢部門，這些公司因為其自發的和內部的關係，不會有，而且永遠不會有嚴重的預算緊縮。現在應該是放棄緊縮預算這種希望的時候了。

我不希望過於簡化或走極端。我並不是說國營企業不過是許多公家機關之一，和諸如說高速公路警察局或者稅務局毫無差別。我也不是說國營企業經理人的態度在每一方面都和一個市長或是大都會的警

察局長相同。國營企業也是要出售產品來換錢，以盈餘和成本計算的基礎來運作，並維持買賣雙方的關係。就這層意義來看，國營企業的領導人的行爲也出現了商人的特色，而在一九六八年改革之後的二十年中，這些特色毫無疑問地愈來愈強。減弱這些特色將會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但同時所有負責的領導人，從最高到最低的經理人都必須瞭解，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受託付來處理政府基金的政府官員。在這一點上，他們必須負完全的責任，因此公民的代表監督他們的工作完全是合理的。

從前文我們可以得到幾點實際的建議。詳述這些建議的技術和行政細節不是本書的任務，因此，我只描繪出基本的原則。

1. 在以下的決策中，國營企業的領導人應該完全獨立：產出的組合和數量，投入組合和技術的選擇，與投入品之供應商和產出品之採購商之合約，以及勞工之僱用和解僱。

照道理來說，這些決策應該是屬於公司獨立權限的領域內，但在實際上，較高的機構總是會有千百種不同的方式來干預。在我而言，我贊成一種更完全、更一致的獨立之實現。實際上，我要為國營企業要求一種類似已開發資本主義制度中每一個大私有公司之內的個別小廠所享有的獨立。典型的做法是，次級單位的經理人可以自由獨立地做許多決策，而大公司的總部則決定基本的財務目標。^④

2. 整體而言，售價之決定應屬於國營企業領導人權限的獨立領域。國營企業（即賣方）可不受官方干擾決定產品和勞務的價格，在市場經濟中這些通常是由生產者所制定的。這種權力再由國營企業做為賣方可以自由地和買方（其他國營企業或私人買主）協議這些價格來補足，在正常的市場關係下，價格是由買賣雙方自願議定的。

在理由正當的例子中，當局應該繼續規定價格，但是，這些只能是自由價格決定通則的例外。這些例外將在第二章討論。

現在我們所要談的一些較專制的領域，以我的意見是必須**限制**國營企業的獨立。

3. 最重要的：國家銀行體系必須嚴格控制對政府部門的授信。必須強制嚴格的貨幣控制。在這一方面，我們不能屈服於任何形式的壓力。

4. 在國家財政和國營企業之間，我們必須要求同樣嚴格的會計原則。稍後在第二章，我們將會討論終結對虧損的國營企業之補助這個問題。在此，我只希望說在達到上述目標前，我們也必須對補償公司虧損的做法加以嚴格的限制；稅一定要收，而且，一般而言，我們必須終止財政單位和國營企業討價還價的行為。

5. 國營企業的工資政策不應該自由化。這一點和一般認為國營公司在這一方面也應該完全獨立的看法背道而馳。我們會再談到我提出這種建議的理由，以及工資原則這個一般性的問題。

6. 不加限制的國營企業將會把外匯花在進口上，希望進口能夠找到足夠的匈牙利福林來彌補外匯的購買。我以兩種不同的形式來陳述我的建議：

(一)如果我們完成第二章所描述的穩定行動，如果我們能夠以鐵的紀律來限制對國營企業信用的提供，而且如果除此之外我們能夠以真實的匯率得到匈牙利福林的可兌換性，那麼，也只有在此時才能取消國營企業收購外匯的限制。如此，國營企業可以在有限制的條件下獲得匈牙利福林，而對外匯的需求也因而得到抑制。

(二)如果沒有達到(一)所歸納的條件，那麼就必須以直接行政的方法

來限制國營企業對外匯的購買。

7. 國營企業在投資決策中應可以獨立，也就是可以從本身的存款或銀行信用，或透過在資本市場上所獲得的資金來融資。但是，如果中央或地方政府的預算也加入投資，或者信用是得到政府保證的支持，那麼監督政府機構對該計劃融資的立法團體（國會、地方議會）也必須核可才行。

如果投資的實現和政府間的契約有關，國會的決策也是必要的。我們不應該以**既成事實**的說法來對待這一代和下幾代人，如同發生在過去的那些惡名昭彰的不良投資計劃：Bős-Nagymaros Danube 電廠，或是匈牙利參與蘇聯西伯利亞天然氣管路的建設。如果某項投資結果會是失敗的提案，或是在任何其他方面有危險的話，大可以取消。因為後者這類決策通常牽涉到相當大的損失，所以唯有在適當的考慮之後再進行投資才是更為合宜的做法。人民所選出來的代表必須有權利在政府大開荷包或簽訂相關國際契約**之前**，達成一負責任的決定。

8. 我提到以下這點只是為了完整之故，因為稍後將詳細討論：國營企業的經理人沒有出賣企業的權利。這是**所有人的**權利，經理人只是受薪的僱員。

我不認為整個來看，1和2所描述的自主權，或是3~8這幾點所討論對自主權的限制，能夠確保國營企業的有效運作。我們要瞭解：這是**空想**。國營企業擔負著自己的命運，特別是只要政府部門佔著經濟中的優勢，那便沒有什麼萬靈藥可以使其以高效率來運作。誠然，大家對於政府部門的缺乏效率不能漠不關心，而以上的建議也許有助於這種情況的減輕。但是，主要是做為其他目標的理由，我僅強調其中的兩項目標。

最重要的是**保護私人部門**。國家的資源是有限的，而政府和私人部門都想利用這些資源。但是，這兩個部門在競爭資源的機會上並不平等。國營企業對資源的胃口可以說是貪求無厭的，因為他們習慣於鬆散的預算限制，而對私人部門的需求卻有強制的嚴格設限。國營企業和銀行以及當權者有很好的關係，而且他們的規模之大，本身在取得資源上就可以為他們得到許多好處。嚴格限制給予國營企業的資源，對他們所支付的工資之管制，對政府投資的監督，和其他的限制，對於保護私人部門不受政府部門吸收掉全部資源的傾向所排擠是必要的。那些認真負責發展私人部門工作的人，不能任由資源的分配在兩個部門的比例由政治和經濟力量自由運作。

我並不是要求兩個部門公平競爭條件這個時常聽到的標語的支持者。我反而要**不加辯解**地說，國內經濟所有的部門不需要得到一致的待遇。那些花用國家資金的人，不能要求與那些倚賴自己資源的人相同的權利。以後者的例子而言，花用自己金錢的公民訴諸基本人權的運作；而前面的事例，因為錢是來自於國家的荷包，所以社會應該行嚴格之控制。正如同「不要插手私人部門！」這句忠告理由完全充份，以強硬的手來控制政府部門的需求也是必要的。

這種想法和目前的做法正好相反：官僚限制了私人部門，而使政府部門得到自由化。我的意見也和好幾個經濟學家與政客背道而馳，他們在建言中和講台上不斷地辯說要繼續、甚至擴張目前的政策。他們想要確保國營企業無限制的自由化，而維持對私人部門千百種限制。

第二個用來支持限制政府部門需求的同樣重要的目標，是出於**總體經濟的穩定**。在第二章我們會看得更清楚，財政、貨幣和工資原則的嚴格強制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同在任何有關其履行牽涉到動用國家

資源的投資決策之前，必須謹慎考慮。在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一再提到國會的角色。在此我不想談論未來匈牙利國會和負責明日匈牙利私人部門經濟計劃的官僚之間的關係會是什麼樣子。在形成這些接觸時，我們必須考慮在主要的政治團體和較低層次的經濟機構之間，與計劃經濟整體架構下所累積的經驗（交涉過程、資訊的扭曲）。

我們也必須權衡已開發國家國會民主正反兩面的經驗，也就是這些國家國會和政府官僚實際的關係。同時，我們也必須要瞭解，沒有任何的國會民主曾經面對過匈牙利未來的國會所將面對的如此龐大的政府部門。如果我們不希望我們未來國會的決策對於官僚的行動還停留在橡皮圖章的階段，如果我們想要避免政府部門因為沒完沒了的國會辯論而癱瘓，那麼我們就別無選擇，只能試著使國會和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能朝向一個避免過度干預和無限制自由的可協商的中間路線。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必須有自己的小型專家團體是很重要的，如此可以使他們對政府部門有真正的控制，而不用在日常活動中做不必要的干預。

除此之外，我們必須在國會的監督之下，而非政府之下，發展出一系列的機構，這些機構能對政府的行政提供有效的制衡。這已經是踏出了第一步，之後應設立見於許多國會民主的國家稽查辦公室來監督政府機構的支出。另一個用來負責國家財產私有化的新機構可能也要受國會之監督，而中央銀行，即匈牙利國家銀行也在國會控制之下，應該是切合實際的。難怪我們需要許多獨立於政府機關之外的機構。

我並不希望我們對匈牙利未來的國會有太多的期望。在國會議員和因應這些問題而產生的機構熟悉他們的工作之前，必然需要根本的發展和很長的學習過程。這暗示了新聞界和全體輿論在監督政府部門

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學習的階段，當然往後也是如此。國營公司的營運結果（盈或虧）不能當作祕密，那些最後要付帳的國家公民必須被告知。

從以上所說的那些關於國家所有權不可避免的官僚特色，在邏輯上自然的結果是我自己深深懷疑所謂的「財產改革」這個招牌，因為這種改革只是將國家的財產以各種不同的法律形式（如轉移股份）指定給其他國有的機構或公司，而不是把它放在真正私人的手中，而在今天的匈牙利這正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著。同樣的，我也對「國家資本市場」相當懷疑，我認為這是整個匈牙利改革過程中最奇怪的、荒謬的事。過去幾十年充滿了假改革；我們目前所經歷的是這些虛假、幻想的改革的最後一波。我們已經看過從中產生的機構有權任意花用國家的金錢，而且是不負責任地任意開支。所謂的解決之道運作方式如下：讓我們把這個政府機構所握有的所有權交給別個政府機構，而這個得到所有權的機構還是繼續不負責任地花用國家的金錢。

我所擔心的改變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匈牙利的經濟術語稱為「交叉所有權」。在這種做法中，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國營公司成為另一個國營公司的共同所有人。更進一步的改變是，國營商業銀行和某些其他的國營公司糾纏在一起。銀行取得該國營公司的部份股權，或者反面而行，該國營公司成為這個國家銀行的股東。還有另一種形式被稱作「機構所有權」，這種做法是國營的保險公司或市議會買進國營公司的股份。

這些形式至少已經被部份引進，而一般而言，這些改變正快速地獲得地盤。匈牙利改革文獻所產生的某些研究早就鼓吹這些改變，還有些力促更進一步的擴張。❶但是不管這股潮流多麼強，在觀念和知

識辯論的層次上和真正的實施上，我都決定大力地加以反對。我敢說我不是唯一一個受夠了這種模擬做法的人。我們已經在不少事情上著手模擬了。國營公司模擬追求利潤極大化公司的行爲。官僚產業政策管制各種生產的擴張和緊縮，則模擬著競爭的角色。價格控制局在價格決定上則模擬市場。這份表上最近加上去的則有模擬的合資公司，模擬的資本市場，以及模擬的證券交易。這些發展湊在一起成了匈牙利的華爾街——所有都是假象！

來自世界銀行或者國際貨幣基金在此逗留一兩個星期的西方人，可能會受到這些模擬魔力的吸引，來自國外的觀光客也可能喜歡這些看似相似的經驗，漫步在布達佩斯的西方人看到麥當勞可能會感到高興，只因為這使他們想起豪華漢堡的熟悉滋味。同樣的，在這裡看到熟悉的銀行、合資公司，或是股票交易，對這觀光客而言，都是一項樂趣。他很可能不會注意到這些相同的銀行、合資公司和股票交易不過是假象。這裡所進行的是一種特別的「壟斷」遊戲，賭客不是小孩子，而是成人官員，他們不是以紙幣而是以國家真正的資金來下注。

每當我在談話中說到這一點，總是有人會發出以下的反對論調：「爲什麼你不環視一下今日的資本主義世界？我們也可以從中發現許多合資公司，大部份的合資公司股份都是由其他的公司、保險公司、非營利機構（如養老金基金或大學），或地方政府所持有。」爲什麼我要期望這種非私人形式的所有權之比例在匈牙利要比當代的資本主義體系來得小呢？

我堅信歷史不是像電影的膠卷一樣，可以在任何時刻加以停止，或任意地快速前轉或倒退。社會主義的政府所有權代表了完全、百分之百的不屬於個人的財產。我們不可能想要逐次地把這種比例降低到

95、90、85等等，就能反轉這種過程。膠卷必須完全倒轉完畢，才能從頭開始。讓我們更仔細地來看看資本主義世界過去和現在的發展。我們在分析匈牙利當今的私人部門時，已經接觸過這個問題。讓我們簡單地描述資本主義歷經數世紀發展的過程，重拾這條線索。

所有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最初的引擎都是個人企業家，他們是最聰明幸運的小小點火裝置器，不是快速地就是經由連續幾代的累積資本。在每個國家資本主義歷史上，以國家的層次而論是如此，而在特殊國家中，大部份個別的大資本主義公司的歷史也是如此。企業家進入或退出市場；有些存活了下來，有些則倒了下去；有些停留在破爛的小店，或是普通中等規模工廠的水準，也有些企業長成巨大的公司。同時，更多非屬人資本的取得，不斷地在進行著，這資本是屬於將存款放在銀行儲蓄或持股份的人。隨著所有權安全之加強、相關法律基層結構之發展，以及公平商業管理道德規範的佔有一席之地，我們可以期待非私人投資不同形式的平行擴展。當然，這種過程也暗示，國家扮演健全商業交易的保證者。

把所有事情加以考慮之後，以上分析的這些機關投資最終是由私人所有者的利益所支持的。這項利益對非營利機構投資的行為運用壓力。或者，在後面有一個相當有力的機構，比如大學或是基金會，具有自己的傳統和真正自治的有機體。當然，這種機構會以有力的手腕來確保其投資得到清償，這是因為它們在財務上是自主的，同時為無法倚靠國家父權式的保護。因此非私人投資的比例將隨著這個過程而成長。

但是，在這裡應該加上兩點限定。首先，如果所進行的真的是新的，那麼只有很少數是非私人的投資。過去五十年最重要的新產品都

是由可以視為企業個人或團體所支持的，而他們是由自己的荷包對全部的過程給予經濟援助。唯一重大的例外是與軍事發展和大型公共建設計劃有密切關連的創新改革。中央政府應該為新機場的建設籌措必需的資金，而且在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和地方當局合作，似乎是很自然的期望。但是，這是引進真正新事物之後所緊接而來規則的例外。事件的正常路徑如下：開先鋒的人在新的產業據點或新市場上以新產品賺取了豐厚的收益，但是如果事業觸礁，他們也是要付帳的人。開創者的資金通常是由外部的私人投資者的湊集，主要是那些希望獲得非常高的利潤而準備長期冒險的人。²²

第二點限定，實際上是個問題。為什麼當代資本主義財產非屬人化的程度，必須當成匈牙利的指南呢？

我相當清楚合資公司在高度開發的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扮演了相當重大的角色，而且在合資商業中數以百萬計的股東和公司之控制間，最多只有著間接的關連。利用艾伯特·赫須曼（Albert Hirschman）有名的二分法，小股東表達失望的方式是「退出」，也就是把對他們不再有吸引力的股份脫手，而不是以「說出」企圖直接影響公司的經營。許多私人所有者並不直接決定他們的投資組合，而是透過仲介機構的服務。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中，成千上萬的保險公司和養老金基金擁有大公司龐大的股份。「渺小」的私人所有者是不會介入華爾街的交易。他的錢有著風險，公司的獲利程度最後會影響他個人的財富和福祉，但是這種關係是由非常長而間接的連繫所建立起來的，而且已經非屬人化至某種程度。但是，雖然有著這眾所皆知的事實，今日的匈牙利也不必去模仿當代的美國或日本。如果，舉例來說，在日本機關所有權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二，而在美國則是百分之三十七（當然，這些是

杜撰的數字)，那麼難道我們真的要去遵循這百分之三十七至四十二的型態？

在西方，財產的非屬人化也是受到批評，而在我看來這些批評通常是正確的。諷刺的是，社會主義的幼苗已經出現在今日的資本主義上。有許多人認為所有權在保險業、健康服務業，和銀行業已經變得過度地非屬人化。在美國，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鬆散預算限制的一個典型例子，也就是在專門為住宅計劃融資的儲蓄和貸款相關領域中。這些機構有許多已經破產了，大部份是因為他們濫用存款人的信心，並且授信給最後證明是不可靠債務人的承包商。

匈牙利的經濟學家對這種型態再熟悉也不過了。現在該輪到政府往內深深地掏荷包，來救這些機構。如果政府未能做到這點，那麼存款人就會對這些單位發動擠兌，而這很可能造成類似一九二九年大蕭條的嚴重財務危機。但是，難道這真是要我們遵循的例子嗎？當然不是！許多美國經濟學家相信從一開始就應該對這些機構加以較嚴格的管制，而政府保證的條件也應該更清楚地劃分。像匈牙利這樣的國家，必須特別注意不要遵循這樣的型態，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人們已經形成對政府保護角色不可動搖的信心。

現在，讓我們再簡短地回到國營企業經理人薪水的問題。我把國營企業成功的經理人看成是相當受尊重的官員，其名望不下於一位大使、市長或將軍。但是不要搞錯了：他可不是一位生意人。如果他工作做得好，他應該賺取好的薪水。但是，他的工資不應聽任其達到天文數字。我不贊成這點，不只是因為國家現在正面對極大的困難，即使國家的景況不錯，政府部門的經理人依然是由政府預算中領薪水的官員，而不是授權可以管理私人金錢的人。訂定首相和將軍們的薪水

是國會議員的工作，這些國會議員同樣地也應該為國營企業經理人的工資訂上限。

如同前文所提到的，匈牙利改革過程中有一部份是完成了部份分權，也就是在國營企業經理人的身上發展出一些近似於真正商人的品質。期望這些發展也會表現在他們的財務上和道德上的動機上是合理的，正如同沒有人能合理地提議付給律師的紅利和定罪坐監服刑罪犯的總年數成何種比例，主張國營企業經理人在固定薪水之上可以有紅利，可能是說得通的。但是，這些額外的數量應該適當。在當前的匈牙利，大部份的價格和稅制都是在任意決定和受到扭曲的情況下，「利潤」的經濟定義依然是爭議的主要焦點。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以某種公式把付給國營企業經理人的紅利，和該企業所謂的利潤連起來是說不通的。

雖然我建議匈牙利未來的國會對國營企業經理人的工資訂上限，我並不認為把同樣的方法用在和私人公司訂有契約的經理人身上是必要的，如果某家私人公司的老闆想要從自己的荷包每年支付一百萬匈牙利福林給任何的員工，應該可以自由地這麼做，因為他知道這樣做到底值不值得。但是，如果錢是來自政府預算，則沒有人有權從公司的付款桌上取出任意決定的工資，或是要任何的行政當局核可這筆數目。

讓我來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目前有一項爭論是匈牙利應不應該主辦一九九五年的世界博覽會。這個議題已經排上國會的議程，國會議員會以政府或其他單位之提議來投票。我的建議如下：

負責這項提議的政府官員、委員會委員和部會的長官，應提出他們的個人資產，如他們的公寓、私人的房子、第二棟房子、汽車或藝

術品做爲抵押。這個提議的附件應該包括這些資產的詳細清單。相關的人應該可以自由決定哪一部份的私人財富不做爲抵押，但要清楚的是他們用作抵押的資產對他們應很有價值的。當然這些資產的價值只能涵蓋預期投資成本的一部份。但是，這些抵押應該還是可以代表這些人在他們一生工作中所累積的總物質財富中相當大的一部份。

世界博覽會的法案應該提議對於這個議案的起草人，可以給予相當的紅利，如果事情的結果和預期相同的話，相同的法案中也應該規定，如果博覽會失敗的話，抵押品贖回權完全喪失。

在我看來，這些條件可以使起草人完全清楚冒著可能影響自己荷包的风险是什麼樣子。如果在這些情況之下，他們居然選擇執行整個提議，他們當然有權這麼做。

請不要誤會了！我並不是建議任何國家的政府對任何的立法起草，都要遵循這樣的程序。我只是半開玩笑地做這種建議來說明很重要的一點。確實不錯，匈牙利的人民感到沮喪，因爲過去四十年來，黨和政府官員只要動一動筆就能決定數十億匈牙利福林和龐大的計劃，已經成了當然之事。如果計劃開花結果，很好；如果沒有，很糟，——然而官員自己從來沒有損失一毛錢。這個極端的例子也想要說明，最後決策者自己的荷包和他所做的經濟決策之間，必須建立一種關連。

三、兩個部門比例的變動：私有化的過程

我認爲盡快提高私人部門的比例，直到這個部門佔本國國內生產毛額 (GDP) 的較大部份爲止，是很好的做法。但是，只能透過有機的發展過程和社會改變才能達到這點。這個過程不是最近的發展，而是已經拖延一、二十年了。目前的任務是實行一些實際的措施來加快腳

步。

我並不喜歡「再私有化」這個標語。柴契爾夫人有理由在英國實施這個標語後面的政策，因為在英國，私人部門度過了國有化的時期。而且，在英國有足夠的國內資金以合理的市場價格買下政府部門（雖然，我必須加上再私有化在英國也碰到困難）。

那麼，哪些目標是可以合理地在匈牙利達成的呢？哪些點是我認為不利的呢？讓我們先來看看後者。

不可以僅是出於仁慈，把國家財產分配給所有人，而浪費了國家財產。這種現象在每一個角落都會以無數的形式出現。比方說，只以真實市場價格的一部份價錢，把國有公寓出售給房客，完全是沒道理的。更糟的是，買方只要將購買價格中微不足道的一部份以現金存入即可。因此原先的房客能夠在匈牙利首都最昂貴的區域布達（Buda），得到一間一百平方呎的公寓，而所付的現金還不到該公寓一平方呎真實價格的等值。這實在是荒謬，特別是如果我們知道同樣的房客幾十年來已經得到政府低租金的補助這一事實。

在當前將國營企業轉變成合資公司這股潮流中，私人所取得的股票數目到底是多少，我並不確知，而且我也不熟悉國營企業經理人和其他員工目前所得到的薪水。有限度的先購權和某些折扣，似乎是合理的。但是讓每個人很便宜地就成爲一個股東，不管是經理人還是只是公司的一名員工，都是完全錯誤的做法。

有人提議應把國家財富分配給人民，這屬於人民的公民權利。這個計劃使得每一個公民有權獲得一點點資金，可以自由地用來投資或出售。這個提議錯了。這個提議讓我覺得，好像是國家這個父親突然過世了，留給我們這些孤兒來均分他的遺產，但是國家還活得好端端

地。國家的機構有責任小心地處理所託付的財富，直到可以保證更安全、有效保護之所有人的出現。目前的問題不是交出財產，而是把財產放在一個真正更好的所有人手中。這一點的先決條件是：真正的私人企業動機應該有所增進並持續下去。

讓我們把注意力轉移到我正面的建議。

1. 私人部門的成員應該有機會購買政府部門合適劃分單位的財富。家計單位應該可以自由地購買政府所擁有的不動產（公寓，或甚至是公寓房子、土地、商店，等等）。私人應該有取得國有企業的權利。在今天的匈牙利，如果仰仗私人企業主購買龐大的國營企業，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但是，他們應該有機會購買較小的企業。可以把以人為方式結合許多小單位而成的龐大的匈牙利企業加以解體，來加速這個過程。然後可以把這些小單位賣給私人企業主。不是加倍規模便是完全放棄（double or quits）的原則不可以用在這裡。把人為膨脹的龐然大物拆成十個較小而較健康的單位，比方說出售其中的五個單位，而其他的則保留在國家經營之下是行得通的。

這種把政府財產交到私人手中的過程，絕對不可以導致對龐大、不可分的單位之強加支解。今天，匈牙利的經濟已過度的集中，即使和已開發工業國家的集中程度來比亦然。有許多機會可以創造較小的單位，但是也沒有必要太過於貿然躁進。在這種環境之下，徹底分析真正市場經濟的集中結構是不可或缺的，競爭在此市場中已經造成一種自然選擇。在這些經濟中，大、中、小型的企業，甚至到投入家庭工業的人共同生存、彼此合作，匈牙利對各種規模的工廠都需要。

如果不顧經濟的多元性，或相關公司的規模，而採用單一的方法，將是不智的。對於巨大的公司，以及國家所有的雜貨商或是小汽車修

獨廠，必須採用不同的程序。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選擇以下2~8各點所考慮的各種形式的私有化。把較小的單位從國有轉入一個個人或一群人的手中，相對地比較簡單。如果所牽涉到的單位愈大，愈需要其他的法律形式（見第9點有關合資公司的評論），則愈複雜。

2. 不管規模，凡是出售給私人所有者的政府財產，轉手時必須以真實的市場價格出售。一般而言，財產應該被拍賣，而且應該將公開出售的消息通知可能的買主。因為在許多情況下，不能保證充當名目上處理人的政府機關對制定真實（適當地高）賣價真正感興趣，所以由獨立的團體來報價應該是有用的。在某些銷售中，所要求的價格很容易制定，比如，在房屋市場上，私有市場的價格水平可以當作適當的起點。當然，如果是製造性的公司，問題就會比較困難。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如果一個私人企業主要建立一個類似的生產單位，願意拿出多少自己的錢來投資開始。

3. 必須建立與將政府財產出售給私人所有者有關之信用結構。以下的例子描繪出這類信用交易的可能結構，只是爲了要說明這一點，絕對不要看成是正式的提議。

私人或團體想要取得價值二千萬匈牙利福林的政府財產（根據第二點所說的，我們假設這是沒有任何削減的真實價格），可能的買主必須付給賣方五百萬匈牙利福林做爲頭期款，而剩下的一千五百萬匈牙利福林加上利息，必須在五年之內以等份的分期付款付清。問題中這二千萬匈牙利福林的政府財產在交易的那一刻就成了私有財產，但是還有著負債值之抵押。

抵押的條件必須很嚴格。如果新的私人所有者不能如期繳交分期付款，則將損失原來投資若干比例的部份（遵循必要的法律程序），而該財

產將歸屬辦理信用的政府團體。

這個例子的重點不在於數字上的比例，或是組織上的形式(也就是，這裡是除了指定抵押貸款的來源，或負責強制信用契約的機關之外的形式)。我的目標是要說明兩點重要的經濟政策條件。首先，出售給私人的價格上限，不是由目前的私人總財富來決定。如果私人部門目前握有一百個資金單位，可以用來購買政府的財產，那麼私人部門有可能購買了價值好幾百個單位的政府財產，其差額則由信用的方式來補足。就這個問題而言，大大地加快將國有財產轉入私人手中的過程是可能的。第二，信用應授給真正血肉之軀的人，而不是透過無形的股票市場來分配。這個有血有肉的人應該可以獲得相當可觀的信用，但是，如果他沒辦法付款，就必須面對連本金也收不回來的全然損失。

4. 把國家資產租給私人的做法在匈牙利已經非常普遍。這種做法絕對是需要的。但是要避免兩種錯誤，有一種是當作出租人的國營公司，會相當貪婪，要求不合理的高租金。然而這只會刺激承租人毫不留情地剝削國家財產；他會盡可能地從中擠出一切，然後繼續前進。另一種錯誤是出租人以制定一種幾乎是不要錢的低租金來浪費國家財產。簡而言之，租金必須合理真實。

出租制度也可以當作是出售的過渡階段。一方面，承租人可以獲得決定該國家資產是否值得購買的經驗和能力。另一方面，國家所有者可以發覺真實的要價。把出租轉變成非循環的資本價值(nonrecurrent capital value)有許多眾所皆知的做法。

5. 部份匈牙利的國家財富可以售予國外的所有者，但必須配合國家的利益。沒有任何的經濟困難可以當作廉價出售國家財富的理由。

讓我們來考慮一下外資的利益：外資來到匈牙利不是出於某人的

善心，主要是要獲利。當然，也可能有其他的動機。比如說外資可能把匈牙利視為攫取東歐市場的灘頭堡和最初的訓練場地。不管怎麼說都是受到本身利益的引導，如果因為意識型態或道德的偏見而癱瘓這種過程，那就沒意義了。

現在問題如下：一旦外資在匈牙利賺取了利潤，還有什麼好處留給這個國家？關於這個問題，沒有普遍性的有效正面或負面答案，因為每一個情況都是由該交易的具體情況來決定的。如果想要不設條件地吸引外資，實在是荒誕的事：「好心的你們請來買匈牙利的國家財富。」首先，如果購買價格合理的話，匈牙利就可以得到好處。²³而且，如果外資還一併帶來了最新的設備，以及管理、商業、和技術專家，那麼匈牙利也可以得到好處。如果公司是由外國所有者來管理，通常可能引進較高程度的組織和紀律。類似這樣的例子通常就足夠產生正面的影響。

當然，也有必要考慮外資對就業可能的影響，這也很可能是有益處的。但是，單以這個標準為基礎是無法成為交易的理由的。我們不能只為了保護匈牙利人瀕臨危險的工作，而以任何價格將匈牙利國有財產出售給外國所有者。就業政策由許多工具所組成，這些工具最有利的組合必須依照個別情形來決定。

也許制定外國人可以購買的匈牙利國有財產比例之上限是值得的。²⁴但是，即使限定是放在外國人可以買盡現有的國有財產，也不能對直接外來投資設限，亦即外資在匈牙利設立新設備，同時大部份是以外來資源設立的情形。

6. 我們常常會聽到一種很含蓄的辯論，說出售國家資產不是為了要使預算增加額外的所得。實際上，過去二、三十年，某些人已經對

平衡預算這種觀念感到恥辱，甚至到了連收取利益的熱誠已經成了某種可恥之事的的地步。預算的問題將在第2章詳細討論。我們在這裡只要說，我們應該接受出售國家資產必須成爲政府預算所得的一項主要來源這一事實就夠了。因此邏輯上的結果是，我們不能不對售價感興趣。有許多人就是無法強調對高所得課以重稅之必要。但是同樣的，具有重新分配權力者，在出售國有公寓時，恥於提到對房客應該索取的價格，而且他們不時地跳過誰有資格，以及以什麼樣的價格可以在所謂的轉變計劃中得到私人股票。

每一次以好價錢出售國家資產的交易，不管是賣給國內或國外的買主，都免除了匈牙利公民必須以繳稅或通貨膨脹的形式將同樣的數額捐給財政部門之責任。這種國家稅收，確實說來是非循環性，也不是永久的，但是卻發生在這個國家正準備克服穩定化這些大困難的最佳時候。

7.第6點大略說出了國家財產的財政影響，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貨幣的影響。老百姓以及一般的私人部門已經累積了數量可觀的貨幣。我們沒有辦法得知其中有多少是強迫性的儲蓄，也就是所謂的貨幣窖藏(monetary overhang)。在任何情況下，還沒有支出的貨幣之數量在市場上佔著很大的比重，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有許多方法可以抽乾還沒有支出的貨幣，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出售國家財產。

無論從財政或貨幣的觀點來看，銷售交易中真正的現金——信用的比例都是很重要的。再回到我們二千萬匈牙利福林這個例子：頭期款是兩百、五百或八百萬不是沒有關係的。總體經濟的考慮爭取在交易中現金佔最大的可能比例。但是，太過於堅持過高的頭期款，可能爲銷售過程投下嚴重的障礙。因此在市場上做些實驗是不可避免的。

8. 在匈牙利，所謂的公司法允許國營公司自行變成一個合資公司，而其股份可以落入不同所有者的手中。在我看來，這種形式具有足夠的彈性可以產生好的轉變，但是，也可能讓假的、甚至不好的改變有發生的機會。對這個問題，公眾有廣泛的爭論，通常聽到的是強烈的批評。在此，我想要清楚地說出自己的立場。

在我看來，只要最後能導致公司**真正的**私有化，轉變成合資公司，終究是可以達成目的的。雖然股份由政府的一隻手轉到另一隻手可能不會造成什麼傷害，但是我也不會期望會有什麼進步。

至於將股份轉入私人的手中，我首先要說明什麼我認為是**不正確**的程序。

我們絕對不能讓目前的經理人把公司佔為己有，並把自己從領國家薪水的員工變成所有人，或更精確地說，變成結合所有權和管理權雙重角色的所有者。新的所有者應可以自由地指派管理人員。如果他們喜歡的話應該可以保留舊的管理人員，或是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也可以指派新的主管人員。新所有人應該也可以決定如何訂定主管的薪水和財政上誘因，這應該包括有權以折扣價格提供經理人一定比例的權益。但是，絕對不允許原先的經理人自己選擇誰應該是新的所有人，或是把自己列入到新所有人的優先名單上頭。

就如同我所提到的，公司的員工可以以折扣價格購買股份，但是，我認為這種選擇只能涵蓋股份的一小部份。公司整體勞動力得到所有股權不是理想的做法（更別說是**免費**得到了，正如這種解決之道所倡議的），如此一來，國家財產變成公司集體員工的財產。這將造成實際上是引進了自我經營財產模式，我將在下節探討反對的原因。我在這裡想要先提出這個問題的道德面。所有權轉移當時公司所代表的財富並不全

然是公司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每一個公民都透過政府的投資和政府對該公司的補貼而有所貢獻。現在由公民中的一小群人來取得這項財富，好像得到禮物一般，是怎麼也說不通的。而且，某些勞工整體可能會很好過，因為他們得到的禮物是一家繁榮的公司，而其他人可能成爲一家負債累累，虧損的「負面財富」的所有人。最重要的，主要的考慮不是取得財產法律上的合法性，而是善加經營的能力。在我看來，只有私人財產才能提供足夠的誘因，以永遠保證對資源有效的運用。

我們無法事先以法律或其他的管制來「劃出」股份所有權該如何分配。我所能指出的，只是有利的傾向爲何。比方說，一家原先是國營的公司其資本是一萬股。以目前匈牙利的情形，如果將資金分散到一萬個不同的股東身上，並不是有利的做法。如果這樣的話，原先相當不屬個人的國家所有權，將會爲同樣不屬個人的私人所有權所取代。理想的做法是由一位佔有優勢的個別股東，或是一小群能夠在公司取得相當位置（至少百分之20或30的股份）的股東，可以在公司主管人員的任命和監督上有決定性的權利。這種希望和我已經提出來贊成可見的「有形的」所有人的論點是一致的，因爲其私人的投資（在這個例子中是可觀的股份）可以使他們對公司的成功有強烈的興趣。這個具有優勢的股東群可以是匈牙利人或外國人，基本的要件是要形成有效而直接的所有權利益。

我的想法是，一般說來，轉變成合資公司或私人財產的其他法律形式，只有在出現了這種個人或團體股東的時候和場合，才可以開始從事。一旦「有形的」所有者出現並得到核可，也就是買下了一大筆的股份之後，他們便願意冒相當的風險，那麼剩下的股份就可以賣給

其他不具名的買主。如果反其道而行，先是把股份賣給所有的人，任意地分割股權，然後希望有人在公司的經營上能表達意見，我不相信這種做法會成功。

9. 國家財富的行銷應該是一完全公開的過程，而其法律架構應該由法律所規定。法律在規範和限定先前經理人的權利和責任時，必須要慎重。在本文寫作時，政府機關處理私有化的法律和組織架構正在出現，國會也需要有一個委員會來監督法律的執行，並對負責私有化的政府機關行獨立之控制。

新聞界將扮演重要的角色。需要有一份真正的商業報紙提供資訊給可能的買賣雙方。只是隨處刊行偽裝的拍賣宣告是不夠的。商業出版品應該使目前的市場叢林更加透明。大眾應該知道國有公寓、不動產或是工廠買賣的價格。如果政府是賣方的話，一般而言，容不下有商業祕密的餘地。即使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加以保密，也應該允許國會的委員會窺其堂奧。

除了專門的商業出版品，其他傳播媒體以及政治上的反對勢力，在揭發偶然的濫用上，也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說國家財產的出售**不應該**受制於速度的指導原則。「足夠了就放手」的做法是不負責任的。在國家所有權比私人所有權更能有效地解決問題的地方，國家所有權就具有決定性的角色。比如說，沒有人會提議把公路交付私人手中。但是，即使難以決定到底是國家還是私人所有權哪一種比較有效，也有必要做特定的分析，並根據上面討論的條件來探知，問題中的交易是否有效；如果從總體經濟的觀點來看，該交易是有益的，而且可以保證；從個體經濟的觀點來看，新的所有者會比舊的做得更好。那麼，應該把政府的財產賣

給私人所有者，我們不要忘了，私有化的目的是滋潤私人所有權所提供的誘因機能。

所有這些改變都將在長時間的有機過程中開展。應該努力來加快這種過程，但是不應該歇斯底里地冒進，也不應該突然執行。

四、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關係

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不能有「柏林圍牆」。②兩者之間會發展出各種關係，有些是健康而值得支持的；但是有些則是有害的，因此必須試著對抗這些關係。

現在正是廢止限制、在某些情況下是禁止國營公司或其他政府組織和私人部門之間商業交易法律條文的時候。我相信和私人部門密切的經濟關係有助於國營公司行事更有彈性，而且能彌補物質短缺的經濟所留下的鴻溝。在相當高比例的情況下，由私人的貿易商將一家國營公司所生產的產品，移轉給使用這些產品的別家國營公司，將會是理想的做法。應該允許私人貿易商進口國營公司的投入品，並輸出它們的產出。

任何社會中，在私人企業和政府部門接觸之時，都可能產生腐化的現象。既然國營公司是政府部門的一部份，預測國營和私人公司的關係之間將產生各種形式的腐敗做法，應是可靠的。這一點已經可以感受得到了，而且隨著私人部門的強化，這種情形會愈來愈頻繁。沒有什麼絕對的方法可以預防這種損壞力。討人厭但又不可避免的情況隨著轉變過程而來，但是，以必要的努力把這種問題減至最少的程度是值得的。這包含了區分正確、誠實的，和受到法律禁止和道德譴責的關係形式之適當的法律措施和道德規範。強制法律管制和道德規範

的努力，必須由犯罪調查當局和一般大眾共同進行。

也許更重要的還是私有化進行得成功。一旦政府部門失去了優勢，市場競爭所加諸的紀律將變緊，而私人部門藉著和政府部門的關係來獲得特殊利益的機會，就會愈來愈少。此外，第2章所討論的經濟改變（統一的自由價格制度，統一的可兌換貨幣，消除通貨膨脹和物質短缺的經濟），都將有助於減少腐化的誘因和機會。

我們必須特別提到，有些人是一腳在私人部門，一腳在政府部門。舉例來說，一個國營公司的工人，在閒暇時做修理工作，他這種雙重存在本身沒有什麼好異議的。實際上，我們必須諒解那些到目前為止想要保住政府部門所提供給他們的安全，而另一方面又想私人部門中增加所得的人。個人應該有自主權可以決定這種雙重生活要過多久，因為這通常意味著長時間的工作和自我剝削。

但是，應該以法律的措施和輿論的壓力來確保沒有人可以濫用這種雙重資格。這也許是想要侵佔國營公司生產工具，或是想要不花一文錢來使用這些工具的工人。更嚴重、更應指責的，是主管人員扮演雙重角色的情形：同時是國營企業或機關的主管，也是國內或國外私人公司的所有人、受薪經理或顧問。必須以嚴格的條文來清楚定義並禁止雙重角色的利益衝突和道德上不相容之處。這種條文見之於所有已開發西方民主國家的法律體系中，詳加研究將大大地有助於匈牙利準備類似的措施。

五、其他形式的所有權

這裡將討論三種形式：

1. 合作社。如果能符合以下三項原則，那麼合作社可以扮演相當

有利的角色；成員可以自由進出；在退出時，成員不僅可以自由地取走本來的資本，也可以拿走他那一份累積的資本；合作社是由自由選舉、真正自治的人所經營。這一類的合作社實際上是私人合資的特殊形式，因此不是獨立的經濟「大部門」，而是私人部門的一部份。

這樣的合作社已然存在。我樂見它的擴散，但是，我懷疑在數量上會有所增加。讓我們拭目以待。

我對各種形式的假合作社有不同的看法。這些有著官僚政府所有權一切負面的特性。理想上，這些假合作社應該自動地轉變成真正的合作社，或是其他根據私人部門組織和法律形式運作的單位。至少應該放棄所有的偽裝，公然承認合作社是政府的財產。再怎麼樣，匈牙利經濟最終必須放棄這些假合作社。

2. 地方政府所有權。由鎮、市或鄉政府所擁有的經濟單位之地位（即目前政府結構之下的議會），不能以一致的有效性來加以評估。問題是：地方政府在什麼程度之內能表現得像一位真正的所有者？在這種情況下，還得提出另外兩問題。第一個是地方立法是否為真正代表制的，是否是民主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必然會出現典型的中央政府所有權少不了的官僚特色。另一個問題是有關特定地方政府所管理的區域和人口的大小、多寡。鄉議會在其相當有限的管轄區之內履行其有如公司所有人的責任，成果可能要比布達佩斯市議會在首都之內履行數量龐大的公司之所有人責任要來得好。實際上，首都的產業管理更可能產生官僚國家部門所運用的那種控制。

只有時間才能證明地方政府所有權能保留多少政府所有權較早形式的官僚特色，以及可以產生多少足以和私人部門比擬的真正的所有權利益。雖然我不排除產生真正所有權利益的可能性，但是，在未來

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機會並不大。而且期望這種形式長大成擁有社會生產中可觀部份的龐大部門，更是不可能。

3. 勞工管理。這種形式的所有權是由員工選舉公司的管理團體和上層經理人員。他們對公司例行的管理也有發言權。此外，所有權不是屬於整體工人，就是屬於個別勞工（如，經由勞工持股）。我並不建議勞工管理成為主要的所有權形式，或是把目前的政府部門改變成具有勞工管理特色的形式。以任何例子來看，這種情況都是很曖昧的：國營公司中有一大部份已經盛行著一種準勞工管理。有好幾個作者已經辯稱，贊成將目前這種曖昧的形式發展成真正的勞工管理。

勞工管理的優缺點說也說不盡。以今日的匈牙利而言，我認為兩點相反意見是確實的。其中之一與**工資原則**的強制性有關。這一點實際上是在解散史達林模式的管制經濟過程中最弱的一點。在管制體系下，工資水平和國營公司總工資成本，都是由強制性的行政命令來規定的。實際上，這是少數以最大的效力強制執行的計劃指示之一：遵行工資規定的得到報酬，而違反者則得到懲罰。工資管理自由化的改革愈向前進，工資開始上升得愈快。官僚的強迫不再被執行，但是，私人所有權所創造的相對利益還未能加以取代。

私人所有者的自然利益和過度的加薪是背道而馳的。所有人以這種感覺為出發點：他付給員工的每一匈牙利福林，都是從自己的口袋掏出來的，只有在也符合自己的利益下，每一個多付出的匈牙利福林才是值得的（以個體經濟學的名詞來講，也就是工人的邊際生產力不低於工資）。另一方面，這種自動的利害關係並沒有出現在國營公司，因為經理人節省的不是自己的錢（而且不是受私人所有者直接的僱用），只是把非屬個人而屬於國家的錢轉到工人身上而已。實際上，經理人希望得到工人

的歡迎，而他可以以付出較高的工資輕易地達成目的。消除公司內部緊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宣佈加薪。追循著自由化的改革，在曖昧狀態下經營的國營公司既不是管制經濟，因為管制經濟的工資紀律是藉著官僚手段來強制的；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是以私人所有權來刺激這項紀律的。結果，所有的改革國家都有工資膨脹的問題。這種現象已經見於中共、蘇聯、波蘭，而資料大約也證明匈牙利也有這種情形。

勞工管理只會更進一步削弱工資紀律的立場。讓我們來看一看老闆是由自己的員工所選出來的情形。他為什麼要採取不利屬下的措施？他為什麼要限制工資，扮演不受歡迎的角色？實際上，近來匈牙利引進的勞工管理的要素，已經把這個國家推向工資鬆弛的路線。這種現象在南斯拉夫更為顯著，在南斯拉夫，幾十年來勞工管理已經成了基本的，也獲得官方承認的所有權形式，難怪工資膨脹達到嚇人的程度。

另一個反對勞工管理的主要論點是屬於政治性質的。有好幾個反對勢力力促，而國會最近也已經立法，禁止工作場所的黨派分支，強調生產不應該捲入政爭。但是，如果在目前的情況之下，真正的勞工管理在匈牙利公司取得地位，經理人員和公司理事會的選舉將會轉變成黨之爭的舞台。各種黨派或黨派聯盟將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並為他們發動競選。每一個由大多數人選舉出來的經理人都將面對少數派的對抗。在還是一黨專政的南斯拉夫，這個問題並不明顯，因為那裡所有的選舉都不是真正的選舉。共產黨和其附屬的職業工會可以大力地操縱選舉。但是，如果我們預見匈牙利有真正的多黨制度，那麼，我們就可以預期，經理人的自由選舉會為工廠開放黨派競爭的大門。

而且，「直接」民主的原則主要是由那些想要以此來取代真正的政

治民主的人所擁護的，更精確地說，是用來取代政治民主中最重要成份：在兩黨之間做選擇。那些想要以勞工管理永久取代國會民主的人遲早都會知道，這不過是個不恰當的「強制代替品」。而那些只是出於純粹策略上的考慮，以及因為沒有真正多黨政治而缺乏較好選擇，而被迫選擇勞工管理的人，現在應該大可放心，我們不再需要這種缺乏效率的替代品。

六、結論：雙重經濟

以我的看法，我們在預估未來的二十年時，必須將雙重經濟體系考慮進去，它在過去十到二十年間開始出現於匈牙利，這種**雙重**經濟體系的兩大組合要素，就是政府和私人部門。

首先，政府部門的比例只能慢慢減少，我們應該努力使這種過程更加有效，但不應該懷抱空想。沒有什麼萬靈藥可以把政府部門轉變成真正企業的領域。不管喜不喜歡，政府部門還會有許多負面的特色。因此，我們必須利用嚴格的財政原則和適當的國會監督來將這些負面特色減至最少，並預防政府部門吸收過多的資源，妨礙到私人部門。

私人部門經營的條件必須以一致的態度加以自由化，而其官僚限制應該解除。需要以適當的財政和貨幣工具來促進私人部門快速和有利的發展。同時，我們也不能存有幻想，要知道這是一個逐漸而緩慢的發展。私人 and 政府部門之間的比例，將不斷的朝有利於私人部門的方向前進（我們希望愈快愈好），然而，兩者之間還有好長一段共存的時間。這種共生雖然充滿了衝突和摩擦，但是還會有好一陣子是無法避免的。

註釋

①在寫作這節時，我受到一般財產權理論文獻極大的啓發——如阿秦（A. A. Alchian）和鄧塞茲（H. Demsetz, 1973, 1967）、福祿波登（E. G. Furubotn）和皮荷維克（S. Pejovich, 1974）——特別是那些討論有關社會主義制度財產權問題的著作。關於後者，我想特別指出米塞斯（L. von Mises, 1920）的經典之作，以及雷霍伊（D. Lavoie, 1985）和史瑞德（G. Schroeder, 1988）較近期之作品。

②和提曼（J. Tímár, 1985）以及貝里歐（P. Belyó）和戴克斯勒（B. Dexler, 1985）的研究加以比較。

③本書並沒有對這樣的規定究竟是應明訂於憲法中，或是由國會來通過做出法律的區別。只要說有必要在法律中包含有關此點的基本原則就夠了。

④這意味著私人部門的(b)類和(c)類不再有所區別。所有的私人公司都是合法的，無須特別的執照，那些通常基於非經濟考量而在法律上禁止的情形則是例外（如走私毒品或兒童）。如果是基於國防、公共安全，或其他外在的原因，某些私人活動應該要註冊或取得官方的執照。

法律必須明白指出執照中哪些活動是例外情形，而且必須舉出夠份量的理由。因此，所有其他活動便成爲無須特別執照，而在法律上是可以實行的。這表示和目前的做法有極大的差別，目前的起點剛好是相反的：所有的活動都要註冊或執照才是合法的。至多，我們只能期望有關當局容忍沒有執照的活動。

⑤政府當然有權利徵收關稅。這和上面所提出的要件並不相悖。這一點稍後再討論。

⑥開放私人外匯交易的要求通常會引起下面的反對論調：有一種危險是人們將尋求以美金等強勢貨幣而非福林來保有他們的金錢，甚至會嚐試把他們的錢帶出國，存在國外。

我認爲這是一種錯誤的論證，一種對真正關係的顛倒處理。只有在福林的購買能力動搖時，人們才會把福林處理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會努力以保值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財富，如投資不動產、藝術品、貴重金屬，當然也包括強勢貨幣。任何的行政規定都無法消滅這種動機。唯一的解決之道在於穩定國內貨

幣的購買力。這個問題在第二章會有詳盡的討論。

把強勢貨幣存入外國很可以拿來和移民相比：只有在被禁止的情形下，才值得這麼大費周章。如果邊境大開，人們可以自由進出，那麼大部份人必然會選擇留在國內。因此，如果每一個匈牙利公民都有權可以隨意攜出或帶入美金等強勢貨幣，而且可以在國內私人市場上自由買賣交易貨幣，那麼便沒有在國外持有該貨幣的特殊動機。

- ⑦在目前所建議的制度之下，只要國家銀行體系未能引進福林的可兌換性，必然會出現兩種不同的合法匯率平行存在的情形，其中一種是私人間的匯率。這代表了真實的市場匯率，是以強勢貨幣買賣雙方之間的自願協訂為基礎。另一種則是官方的匯率，這是國家銀行體系所報的價格。這種官方匯率因為是僅由一方（賣出外匯時是賣方，買入時則是買方）運用其行政權力所命令的，所以不具市場性格。

因此雙重匯率的存在一點也不足為奇。畢竟，由於大規模的灰市和黑市外匯交易，我們已經有了私人匯率。如果忽略這項事實，無異是鴛鴦行爲。而且，我們還可以加上雙重價格制度在目前匈牙利的經濟中也相當普遍這一事實：除了政府部門所索取的官方價格，還有正式以及非正式私人經濟中所用的私人價格。我的建議不過是根植於對這項事實的認定，而且也支持私人價格的合法化。這種合法化將會促進私人價格的降低，其中也包括私人的外匯匯率，因為這種制度不再牽涉到伴隨著不合法而來的風險貼水。

- ⑧我相當清楚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嚴格遵守第一項要件。常常辯護或創造剝奪這些自由的法律的人，指的是西方或遠東的經驗。

以我看來，他們的論點在兩方面犯了錯誤。第一項是歷史的錯誤：我們所討論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歷經了長時間的歷史發展才達到目前的階段。而反觀匈牙利，在幾乎完全消滅了私人企業之後，可以說還沒有開始中產階級化的過程。政府在這項發展的早期和稍後階段所扮演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

另一項考量與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評估有關。我們為什麼要把任何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目前的做法當作遵循的典範呢？這些國家的做法在許多方面受到批評。批評家發現了許多缺失，其中有一點是某些已開發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個人生

活以及私人財產經濟活動的干預太過頻繁，我同意這點。在某些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允許有自由外匯交易的情形，而在其他國家則受到或多或少限制。那些想要引用外國經驗的人，應該先決定要遵循哪個國家的典範。凡是宣佈自己贊成匈牙利行資本主義的人，應該牢記在心，泛指一般「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因此，應該更為精確地說明他心中所想的是何種自由化和官僚限制的組合。

- ⑨這和西方文獻中「排擠」(crowding out)的現象類似。
- ⑩在某些特定的例子，這項原則可能有例外。比如，在戰爭或饑荒的時候，為了顧及每一人口層的基本需求，官方對基本生存物資的分配也許是必要的。本書不考慮這些例外情形。
- ⑪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先進的、產業最集中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小規模的公司並沒有消失，而是繼續不斷地重生，即使現在對國內生產毛額還是有相當大的貢獻，證實了他們的存在對市場是必要的。(見D. J. Storey [1983]，書中對許多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中小企業的比例進行了評估。)匈牙利過去幾十年來，在國有化和人爲集中的過程中，被消滅的正是中小規模的公司。
- ⑫上面所說的並不是意味我們應該忽略最先進國家的經驗。凡是可以用到我們的環境中的一切，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要匈牙利自己承受一切去「重新發現」可以直接從現代資本主義中取得的經驗，純粹是愚蠢的做法。
- ⑬在這方面，I. Szelényi (1986, 1988) 刊行了值得注意的構想和實證的參考，這也影響了我對這個過程的瞭解。也請參見P. Juhász (1981) 和I. Petö (1989) 的作品，特別是F. Erdei和I. Bibó開創性的活動。
- ⑭見I. R. Gábor (1979) 及I. R. Gábor 與P. Galasi (1981)。
- ⑮匈牙利私人部門現代化和成熟的速度，有很大的程度是和國家如何能緊緊投入歐洲和世界資本主義血液循環有關。經濟文化從西方向我們流過來，西方消費者對品質較高的需求，和西方夥伴共同從事的商業和製造的組織和紀律，可以產生刺激性的效果。
- ⑯利用提供適當的資訊，以及證明在匈牙利投資的好處，來促進外來投資利益，是不是值得，是另外的問題。

- 17 「市場社會主義」辯論的文獻可說是汗牛充棟。在此，我僅提出最重要的作品：E. Barone (1908)，L. von Mises (1920)，泰勒 (F. M. Taylor, 1929)，海耶克 (F. Hayek, 1935)，和蘭格 (O. Lange, 1936~37)。對這項辯論的經典摘要可見於伯格森 (A. Bergson) 的作品 (1948)。D. Lavoie (1985) 編纂了一本傑出的調查報告。以疏散為基礎之改革觀念的首倡者，在南斯拉夫是B. Kidric (1985)，在匈牙利是Gy Péter (1954a和b, 1956) 以及科奈 (1959)，在波蘭則是W. Brus (1972)，蘇聯是E. Liberman (1972)，在中國大陸則為Yefang Sun (1982)。
- 18 間接經濟控制、經濟管理和公司關係之分析，參見如L. Antal (1979, 1985)、T. Bauer (1976)和M. Tardos (1980)的作品。
- 19 W. Niskanen的作品 (1971) 是有關這個主題最早的研究。
- 20 在有關係龐大的資本主義公司之內，不同的從屬單位獲得部份自主權的方式，已經出版了許多研究，這種部份的自主權隱含著從屬單位好像被當作為了自己的利潤而負責和生產。實際上，情形並非如此，因為站在背後的巨大資本主義公司才是真正的擁有者。
- 21 在此我無法對有關這種思想的全部文獻做一調查，排定這些文獻的重要性順序也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我的印象是M. Tardo的影響最大。亦請見T. Sárközy (1989)。經濟管理諮詢委員會也刊行了類似的思想 (1988)。有關匈牙利政府部門所有權改革辯論的詳盡調查可見於J. Bársony (1989)和L. Lengyel (1989, 153~185頁)。
- 22 在美國和其他已開發的工業國家，組織有特定的財務機構來援助這些「風險資金」。
- 23 日報上報導一家英國公司購買了匈牙利Gans汽車廠的控制股權。英國方面付了兩百萬英鎊的現金。一千萬英鎊的餘款將以連續的分期付款支付。兩百萬英鎊的頭期款是筆驚人的數字。我很熟悉目前在美國麻州波士頓地區自由持有的公寓之價格。如果我們以一普通、品質良好、七十平方呎的公寓價格做為一個單位，我們會發現，英國方面所支付的現金數額最多只能買十二間這樣的公寓。如果工廠的有形資產完全一文不值，Ganz這個品牌還是值得買價的

好幾倍。這樣地浪費匈牙利國家的財富實在是令人無法接受。

- ④ 南韓政府以設立一個所謂的韓國基金，做為外國人購買韓國財產的唯一管道，以這樣的機關和法律架構來規範類似的過程。這種例子當然值得仔細研究。
- ⑤ 這個比喻是借自A. Nagy。

第 2 章

穩定化的手術

以下我假設新政府是自由選舉的結果所組成的，而且這個政府得到國會的信任和選民的支持。分析這極端重要發展所必要的政治條件，或者考慮其展望，則遠非本書的任務。至於經濟政策和政治的關係則將在最後一章討論。在此，我想要考慮的問題如下：這個新政府應該施行什麼樣的穩定化計劃？

目前的研究證明了某些必要工作的執行不應該拖長，而且無法以一連串的小步驟來完成。這些措施必須**一口氣**來做——當然，不一定是字面上的一口氣。我並不是說所有必要的管制都必須毫無例外地在同一天實施。以下所列的日程表只是用來說明我的觀點，不應該當作具體的建議。

在新政府開始施政的一年內完成一套措施應該是可能的。這項「手術」必須在一明訂的日期開始，而且基本上應該在施政措施規劃完畢之後的一年之內完成。某些可以預測的手術要件應當事先告知大眾，其他則只有隨著手術的進行才會知道。在手術進行之前和進行當中，民眾都必須被充份告知可以預測的「手術之後」的措施。

顯然，在組成政府的時候，這項手術和其主要的政經要件就必須得到同意。這些要件加起來也許可以成為新政府經濟計劃的一塊基石。

我們必須給政府機關，比方說是一年的時間來規劃細節。❶自然，本書無法提出需要許多專家費時好幾個月的工作。我在此的目標沒有那麼大：我希望盡可能清楚地提出一些主要的原則。

這樣一個穩定的計劃範圍必定涉及數以百計特定的問題。本研究可視為是此一計劃最初的簡略輪廓。儘管這種概略的形式，根本說不上完整，而且有一些重要的議題甚至完全跳過。

以下所列的原則可以受到質疑，但是，我很確定無法迴避任何一個原則。競選時的政策演說會試著模糊這些議題不是不可能的。告訴甲政黨或乙政黨如何得到最可能的選票，不在我討論的範圍。至於該期望政黨事先對選民透露多少本身的困難，又有多少應該可以自由地保留到往後的討論，關於這樣的倫理和政治問題，我也不想表明立場。譬如，我不會提出一份清單寫明在聯合會談時應該澄清的問題，以及另一份在新內閣辯論時所應該決定的清單。結果是，我把焦點放在回答以下的問題：新政府的工作是什麼？

當然，有些批評家不會同意這份綱要。但是我要建議，在目前我們先把次要的問題放在一邊。無論如何，對這些次要問題的解決方案，將由稍後更多專家團體來合力解決。在政治和經濟辯論中應該強調的是真正基本的問題。

這項手術有好幾個要件。首先我將一一討論這些要件，然後證明贊成同時實施的好處。

一、停止通貨膨脹

手術的最先、最重要條件的是，瞭解通貨膨脹是一項嚴重的問題。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清楚地看出這點的。有相當多的政府官員和經濟學

家輕視這個問題，尤其是假定通貨膨脹是「在掌握之中」，因此更不以為意。在他們看來，匈牙利有通貨膨脹是命中註定的，因此是無法避免，只能忍受。

很顯然，反對黨或執政黨都沒有清楚地許諾如果選舉當權後要消滅通貨膨脹。

以下是財政部長László Békesi所說的：「很遺憾，在未來幾年內不可能解決通貨膨脹。一方面，這是早先隨興所至的經濟政策的遺物，因此產生了目前的失衡和缺乏效率。另一方面，通貨膨脹不過是伴隨結構調整而來的自然發燒。」^②我無法同意這項說法。通貨膨脹存在是因為現任財政部長和以前的那些部長辦事的態度是「隨通貨膨脹去吧！」**唯有**目前的財政部長或是繼任者的政策轉變為「不要再有通貨膨脹了！」才能停止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並不是自然災害，而是由政府或政府背後的政治力量所造成的，因此唯有政府和政治力量能夠結束通貨膨脹。^③

認為行政單位是通貨膨脹過程中**唯一的**肇因者和最終的解決者，這種說法雖然有力，但是沒有必要引導到極端、而且顯然是錯誤的結論。這是一場許多人參加的遊戲，通貨膨脹是掌握在所有那些參與制定財政政策，或決定價格和工資的人的手上。在以上的分析中，民眾不管願不願意也會成為通貨膨脹的促成者，因為他們在設定經濟計劃時，必須把未來價格的上升計算進去。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這種**通貨膨脹的預期心理**，很遺憾的，這已經出現在匈牙利了。這種期望如果超過某一點就會成為**自我實現**。^④如果領薪水的人預期通貨膨脹為百分之二十，那麼他們就會努力獲得不小於百分之二十的加薪。而產品或勞務的出售人，目標會訂在最少提高百分之二十的價

格，但是在這多重角色的戲碼中，我們仍然有必要區分「配角」和「主角」。不管制度為何，在通貨膨脹這齣戲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政府，更確切地說，是財政主管單位。尤其在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更重；社會主義政府對價格和工資、信用體系、投資以及其他的經濟過程運用影響力，其程度之強遠非資本主義制度所能比。

最後，政府控制了鈔票的印行，而且發行額外的鈔票主要是因為想要彌補政府支出和收入之間的差額。再者，在一個擁有龐大政府部門的國家，政府為了使虧損的公司生存，並支付高得不可收拾的工資，只好訴諸鈔票印行。這便是為什麼通貨膨脹的基本責任在於政府。

有些卓越的經濟學家，其中也不乏著名的改革論者，建議政府謹慎地處理通貨膨脹的政策，這是改變不了任何事情的。這項建議已經證明是錯的，而每一個政府都應該為選擇本身的顧問和政策的啓示者而負責。

其他國家也被通貨膨脹所困，這一再出現的藉口，也不能用來充作匈牙利應該有通貨膨脹的理由。畢竟，法庭上的被告不能以他被起訴的罪行也有好幾十個人同樣犯過這一事實來脫罪。

我堅決地相信，目前匈牙利的通貨膨脹率，比官方統計數字所顯示的要高出許多。官方計算並沒有給予私人部門的價格適當的加權，特別是沒有正式登記的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的價格水平，其上升的速度要比政府部門快得多。我們不應該忘了私人部門所提供的產品和勞務，佔總消費中一大部份，而且有日漸擴大之勢。通貨膨脹的報告還有其他的扭曲。很遺憾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組織贊助獨立於中央統計局這個政府單位之外的研究小組，來負責計算通貨膨脹。我期

望這個小組能公正地採用證據充份的經濟和統計原則，同時能留心數百萬「門外漢」所說出的看法：通貨膨脹上升得比官方報導所承認的還要快。

讓我們把計算的問題放在一邊，而假設目前的通貨膨脹率確實大約在百分之十五～二十之間。我還是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原因至少有兩點。

1. 通貨膨脹無情地降臨在大眾身上，而且會導致不斷的動盪。人們看到自己一點一滴存起來的錢在手上融化了。

近來我們常聽到要求**重分配措施**的呼聲。但是，通貨膨脹所實行的是一種特別的永久重分配，主要影響到很窮的人、薪水階級，和領取養老金的人。鰥寡和年老的人看著自己的養老金在幾年之內就消失了。兒童和家庭津貼的購買力持續在下降。在價格和名目工資的拔河當中，失敗的總是那些缺乏適當組織支持和政治影響力的人，因此無法利用怠工，或是公開或潛在的罷工威脅來提高工資，以追上物價上漲。

我已經讀過許多文章，也聽過許多政論說到福利政策如何可以幫助窮人。在此，我不對這個問題表達立場，而是要加上一點評論：相當令人震驚的是，這些意見中大部份都全然跳過通貨膨脹這個問題。我認為，今天在匈牙利所有提出福利政策計劃或意見的人，都應該有義務從說出他們對通貨膨脹的看法開始。他們是不是不願再多做努力，而放任通貨膨脹繼續下去？更重要的是：他們所提出的措施是不是會造成更嚴重的通貨膨脹？

2. 通貨膨脹違反經濟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標，大部份是因為使得合理的經濟估算成爲不可能，隨著價格相對變動的效果，因價格水平的

普遍上升而模糊，價格便不再能履行充當信號的功能。假使商品A和B是替代性商品，再假設商品A比商品B便宜，那麼簡單的經濟邏輯會認為商品A的價格會上漲。在這背後，有一項心照不宣的假設就是，商品B的價格維持不變。但是，如果商品A漲價之後，商品B也做了通貨膨脹性的價格上漲，那麼價格的相對變動就無效了。

在市場經濟中，生產的效率表現在生產者的利潤上。同時，無效率的生產導致虧損，而虧損的生產者遲早必然會被市場驅逐出去的。唯有以這種方式，市場經濟才能對生產的效率有所貢獻。雖然這種選擇過程即使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也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實現，但是，統計上的實現機率是相當高的。不過，在通貨膨脹的環境之中，這種選擇的過程就遭受破壞了，因為有效率和無效率的生產都可以自我辯護。即使工作的品質非常差，生產單位遲早會利用漲價來補足其成本。這些想要提高價格的單位，永遠不會被迫承認可能是他們做得不好，但總是可以提出成本增加來做藉口。即使所有權的情況許可，公司的預算限制也不能加以勒緊；即使在私人部門，通貨膨脹也放鬆了這些限制。

讓我們回想匈牙利的私人零售商做得並沒有比國營公司來得好，而且顧客也會產生不滿。但是不管怎麼樣，他還是能夠設定高價格。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不應該指責這個零售商是貪得無厭的騙子。經濟制度無法建立在自制的聖人之上。問題在於通貨膨脹的過程製造出大量的貨幣，使匈牙利的消費者能夠為這些私人零售商所提供的差勁服務，付出如零售商所期望的高價。

這項觀察更可以用於目前匈牙利的政府部門。我們實際上可以看到某一特定地方的傳統舞蹈。參加的人有物價控制局，負責制定官方

價格；生產性的國營公司，決定那些可以以自由價格出售的產品價格；商業銀行，分配政府的錢；國家銀行，使貨幣流通，並據說能夠管制貨幣的分配；以及財政部，負責預算，但其支出總是超過收入；最後一個，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參與者便是政府，和政府背後的政治勢力。每一個演出者都把指頭指向別人，而且每一個人在「通貨膨脹」這一幕的時候都利用機會指責別人，其實自己也扮演了類似的角色。但是，等一等——所有這些都是相同政府的機關！他們非但不是彼此獨立，而且加起來正組成了本書第一章第二節所說的「政府部門」。

只要官僚政府所有權依然是經濟中佔有優勢的部門，就不可能對國營公司執行強制性的預算限制。此一事實主要可以歸因於社會學上的理由。這和國家不管願不願意，必須肩負著和自己的公司之經理人和員工安全就業有關的保證，有密切的關係，政府實際上無法做出將工作完全消滅的決定。除此和其他相當的社會學上的因素之外的，還有通貨膨脹的影響：原本已經是鬆散的預算管制，又因為通貨膨脹而更加鬆散。如此，就無法決定國營公司是不是做得好，而找出成本上升背後的原因也同樣地不可能。唯有某些生產元素的價格上漲，而其他元素價格不變；同樣的，唯有部份而非全部的銷售價格應該上漲，如此分析成本，才會使效率產生意義。但是，一旦所有的成本和所有的銷售價格全面上漲之後，評估國營公司活動就變得幾乎不可能。

讓我們來環顧這個世界，凡是愈贊成市場自由運作的政客或經濟學家，就愈反對通貨膨脹。反過來看，如果愈贊成國有化，就愈不關心通貨膨脹。

因此，手術基本的任務之一便是終止通貨膨脹的過程。總合供給和總合需求必須均衡。實際上，手術的精義相當簡單。假設有某個總

合供給，與之相對的是某個總合需求。整體而言，我們允許價格自由競爭，在這種情形之下，到了某個價格水準便會產生均衡。讓我們更加仔細地來看一看這個關係中的三項變數。

1. 事先精確地預估預期的**總合供給**是不可能的。重新安排的過程可能減少某些部門的生產，而增加其他地方之生產。好幾個分支機構、公司和地域的勞工短缺，可以吸收出現在其他分支機構、公司或地域的剩餘勞工。重新安排的過程使我們有機會重分配勞力和其他物質資源。重點是：第一章三十三～四十頁所列的要件執行得愈好，私人部門繁榮發展的機會愈大。以私人部門的擴張來平衡許多國營公司的收縮是相當理想的。依據以上所說的，我們可以假設，也許在經過一些劇烈的波動之後，總合供給會回到手術之前的水準。換言之，為了使這個簡短的說明更加簡單，我們假設在手術最初轉型變動之後，總合供給多多少少會有一段時間**保持不變**（當然，我們希望稍後會再開始成長）。

2. **總合需求**在手術開始時可以保持不變。但是，在短暫的過渡時期將無可避免地有輕微的增加。然而開始手術之後不久，就必須加以嚴格控制。手術有一重大的部份，便是對總合需求和其所有組成要素加以嚴格地限制。後面有一節將會對這個問題有更詳細的討論。

3. 如果總合供給是既定的，並面對一既定的總合需求，那麼問題就來了：供需達到均衡的**平均總合價格**水準為何？我想大概沒有人可以確切地說出到底是多少。對於複雜的循環價格和成本外溢之全面影響，無法精確地計算。⑤我所提出的這套做法，和重複實施於蘇聯，並且有一兩次實施於東歐較小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那套做法全然不同。蘇聯和東歐國家那些做法簡而言之就是：努力在事先算出所有即時的價格和成本的影響。以我們的做法而言，就沒有必要在主管物價當局

的辦公室事先訂出數百萬種的物價，因為價格會適時的出現在市場上。

手術最後，多半會產生和目前水平比較起來有相當漲幅的平均物價水準。但是，只要政府從一開始就堅持反通貨膨脹的政策，這就不會是一再重複的發展。隨著手術而來的價格上漲不一定會導致通貨膨脹。即使價格水準的上漲超出手術前幾年平均的通貨膨脹率，還是不一定會造成往後加速的通貨膨脹。我們必須清楚地瞭解到通貨膨脹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是價格、工資和其他成本因素螺旋狀地增加。如果切斷這螺旋，消除了總合需求的過度繁殖，那便是消滅通貨膨脹很好的機會。而這正是我們所必須達到的。

二、恢復預算平衡

時下流行著一種宿命論的平衡預算的方法：感到沒有行動的能力，而且覺得這種財政上的失衡是無可避免的。

國外不乏這種例子。其中一個例子是美國嚴重持續的預算赤字。如果連美國都無法克服這個問題，我們匈牙利人怎麼能克服呢？美國預算的情況和匈牙利的預算是毫無關係的。由於美國的情形和匈牙利有極大的差別；因此，這種說法是缺乏邏輯的。說到美國，讓我來簡短說一下，在美國，差不多所有的經濟和政治團體都認為預算赤字是一項重病。但是，一旦說到要找出解決之道，民眾和代表美國民眾的國會就會出現不同的意見。有些團體想要加稅，但其他的則強烈拒絕這個意見，而表示願意肩負赤字的負面結果。

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好幾個資本主義國家預算赤字曾經是或者現在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也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如瑞士、芬蘭和新加坡）多年來卻能夠在沒有預算赤字下運作其經濟。

平衡預算的方法，和在赤字情況下重新達到平衡的可能性，是西方經濟學家爭論的焦點。對於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預算政策加以批判，顯然不是本書的任務。⑥這裡只要說出一個負面的陳述就夠了：資本主義的歷史並不能支持保持預算平衡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用來支持平衡預算是一項無法接受而且辦不到的目標。現在該是停止指向當代資本主義，而轉向我們自己的情況的時候了。

我相信在穩定化手術的過程中，必須以某些劇烈的措施，來完全恢復預算平衡。在這麼多年預算失衡之後，能夠以收入來平衡支出是不可錯過的機會。

在平衡預算上，消減公共支出的必要性，是辯論和政治聲明中時常出現的。我完全同意降低支出的呼聲，但是，目前我不想對相關的工作多作論述。如果我們把消除補貼考慮進去，我們還是要面對某些預算支出用來支付政府行政和軍事成本，以及政府和國營部門的外債，和經濟及福利的支出。我提議的核心就是這麼簡單：每一年所收的稅額應該訂在足夠支付該當年之支出。當我們在為手術做準備的時候，我們不可幻想比預期支出的削減還高。誠然，這種方式可能會使政客受到歡迎，因為一般人傾向於支持提出減少政府支出，而不是宣佈增加歲收的人。但是，這個問題不能以舉行受歡迎程度的比賽來解決。手術計劃應該明確守地訂出用來支付支出的必要收入。歲收稍微超出所需的數目，要比所需要的就少那麼一個匈牙利福林來得好。

以上這些都使得對稅制作大幅修正成為必要。目前匈牙利的稅制不過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下父權權威式的重分配、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財政的無能、以及斯堪地那維亞福利國家精煉的累進稅制所交錯的混合體。那些努力研究匈牙利的新稅法，並想要說服經濟領袖接受這

些意見，特別是針對大部份國會議員和部份民眾的人，開始是建議匈牙利扮演小瑞典的角色。就如同布達佩斯所流行的一則諷刺笑話所說的，我們現在所有的，是匈牙利的工資減去瑞典的稅。很遺憾地，有一些無能和膚淺的西方觀察家也被騙了：他們有意看到新匈牙利的稅制成為這個國家「西化」的象徵。

當我們坐下來草擬穩定化手術中的新稅制時，我們應該以去掉目前的制度來開始——如果不是真的去掉的話，至少應該從我們的想像中除去。讓我們回到起點，有系統地來思考新稅制的主要原則。⁷我不打算說得完全；我只強調那些在目前的稅制修訂和穩定化手術準備的過程中，必須考慮進去特別重要的原則。⁸

1. 假設我們選擇在技術上最簡單的稅表，凡是「可觀」的稅都應該徵收。這一點，表面上看起來和技術官僚有關，絲毫沒有道德意義，實際上暗示出相當重要的道德和政治的要求。

我們所討論的是匈牙利，不是斯堪地那維亞。在過去，官方宣傳說國家屬於人民的聲音愈大，人民愈是不相信。現在，如果有人欺騙了國家，竊用國家財富，或是規避自己的義務，一般人都認為是值得稱讚的舉動，而沒有什麼好感到羞恥的。那些不這麼做的人，反而被視為呆子。到處都有青少年吹噓自己沒有付公共電車的車資。在過去的幾十年，這一類的欺騙甚至已經在匈牙利成人之間成為典型的行為。不管發生多麼大的政治變革，期望這種行為在一夜之間加以改變，都是缺乏理性的。特別是，不能期望這種行為在人民所選出的代表負責控制財政之後，馬上改變過來。沒有人能夠預測公眾態度的轉變要耗時多久，我們只能保守地假設，至少需要兩三年的時間。

因此，當我們在計算預算歲收時，應該準備面對許多公民將會努

力地規避稅負的事實。他們在可能的限度之內，將會短報所得。西方人也這樣做，雖然在強度上各國可能有所不同。我們假設這個問題在南歐比在北歐更普遍，雖然租稅道德在斯堪地那維亞也在漸漸褪色。以匈牙利的情形言，還有另外一個因素：私人部門中有相當大的一部份還是屬於影子經濟，只有在一段時間之後，才會自願地從陰影走到亮光中。第一章已經詳列了發生這種轉變所需要的要件。

在這些情形之下，稅制極端依賴自動報稅 (voluntary tax returns) 又有什麼意義？

第一個可能的答案是：政府在建築空中樓閣。依賴大部份永遠徵收不到的歲收，不過是欺騙自己罷了。

第二種可能：政府採取合理的做法，並將公民無論如何都會想要欺騙的可能性納入制度之中。這種做法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相當不誠實。這意味著通過稅法的國會議員、執法的官員，以及這些詐欺的人交換了心照不宣的眼神：「我們相當清楚那些正直的傻瓜會繳稅，但是，我們甚至不敢期望從那些存心規避的人身上徵到稅收。」

最後，還有第三種可能性：不但沒有心照不宣的眼神，反倒決定努力徵收個人所得稅。但是在一個租稅道德非常低落的國家，政府又能怎麼做呢？目前稅務當局正想這麼做，但是做法並不一貫。稅務當局試著對納稅人進行偵察：調查所得來源和支出形式；鼓勵人民向警方揭發任何可能非常富裕而沒有善盡納稅義務的鄰居。最後的解決方案會是歐威爾式的制度 (Orwellian System)。每一個家庭裡都要有一個稅捐稽查員對這個家庭每天的收入和開銷隨時注意。在這種情況之下，允諾給稽查員「按件計酬」自然是划算的，當然每一個欺騙的公民都會適當地給予這些稽查員報酬。

光是這種制度的可能性就足以嚇壞那些贊成個人自主，希望公民能自由地處理自己的金錢，並要求對隱私權完全尊重的人。⑨

因此，第一點不只是個技術上的問題。我不想對全世界的稅務當局開出處方，而只陳述匈牙利今天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夠避免所有上述困境的稅制。這種制度不應該測試公民的忠誠度，也不應該強迫立法人員和官僚插足家庭的私人領域。同時，這個制度應該足以徵收到維持國家所需的賦稅。稅目應盡可能地是**非個人**色彩。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民主將能鞏固於匈牙利，大部份匈牙利的公民將會再度地隸屬於國家，而所有必要的情況將確保私人部門順利的運作和合法性。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可以開始考慮普遍的個人所得稅。

2. 稅制應盡可能地**中立**。除了理由正當的特殊情形之外，政府不可以以稅制來達到獎懲的目的。如國家或地方的立法單位基於福利、文化或其他社會的考慮，決定給予某人補助的作為應該公開。⑩為達到這個目的，應該在**支出面**保留個別的项目，而不是在**收入面**使用減稅的方法。我不想加入是否對所有的學童提供免費的教科書這持續不斷的辯論。國會有權在這種政策上做決策，當然要知道分配所需要的資金，意味著要削減其他地方的支出，或者是增加額外的稅收。一旦議員們投票贊成免費分發教科書，所產生的費用應該列於預算的支出面，在「教育支出」的標題之下，並且是在「文化補助」的项目之中。這筆錢絕對不應該流失在教科書出版商或是書籍經銷商的減稅之中。

因此，第二點的具體意義是，不管所用的稅目為何（消費稅、薪資稅，等等），稅率應該**嚴格一致**。我們必須終止對某些產品、勞務、活動或社會團體任意武斷的免稅。我們是需要福利、健康和文化政策，而這些都需要政府的補助，但是，所需要的資金不應該利用操縱稅率來

募得。未來的政治力量應該宣佈他們將不會屈服於遊說、壓力或是威脅之下，而且不會背離一致的稅率原則。

很巧的，這項原則從市場經濟的觀點來看也是非常重要。如果沒有真正的價格，便沒有真正的市場。不公平的免稅必然會併入價格體系中，因此會使我們對每一項產品的真實成本沒有清晰的概念。而且既然價格體系中所有要素都是彼此相關的，所有的價格將會以整套的價格和工資的成本形式出現。最後，歧異和混亂的賦稅便會扭曲了價格體系。真正依附於市場經濟的人應該堅持一致的稅率，也就是盡可能中立的稅制。

3. 沒有必要採累進稅制。我很清楚這種想法在匈牙利會震驚許多人，因為大部份人都是支持累進稅制的。但是，我還是覺得不應該採取這個觀點。

所得分配主要是個**道德**問題。這便是為什麼如果純粹是以理性的理由，沒有人可以說有辦法決定什麼才是「正確的」所得分配。有人對於所得和福利的**平等**賦予內在的價值。這些人寧願以較低水平的效率或是較少的國民所得來換取產品的平均分配（或至少是盡可能平均的分配）。和所有其他的道德觀點一樣，這也是超理性的，也就是不會產生理性的反證。在此我所能做的不過是說明，我並不同意這種平等的要求。看到大部份的人被拖到最低的公分母，並不能給我任何道德上的滿足。我對於到底應該為窮人、殘障者的福祉做什麼努力這個問題的處理方式，和是否應該剝奪富人部份的所得和財產這個問題是分開的。

「平等」是具有許多層面的複雜道德價值。有好幾個成份我可以完全認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拒絕因社會背景、膚色、宗教、性別而造成的特權；基本人權上的平等——這些是我價值體系中相當突出

的一些平等原則。而接受這些價值和拒絕物質所得的平等化是完全相容的。

同時，我同意那些希望強制執行**分配的社會正義**原則的人。當然，這使得「社會正義」這個觀念如何定義的問題有公開討論的餘地。有一項我也同意的觀念，認為分配制度唯有在確保社會中最貧窮的人口層長期的物質條件之持續進步才是公平的。①

我要強調這項原則是**動態**的要求。這個原則並沒有論及最貧窮的人在一特定的時刻由特定的國家所得中得到多少確切的數額。因此，這並不是一種靜態的重分配需求：其中並沒有以橫斷面的意義來衡量，使窮人和富人財富相比的情形。這項要求有一時間性的層面，因為是拿今天窮人的景況和明天的景況來相比。其所要求的制度是這種時間性的比較能產生好的結果。窮人不應註定過著窮困無望的生活；他們應該對穩定進步的許諾有正面的感覺。②

當然，這項要求並不是要指出數學意義的單調進步。這並不是主張要承諾窮人的景況每一星期都有穩定的進步。但確實是主張要承諾在可預見的未來，比如每一兩年內所有窮困者的經濟狀況有看得到的改進，不能對此有所保證的社會便是不公平的。

這個問題並沒有討論到社會中其他不是在比例尺最末端的成員的所得分配該是怎麼樣。同樣的，這個問題也有許多道德層面，但是，這些不在本書的討論之列。在此我僅強調那些和手邊的主題有密切關係的層面。所得分配必須給予能增加社會總所得者**最強烈的誘因**，因為這是**穩定**增加最貧窮的人之所得的必要條件。利用重分配的手段來改進最窮困的人的命運，只能提供有限的展望。拿一塊麵包，將之平分給由N個人組成的一群人：那麼每個人得到的便是 $1/N$ 。因此，唯有

在被分配的麵包愈來愈大，上述正義的要求才能被滿足。因而，社會正義的要求和誘因的要求是不可分的。不考慮這項要求的政客或經濟學家，最好不過是個急性子，最壞可以說是個煽動家。這便把我們引到與稅制有關的最後一項普遍要求。

4. 稅制不應該對有經濟表現和增加投資的行為產生**反誘因**。對於那些願意犧牲部份休閒時間超時工作的人，不應課以累進稅，也不應該強迫他們隱藏這個事實來欺騙國家。稅制不應該懲罰那些沒有把錢藏在床底下而是將錢存放在銀行孳生利息的人。

姑且不論稅法草案在國會討論的真正日期，我建議，議員心中應總是記得下面的問題：租稅對經濟表現、生產和投資會有什麼影響？如果對於以上任何一種情況所造成的影響是負面的，他們最好不要通過這項法案。這樣的稅法將不利未來匈牙利經濟的發展。從福利的觀點來看也是有害的（見第3點有關幫助窮人的論點）。

最後，從嚴格的財政觀點來看也是不利的。有許多關於財政政策知名的研究，利用理論模型和實證計算來指出稅率和歲收的重要關係。對一個停滯中或景氣不看好的國民所得加諸高稅率，誤以為能徵收到高稅收，其實是錯誤的財政政策。反之，如果財政部避免用過高稅率所造成的反誘因，那麼在增加歲收方面便會更成功，而且如果一旦為國民所得快速成長開了道，即便是較低的稅率，也能徵到較多的稅。

在簡短地看過稅收的主要原則之後，且讓我們更具體地來檢視這個制度付諸實現所需要的稅目。研究出詳細具體的稅收方式並非本書的工作。我只是想指出，在匈牙利目前的情況下，哪些是我認為應該佔大部份預算收入的稅目。

(一)最重要的是**線性消費稅**，或更精確地說，其最近的形式，即某

種加值稅。⑩這種加值稅的應用大部份可以憑藉目前的稅制。但應該和目前制度所不同的是，必須以堅定一致的態度來執行。⑪

廢除累進所得稅的建議，時常遭遇到透過差別加值稅率來表現若干漸進性的建議；譬如，奢侈品施以較高的稅率，而大部份是低所得家庭所消費的物品則採較低稅率。我並非毫無條件地拒絕這種想法，因為我尊重公平分配的要求。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其中可能有很大的缺點。差別稅可能受到壓力，為各種特定情況採行低稅率開放了方便的大門，而且會加速價格扭曲的再出現。因此，在最初的幾年，單一稅率應該是較好的。往後，當進化到一合理的、市場結清 (market-clearing) 的價格結構時，基於重分配正義的理由，可以重新考慮稅率差別的問題。

(二)應採單一線性 (非累進) 的**薪資稅**。所有從事合法活動的僱主對於付給員工的任何薪資都必須繳交薪資稅。

我認為在賺取的所得稅收上引進任何的累進方式完全是有偏見的做法。政府基於什麼理由來懲罰那些願意犧牲自己休閒時間逾時工作的護士、教師、工人或是店員？

在此我的批評不只是指向延長工時，也針對了依照所做工作的品質而造成的差異之做法。讓我們假設A工作所做的工是B工作所做的工的四倍價值，因為A需要較佳的技術，擔負較大的責任，或者是較為耗費體力。那麼在毛額上付給A工人四倍於B工人的工資，但是，在累進所得稅抵減之後，他們的淨工資的比例只是3:1，這樣有什麼用呢？這不過是一種完全多餘的稅收程序，只會使管理薪資和稅務的人員增加額外的負擔。⑫

(三)應採單一線性 (非累進) 的**營利稅**，這一項稅率應該嚴格統一。

因此，相同的稅率應該用於所有合法登記的公司利潤，不管公司是為國家所有，或是私人個人所有；也不計較業主是匈牙利人或外國人。

把(二)和(三)這兩項連起來看，有人可能會反對這些做法未能對在「正常」註冊、有形的公司之外的所得徵稅。這可以被認為非常不公平，因為很可能有相當高的所得是來自這個領域，而這些所得又逃了稅。

這種困境當然相當真實。且讓我來建議一個實際的做法。在仔細權衡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不應該把所有「不可見的」所得丟進同一的籃子裡，而應該執行以下的分類以利分析。

(1)公民利用各種形式的兼職打工賺取金錢或得到實物支付：有些市面上的水果是他們園中所種的，祕書則做額外的打字工作，譯者從事翻譯，女學生當保母，等等。整個社會都會因此而受益，因為這些活動都會增加國民所得。現在讓我們回到這種所得依然是沒有課稅的這一層。我上面所說的也許更能在這些所得之上：因為不可能只為了二十四小時監視公民的所得，而對每一個公民指定一個稽查員。我們退而求其次將這些所得給以免稅的實際做法，同時也是增加這些產品和勞務的誘因。今天，當「正式的」生產幾乎遲滯時，如果積極、自我犧牲的人，為社會產生更多的產品和勞務時，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

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不可維持對小費和賞錢課稅這種奇怪的法規。譬如，在匈牙利，不僅是侍者和計程車司機，連在公共醫療服務的醫生和護士，以及出售供應短缺的物品的銷售員，都會得到某些賞錢。一方面，對賞錢課稅會迫使那些得到小費或賞錢的人要求實際上並非他們正常報酬的費用。另一方面，那些賺得大筆數額的人可以盡量地掩飾。因此，這種稅制只不過會更進一步破壞法律制度的權威。

(2)我的建議並不是要對規模如工廠大小的私人企業免徵營利稅。私人部門中的「灰色地帶」，也就是其活動沒有受到法律嚴格地監管，但也不是完全合法，這個地帶目前相當大。本書的精神是建議私人公司和業主能毫無畏懼或羞恥地公開踏入完全合法的領域。實際上，我們提供給私人企業主的是「互換的交易」。私人企業主可以擁有法律的保障，以及保證對私人契約之強制執行；不過，條件是他們和較容易控制的國營公司一樣，也必須付稅。我們也可以假設在私人部門之內有些個人或團體會選擇留在灰色或黑色地帶。但是，這些人必須將他們可能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性考慮進去，原因包括逃稅。而且，他們也應該要瞭解，如果他們被訂約的對方所欺騙，不管是國營的公司或私人的企業，買方或是賣方，他們都不會得到法律的保障。同樣地，他們也會喪失對他們不好的任何官方機構起訴的機會。

而且，更重要的是，灰色地帶的消費者也冒著同樣的風險。譬如，如果碰到毀約的情形，他們不會得到任何保證，也沒有獲得賠償的權利。一個國家愈是能成功地確保私人財產的安全和權威（參考第一章：私人部門），私人部門愈是值得走出黑暗，因此就要接受納稅的義務。這是對私人部門課稅唯一實際的方式。

在此，我還要回到反對累進所得稅這個論題。

在匈牙利目前的情況下，空想課徵累進稅，整體而言是不切實際的。從事實的觀點來看，所得稅的負擔不過是落在那些所得在官方記錄中「有跡可考」的人身上。而在這些人當中，稅收又將最重的負擔加諸於其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不足以將這項負擔轉移到別人身上的人。那些所得雖有記錄，但是其交涉地位夠強的人，實際上還能利用稅額來「增加」所得。僱主不得不付出員工願意工作的毛工資。員工

以這種方式終於把稅負轉移到別人身上。累進稅也影響不了那些能夠利用漲價而將稅負轉移到消費者身上的私人企業主。最後，影響最少的是那些政黨稅務宣傳家認為應該負擔最多的人：即「不可見所得」的收受者。

現在，讓我們回到預算收入的調查方面。

④雖然從技術上來說算不了一種稅目，但是，在此我還是要提關稅。如果關稅對於平衡預算支出是不可或缺的，那麼規模應該要小，盡可能不要影響到物價水平。而最重要的是，對所有跨越國界的進口產品應課以單一線性關稅。（我不想討論匈牙利是不是想要對來自不同國家的某些進口交易，課以附加費用或非優惠關稅的問題。）除非是理由正當的例外情形，不同產品的關稅應該沒有差別。⑤關稅應該嚴格統一，不管進口商所申報的是咖啡還是電腦，是汽車還是小孩子的衣服，如此才能避免相對價格的扭曲。

對觀光客給予合理有限的免稅配額是可行的，但是，所有超出配額的項目都應該要課稅。只要是付了單一的關稅之後，所有的個人應該都可以自由地進口他們所希望的任何貨品，而且數量不限。這裡有一個最近的例子。個人應該有權以先前在私人貨幣市場所獲得的強勢貨幣（如美金、馬克等外匯），來購買不限數量的電腦，而且應該可以自由進口這項設備。一旦個人付了單一關稅，應該有權以自由價格來出售他所進口的電腦，所謂自由價格即買方願意付出的最高價。

私人自由進口的權利是公民無條件的法律權利。用於進口的外幣來源是另外的問題。只要公民是在私有市場上取得外幣，便不會產生經濟問題。在穩定化的手術當中，最後必須發展出一真實統一的匯率，並引進兌換性，這是絕對必要的。當然，以這種情形來說，在國家銀

行以匈牙利福林自由地兌換可兌換的外幣，也成為每一個匈牙利公民可以強制執行的公民權利。

雖然目前我們的主題是穩定化手術，但是，也值得提一下和私人進口有關的更進一步的問題：在穩定化手術完全實施，真實的匯率和真正的兌換性得以確保之前的這段時期，我們該怎麼做呢？以我的觀點來看，在面對著非真實的匯率，要國家銀行保證每一個公民，基於公民的權利都可以兌換龐大數量的外幣是沒有意義的。國家銀行匈牙利福林之可兌換性成為公民權利，應該是穩定化手術的一項結果——但是，這必須由適當的經濟情況來支持：合理的自由價格和合理的外匯匯率。

我列舉上述各項收入，目的不在詳盡完整。還可能有其他的來源（譬如說，費用）。^①但是，一旦要規劃手術的時程表，歲收主要來源（消費稅、薪資稅、營利稅和關稅）的總數，**必須**能平衡真正的支出。醫師手中的手術刀不可以震動，稅率必須訂在能完全確定可以平衡支出的水準。稍早，在報章雜誌、政治演說，以及國會對政府預算和稅法的辯論上，關於預算收入面的爭論，有不少驚人的業餘性評論。這些評論所產生的印象是整個問題可以歸結到：「誰來付賬？是預算，還是人民？」貪婪的財政官員要是能夠把責任推給人民，就會有勝利的感覺，而「人民的捍衛者」要是能夠把責任推回給預算，也同樣感到得意洋洋。同時，他們卻都沒有看到，負擔**所有成本**的是人民這一事實，當然，例外的是政府暫時將責任推到一小部份的外國來源。但是，換來的是更多的外債。這項債務終究必須由目前和未來幾代的人民所償還。所以，要考慮的絕對不是在預算和人民之間**做選擇**。這個問題總是與不同人口層之間，以及目前和未來世代之間**負擔的分配**有關。

另一個問題與人民該以何種**形式**來平衡這些成本有關。有許多不同的路徑可供選擇：人民可以支付內含稅（消費稅）的價格；人民可能面對一個表面的解決之道，好像是由僱主來付稅（薪資稅）；也可能經由通貨膨脹間接地被課稅，等等。但是，不管採用什麼方式，付帳的總是人民。現在，既然這是無法避免的情形，那麼，至少我要建議，稅收的過程應以可行的、最簡單、最有效的方式來執行。如果把我的建議付諸實施，我們便可以免除新創造出來的龐大稅務官僚。而這本身就是一個優點。

現在，我們把注意力轉移到**支出面**。在手術的時候，必須把支出當成一筆數目來考慮。只有兩項必須從預算中刪除。

第一項是對某些消費性物品給予**預算的價格補助**。去除一部份此種補助的程序，目前已經進行了好一陣子，很可能在真正手術開始之前，會實施更進一步的局部措施。但是，不管這個過程和所宣佈的目標相距甚遠，或有相當大的進展，在手術的時候，這項艱鉅的工作必須確實完全地達成。不管有什麼反面的指示，絕對不允許藉口不服藥。

我熱誠地相信，政府應該以人道的方式來採取行動：採取適合國家潛在的福利政策支出，不僅是國會的權利，也是國會的義務。但是，這支出不應該採價格補貼的形式，因為補貼的價格雖然幫助了那些需要的人，但同時也幫助了那些不需要的人。我也贊成政府和其他的機構，以及個人應該贊助文化。但同樣的，這也不應該採行價格補貼的方式。如果我們負擔得起的話，那麼，讓我們提供書籍代用券給學生，但是，書籍的價格應該維持真實，也就是書價應能抵得過成本和利潤。對於那些負擔得起以市價來購買書籍的人，沒有必要對其購書加以補助。

而最重要的是：以匈牙利目前的經濟水準來看，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支持食物的補助。這個國家目前經濟發展的水準，絕對足以確保每個國民都能滿足其生理的需求。那麼國家為什麼要以人爲的方式來壓低食物的價格，而對那些可以付得起真實市場價格的人，給予特別的補助呢？爲什麼要讓匈牙利成爲奧地利觀光客眼中的笑柄呢？這些觀光客聚集到這裡只花部份奧地利價格來買肉。我完全贊同，即使以今天的食物價格而言，我們社會中有些人還是很難收支平衡。這些群體，包括年金微薄或有多重困難的退休人士，必須利用金錢援助、實物幫助、餐廳的代用券等來加以直接地援助，但絕對不是利用荒謬地扭曲價格體系來加以幫助。

另一項要從預算中刪除的是數額龐大的各種形式的**生產補貼**，除了兩三項定義清楚的例外情形，辯論了長達二十年的虧損的國營公司和大型農業合作社這個問題，現在正該是結束的時候了。可以許可的兩項例外如下：

(1)轉型期的援助，用意是要幫助度過手術之後最劇烈的震撼。

(2)開始的援助應擴及幼稚產業或其相關產業。贊成保護幼稚產業以保護國家生產，類似的論調在文獻中不乏例子。當然，我們有必要等到匈牙利的先鋒業者獲得實際的知識並達到規模經濟。但是，這種援助不管是採政府補助或保護性關稅的形式，應該有固定的截止日期：如果新的生產者到時候還不能聚集力量，則應撤回援助。沒有必要以人爲的手段來使不具活力的組織存活下去。

總結來說：手術必須重建預算平衡。這對消滅通貨膨脹是絕對必要的。在本章初，我說到通貨膨脹是執政政府的產物，我主要(雖然也不排除其他)是指，引發通貨膨脹過程中的財政面。最終恢復預算平衡

的手段掌握在執政的政府，以及決定並立法通過政府收入和支出的國會議員手中。¹⁰

在手術後的時期，保持、甚至提高針對刪減預算支出的努力是很重要的。這些努力愈成功，降低稅率的可能性愈大。而減稅必然能增加政府的人望。但是要小心：在手術期間，我們不能事先花用未來和不確定刪減所可能增加的政府盈餘。

三、總合需求的管理

我的目標不在週全詳盡，只希望討論一些想法，最重要的是，要強調出可能危及穩定化計劃成功的一些危險。

在手術時，私人部門所握有的貨幣額是不變的。因此，沒有購買力失控的威脅。如同我已經強調過的，國有銀行部門提供給私人部門的信用配額必須是固定的。一方面，私人部門在有需求時必須能獲得這些信用，也就是必須防止政府部門把這些信用吸收掉；另一方面，在手術關鍵的最初時期，也有必要防止私人部門跨越了這些限制。一旦私人部門能夠自立，根據其信用需求成長的比例來增加其信用供給是可能的。同時，應該鼓勵私人部門各單位之間，創造更多廣泛的信用連繫，而創造這些連繫所需的法律基礎架構，也是絕對必要的。

在上一節，我們詳細討論過政府預算。讓我們假設該節所描述的原則全都實現了，也就是，政府預算所創造出來的需求嚴格地受到管制。

真正的危險在於國營公司（以及準國營大型合作社的部門）的需求有不受管束的可能。回想我在第一章提議過要管束國營公司的支出，我在此再次提出這項建議；同時強調，這項管束真正的測試便是穩定化手

術本身。過去的幾十年，財政當局一直追求嚴格的**貨幣管制政策**。¹⁹這項努力只做到部份成功。這政策做到了防止過度不可收拾的總合需求，以及如南斯拉夫和波蘭所發生的超級通貨膨脹——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有著百分之十五～二十五的通貨膨脹，這已經是太高了。伴隨著這種限制而來的是，各種的陣痛和不好的副作用，通常也阻礙了可能真正能夠獲利的領域之生產和投資的增加。

以目前實質利率一直是過低（也就是有一點或有很強的負面影響），如此要發展出真正理性限制的貨幣政策是不可能的。但是，這種經驗至少證明了，在我們的情況之下強制貨幣緊縮是**可能的**，雖然在未來這項政策能夠以更謹慎、更有根據的方式來實行會更好。這項政策首要的工具之一，是對貸款採正面的高實質利率。

無論如何，貨幣管制最近的發展，對於穩定計劃中各個不同部份必須**同時**實施的必要性，提供了具有教育性的示範。在其他必要的互補性措施未能同時進行的情況下，貨幣管制的實施並沒有產生所想要的結果：未能結束通貨膨脹，也無法終止以人爲力量來維持低效率公司的做法。結果，貨幣管制的原則不幸地成爲許多人眼中所不相信的，使得未來的實施更加困難。

我們必須非常注意伴隨總合需求管制而來的現象。在此，我只指出兩點。²⁰

1. 在古典社會主義統制經濟下，信用供給是被國家銀行體系所壟斷的。「商業信用」，也就是**國營公司之間相互授信**，是嚴格禁止的。但是，追隨著「市場社會主義」之後——國營公司型態的改革和部份自由化，使得公司間的信用不但突然興起，也在所有的社會主義改革國家中成爲普遍的現象。這一類型的信用，部份是債權人和債務人之

間自願的協定，部份則是強迫性的。做為買方的公司，就是拒絕付款給賣方的公司，因此，迫使賣方必須以信用貸款的方式來銷售這批貨。如果，結果造成被迫的債權人本身也成為無力償債，那麼，這家公司就會拒絕支付貨款給供應商。最後，便會發生真正的信用危機：債權人在他們的債務人面前排起隊來，等待他們能好心的還債。

銀行體系看到這種難以忍受的情況，基於悲憫之心，以對他們部份的本票和匯票做貼現，來向那些情況最糟的公司伸出援手。這是匈牙利的假信用體系、假銀行體系，以及假資本市場之扭曲表現的一例。看起來像是真正金融的交易，其實不過是掩飾了怎麼樣都無法停止工廠生產的事實，因為這會激發工人抗議，產生生產不足、導致嚴重的短缺、違反國際契約等等。

公司間的商業信用是公司間金融契約和生意交易自然的伴隨物。在為穩定化作產量計劃時，有必要將商業信用的存在考慮進去。對於「排隊等候」付款和因而發生的流動性危機，這些扭曲的表現形式，也必須加以終止。我們必須發展市場經濟所慣用的法律形式和商業信用之機構。債務公司硬行勒索之信用，不應加以容忍，但是，公司間自願的信用關係之發展，則應加以鼓勵。貼現和本票背書轉讓，應該成為商業和金融生活中正常的一部份。

無力償債的國營公司這種排隊等候，也可能毀了一些貨品沒有得到付款的私人供應商。政府部門傾向於把私人企業列入非自願債權人等候隊伍的尾巴。具有影響力的國營公司比無助的私人公司更有希望收回欠債。比方說，國營公司可以透過國家銀行部門的干預來收回欠債。這是私人部門真正需要保障的領域之一。根據第一章第二項要件，保證國營和私人公司之間契約的強制履行是必要的。如果國營公司和

私人公司訂約而成爲買方或賣方，那麼便有完全履行契約條款的義務。當然，這對私人公司也是如此。^①

2. 在穩定化手術中，**工資**問題是最困難、在政治上最敏感的一部份。我們必須要確定國營公司部門所支付的工資總數，不超過穩定化計劃所許可的限度，我不能說和穩定化之前時期的名目工資水平相比，這個限度應該是多少。可能的做法是，短時間內採取釋放多餘購買力的措施，這會伴隨著物價上漲的波動——這種暫時的「矯正物價上升」，是爲了要吸收部份沒花掉的強迫性儲蓄，並流通「窖藏的貨幣」，也許這是不需要的；我們必須等更進一步的廣泛分析。^②

一旦給定了這平均工資水準（必須有一段時間維持不變），便可利用各種工具來加以穩定。根據一項觀點，對公司擴充信用必須嚴格地受到所依附工資水準的束縛。對於這一點是不是足夠，我感到有些懷疑，似乎可能要採取較強烈的措施。重新想想過去的經驗，可能可以挑出那些相對最爲有效的管制方式。

對於究竟該採取什麼明確的措施，比如，必須對公司全部的工資資金加以限制，或是必須以生產的比例來決定工資資金，或是其他做法，我並不想真正地採取立場。我知道這會減少公司經理人的獨立性，並且會使得生產要素最適組合的呈現更加困難。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採行這個步驟，國營公司的經理人必然會像過去一樣繼續提高工資。無可避免地，我們會發現，自己立於幾年前中國大陸的處境，這也正是一九八九年南斯拉夫和波蘭的情形。期望國營公司的經理人在官僚政府所有權之下自願看緊工資，是自欺欺人的。

第三章會再回到這個問題的政治結果，也會討論同業工會的角色。目前只需要經濟的論證。我也知道，利用行政手段來控制不可收拾的

工資，在好幾方面也會傷害到效率。但是，改變這種情況的唯一可能性是，以私人所有權來取代政府所有權。唯有私人所有權是能與要求加薪的員工對抗的「天敵」，這個天敵便是由自己的口袋掏錢付工資的業主。藉由「假的所有權改革」是無法刺激這種真正自然的衝突的，而且只要國家所有權依然佔著優勢，便只能利用官僚的手段來對抗來自下屬加薪的壓力。

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緊縮的貨幣政策通常會迫使商業領域凍結薪資，甚至減薪。如果公司不能獲得所需求的貨幣數量，結果自然是不願意多付錢給員工。儘管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中，也不能確定這種做法能完全生效，但至少有機會。這絕對不是匈牙利經濟的情形，因為匈牙利的經濟是屬於四分之三的社會主義，加上四分之一的資本主義。我們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來證明，許多國營公司在國家緊縮最厲害的時候，居然毫無自制地提高員工的工資。他們總是從有辦法為此（如果不是為別的）目的募集到資金的信念開始想起。最壞的情況是，不付賬給自己的供應商。這便是為什麼在匈牙利的政府部門，無法不以直接的官僚限制來對工資設限。^②自從幾十年前將市場改革理念帶入政府所有權體系之後，便一直規避這個問題。^③現在是面對這個殘酷事實的時候了。

我再次強調，維持工資紀律是穩定化手術中最弱的一環，如果我們在這一點上失敗了，整個手術便會成泡影。

四、合理價格的形成

讓我們以描繪理想的結果做為開始。如果手術最後能以合理的市場價格體系，也就是價格帶著有意義的經濟訊息，來取代目前任意武

斷、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合理的價格，那麼，這項手術就是成功的。這種改變受制於多項條件。有些是不辯自明、相當容易實現的。有些條件則相當不容易滿足，並且會有無可避免的矛盾。

讓我們從工作中不辯自明的部份說起，所有私人部門交易的價格應該可以自由調整，不受政府干預之阻礙。但其本身並不能保證這種「私人價格體系」在整體經濟上會成為合理的，因為在私人部門中，有無數的單位和做為賣方或買方的政府部門訂有契約。因此，政府部門的價格，將會影響到私人部門的成本和價格。但是，私人部門內的投入—產出的循環，在一些產品和勞務上會相當高，因此，有許多可以用來衡量政府價格的物價標準，會是私人價格。

政府部門中價格的重新調整是困難得多的問題。讓我們從穩定化手術完成時，希望政府部門的價格是什麼樣子，來開始分析。我們的目標是發展市場供需均衡的價格。因此，除了一些例外，**價格完全自由化**在政府部門也是需要的。手術愈早達到這個目標愈好。

而不變的例外，是公共勞務和自然壟斷產出等產品和勞務的價格，因為上述價格即使在已開發國家的成熟市場經濟裡，也會受到管制。

雖然我毫不遲疑地建議，穩定化手術最後的結果之一是，必須達成價格自由化，但是，對於導致這種理想的結果狀態所要走的道路，我只能提供**有條件**的建議。第一項我們要考慮的條件是在穩定化手術開始之前，匈牙利經濟中政府部門所進行的價格自由化到了什麼程度。部份的價格管制和半調子的價格自由化，無論從個別來看、還是就其交互作用來看，都帶有許多風險。在手術開始時，先前部份自由化的結果，無論好壞，都要考慮進去。很清楚地，在此我們不建議限制方向的逆轉。（例外的情形是已經或將要採行錯誤的措施，這使得即使在已開發、

成熟的市場經濟，通常也受到管制的領域，有著自由價格。）

在考慮價格體系的時候，供給的狀態、基本消費產品蓄積的數量，以及能源和原料也必須考慮進去（見本章人道主義與經濟的儲備存底）。如果因為政府的錯誤或運氣不好的結果，出現了嚴重的短缺，那麼就有必要想一想，在穩定化一開始的時候，是不是值得讓基本產品和勞務的價格大幅上升。也許可以做成短暫的過渡時期限制價格的決定，但是，這種限制必須伴隨著快速增加供給的決心，譬如，利用進口，然後再進行價格自由化。除了很小領域的價格必須永遠受到管制之外，每一次價格管制都應被視為該盡快結束的過渡罪惡。愈早開放進口，包括私人進口，私人部門快速填補政府部門所留下的鴻溝的機會愈大，如此也就愈早可能結束這種管制。

在穩定化過程開始時，不習慣自由價格的國營公司，決定最初價格可能有所困難，採用一些任意法則（rules of thumb）是值得的，但必須充份瞭解這只是剛開始。往後，市場的力量所發展出來的價格，會和國營公司要求的最初價格有所不同。

至於貿易產品，可能的出發點則是，根據資本主義國家之價格來建立國內物價調整原則。首先，我們應該將資本主義外貿夥伴每一項產品的報價考慮進去。如果非常簡化地來說，我會說，以私人匯率轉換這些價格之後，國外和國內的價格體系應該沒有劇烈的差別，也就是各種產品的價格比，如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的電器，奧地利東部和匈牙利西部的肉品，或是慕尼黑和布達佩斯的汽車，價格應相差不大。如果真的達到這種境界，大部份多餘的國外採購旅行便會結束，而且無需行政禁止，採購的觀光行為將會限制在根據雙方的比較利益所達成的交易。

這種概念的實現隱含了本章前述幾點的實施：消費稅率和關稅嚴格統一，以及生產者和消費者補貼的消除。

在一九四六年的穩定化時，以匈牙利福林報價的最初相對價格體系，是依照一九三八年以當時匈牙利的貨幣pengő所報價格為基礎而制定的。今天，我們也需要類似的簡單程序。但是，現在價格制定的基礎，應該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相對價格，而不是匈牙利過去的價格。比如，公司應採當今奧地利或西德的價格做為他們的出發點。我並非認為，從純粹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這些是模範式的最適價格。沒有什麼可以做為模範的最適價格，因為這些價格也受到許多因素的扭曲。而且不用說我們也知道，匈牙利的供需情形和成本結構是不同的。但是，奧地利和西德的這些價格，至少是真實的價格。在市場經濟中，匈牙利和這些國家的關係是最強的；匈牙利的商人和觀光客大都是拿這些國家來和匈牙利相比。

不管問題中的價格開始是由國家所規定的價格，還是由國營公司自由設定的，我都建議由以下的計算做起：某一項特定的產品能夠在奧地利或西德買賣的價格為何？這項價格應該採用手術當時的有效匯率換算成匈牙利福林（匯率的問題將於下節討論）。其結果便是，做為賣方的政府在手術開始時進入市場的國內價格。

匈牙利私人部門的相對價格，是制定手術最初價格一個更為重要的依據。我們已經談過這個問題和私人外匯匯率的關係。但是，這個想法包含更廣。比如說，真實的市場價格已經出現在食物的私有市場、私有公寓的租金、不動產市場、大部份的服務業部門，以及其他的領域。國營公司的手術期間將產品上市時由這些價格開始，應是個權宜之計，正因為這些是真實的市場價格，而不是在辦公室裡人為杜撰出

來的價格。

外國的價格和國內私有市場的價格，可以提供決定各種產品和勞務**相對價格**的方向。國營公司在穩定化當中進入市場時，於是可以採用這些相對價格。**一般物價水平**又是個不同的問題：和許多其他總體經濟的因素有關（信用供給、工資水平、總合供給和總合需求，等等）。

國營公司在計算的時候，要把政府金融當局所決定、國家銀行體系所使用的**匯率**考慮進去（見下節）。該公司也必須將訂在合理水平由國家銀行部門所採用的**實質利率**考慮進去。這些利率至少應該用於手術開始的時期，且必須於事前公佈。往後可以依照真實信用市場的情況來修正。

但是，即使這些是協助公司決定價格的指導方針，當國營公司因手術而起死回生，終於進入市場的時候，在選定原始價格時，多少還是有點被迫在黑暗中摸索。

到那時會發生什麼，就要由供需的自由力量來決定。快速解放所有價格是很重要的（那些永遠管制的壟斷產品則屬例外）。在供需達到平衡、出現市場結清（market-clearing）的平衡價格之前，還需要有一段時間。我們應該注意，外貿也同時在進行著，而且大部份的交易是私人外國貿易商所做的。市場上會出現進口商，可能是匈牙利國營公司、匈牙利私人公司、外國資本家的公司，或者合資公司，他們會與國內的生產者競爭。如果開始的售價保證了高利潤，便會吸引進口，如此遲早會壓低價格；如果情況相反，那麼過程將朝著反方向移動。

從最後的分析來看，自由化導致基本上**單一價格**的發展。眾所皆知，只有在理論經濟學稱為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之下，才會發展出完全的單一價格。在不完全的競爭之下（這是已開發市場經濟大部份分支部門

的特徵)，價格多少有點分歧。當然，我們也必須預見匈牙利有這種情形。然而，這是所謂的「自然分歧」(natural dispersion)。穩定化手術必須終止以其他準則為基礎，對價格體系的人為分裂，所謂其他的標準諸如：「白」相對於「灰」或「黑」的市場價格，與市場供需均衡價格有所出入之價格，以及由當局所指定相對於自由市場的價格，由國營公司所決定的價格相對於私人部門所決定的價格。拆除這些價格城牆將導致一種基本上統一價格體系的演進，這也是手術的一項結果。

沒有人可以說出統一的供需均衡價格的出現需要多久，我們不應該存有幻想，在匈牙利，我們不能希望手術開始後的一年，就出現類似法蘭克福或蘇黎士那樣統一穩固的市場。但是，我們不要怕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價格浮動是這個過程中自然的一部份，正如同偶爾令人眼花撩亂的盈虧也是自然的。匈牙利公眾的情感對虧損已經認命了，但是，我還要加上這麼一點，人們也應該準備看到別人獲取極大利益時，能包容所累積的嫉妬感。這是適應的引擎。轉手之間賺到錢，雖然成功的人可能只有少數，但是，這種可能性就可能使得成千、甚至上萬的人把握機會、甘冒風險，並從事真正的商業企業。

今天匈牙利的經濟充滿了不均衡和不和諧，但是，如果有真正的自由企業出現(見第一章的私人部門)，這種情形的效果反倒是吸引而不是排斥了企業主。供需之間的不均衡愈是嚴重，任何恢復供需平衡的行動所能賺取的金錢愈多。在經濟結構真正和諧的國家中，除了引進技術革新或重要的新產品外，幾乎沒有賺取額外所得的方法。但是，在我們這亂七八糟的世界，那些想要賺錢的人可真是找到了金礦。然而，這需要民眾的態度和道德判斷，如我在第一章所描述的方向而有所改變。在匈牙利流行了幾十年的經濟思想，關於這方面存有偏見的態度。

根據這種想法的教條，唯一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所得形式是，經由勞力所賺取，而「貪圖暴利」或「投機取巧」則應受到指責。²⁵

另一種大多數人所抱持的看法認為，所有利用短缺以牟利的人都是不誠實的。好像在面對短缺時提高賣價，不是任何市場上的賣方唯一合理的反應似的！價格不是道德而是經濟的範疇。如果我們要求賣方要自制並好心不要加價，短缺也不會消失。說教(或是警方的行動)也不能使賣方放棄對其潛能做最大的利用。反而，我們應該終止賣方在市場所佔有的超越地位。(這個問題，連同消除一般短缺經濟，將於本章末詳細討論。)

前一節建議終止對虧損的國營公司提供補助。讓我們以未來新價格體系的角度，重新回到這個構想。我們實在非常不清楚到底哪些公司真正有虧損，而哪些公司只是在假虧損的情況下經營。以礦業的例子來講，計算是相當簡單的。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匈牙利的鈾礦顯露出嚴重的赤字，因為成本清單上包含的因素非常少，而產出的價值也很容易依照世界市場的價格來定義。但是，同樣的計算幾乎是不可能用到製造業上，因為其成本受到無數投入價格外溢的影響，而投入品的價格又受到各種令人眼花撩亂的補助和免稅的影響。如果許多現在被認為是製造虧損的國營公司，在手術之後免除了這項罪名，應該是不會令人驚訝的。如果剛好相反，也就是其他目前被視為是有利潤的國營公司，一旦在帳目上開始把真實的成本和稅負包括進去，結果變成沒有利潤，那也沒有什麼好驚訝的。

五、統一的匯率和可兌換性之引進

我建議進行下列關係密切的工作(一當稍後所描繪的條件滿足之後，即

可進行)。

1. 必須採用統一的匯率。

2. 匈牙利福林必須成爲可兌換的。匈牙利的國家銀行應該爲所有的匈牙利公民和所有的公司以及機關，自由地將匈牙利福林兌換成外國強勢貨幣（如美金、馬克等）。

3. 所有的進出口活動，不管是屬於國營公司還是私人部門，都必須予以自由化。

第一項工作的履行不能靠脅迫，不能禁止私人的貨幣交易，或宣佈私人的匯率是不合法的。我還要再說一次，這裡所說的一切，都和第一章有關：所有的個人都必須有權自由地買賣外匯。只要能無所限制地由國家銀行以不高於私人匯率買到、並能以不低於私人匯率的價格賣出貨幣，那麼，便可以在沒有行政脅迫的情形下，發展出統一的匯率。如果國家的銀行部門能保證這點，我們可以假設，私人匯率會被往下壓低一點。（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匯率必然會比目前的黑市匯率低，因爲黑市價格必須包含對違法風險所做的補償。）

欲避免國家銀行體系所實行的匯率引起匈牙利貨幣市場的嚴重失衡，需要結清市場的匯率。我們很難確切地說出這個匯率到底是多少，因爲這和穩定操作其他部份的進展如何，以及當期通貨膨脹率變動的情形有很大的關係。不管結果如何，決定匯率的主要基礎之一，可能是目前的「灰色」私人匯率。假使在手術之前，私人貨幣市場已經合法化了，那麼未來的「白色」私人匯率，可能是更爲重要的標準。

所有的跡象指出，手術中有一部份將會是匈牙利福林的貶值，以及朝著可兌換性來發展。在政府銀行部門確保可兌換性之前，必須先滿足無數的條件；我想要特別指出兩點。

最重要的是，要對強勢貨幣的**需求**加以控制，其中問題最大的領域是在**政府部門**：「國營公司」對強勢貨幣的「需求」（或者以可兌換貨幣來支付的進口）不可任其高得離譜。過去的經驗並不好：在鬆散的預算管制之下，國營公司對西方進口和強勢貨幣幾乎有著永不餓足的飢渴。他們的優先權是先攫取強勢貨幣，因為往後總是有辦法取得匈牙利福林來做支付。現在所能倚靠的是，確保這些公司缺少匈牙利福林（並採用真實的、市場結清的匯率）來抑制這種飢渴。

因此，決定性的因素在於是否能達到對國有部門緊縮的貨幣政策，以及在授信上的硬性管制，如第一章的國家部門和本章的總和需求管理中所描述的。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便能在沒有嚴重危及國家外匯平衡下，維持可兌換性。如果沒有做到，所有的問題將會重新出現。而且，除了分配國營公司所能獲得的強勢貨幣數量外，便沒有其他的解決之道。這將會有許多缺點，但是，只要政府部門依然在經濟中佔有優勢，便不能將其從可能的選擇中加以刪除。**私人公司**便沒有這樣的危險，因為其本質使得他們要採嚴格的預算管制。

如果名目工資上升得比所想要的還要快，那麼，家庭對強勢貨幣的需求可能會超出計劃的水平。此處，和許多其他要點一樣，重要的是嚴格實施工資原則。

另一項將匯率穩定在真實水平、並確保可兌換性的要件是，國家要保有足夠的外匯存底。這些存底可採由國家銀行持有真正的存底，或是隨時可以取出的預備信用的方式。如果政府有這樣的存底，對強勢貨幣超額需求的出現，就不會造成國家銀行體系立即暫停外幣的自由銷售，因為銀行體系可以提出存底來取代。當然，必須採取更進一步的措施來恢復供需之間的均衡，譬如，減少以國內貨幣表現的總合

需求(以及外幣需求比預期還要高的部門之需求),或可能對匈牙利福林再度貶值。關於外匯存底這個主題,我們將在下面(本章中的人道主義與經濟的儲備存底)再討論。

統一真實的市場供需均衡匯率,和可兌換性之出現,使得進口可以全面自由化(必須在達到上述的條件之前提下)。於是經濟中所有的代理商自由地進行進口活動成爲被許可的和被期盼的。但是,如果那些條件沒有滿足的話,只能開放私人進口,才不會冒著重大的風險。如果政府部門的需求依然沒有受到有效的管制和適度的控制,讓國營公司享有進口的完全自由,無異是一危險的遊戲。

所有的這些改變,不只有助於恢復國家短期外部和內部的財政均衡,也有助於生產的持續擴張和品質的改良。自由進口,不論是來自國營或私人公司,也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進口商,對於賣方之間的競爭,都是不可或缺的。這種競爭又是確保一般大眾得到較好的供應,而且也是短缺得以消除,以及技術標準得以發展的最強烈動機之一。

六、爲什麼要同時進行?

前面幾節所提到的不少措施,已經部份付諸實行,或即將要實行。降低通貨膨脹速度的許諾時有所聞。也不斷有降低預算支出和提高歲收的步驟。所謂的貨幣管制正卯足了全力在進行,而某些價格也已經自由化了。

問題在於,這些變革的實施是不一致、而且是緩慢的。廣泛實施模擬兩可的一套措施,降低了其他措施的效率。十個不同的一半成功,加起來不是五個完全的成功,而是五個完全的慘敗。上面所指出的所有措施是彼此互爲條件的。停止通貨膨脹需要平衡的預算。而唯有稅

制置於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達成預算平衡。在通貨膨脹時預算無法平衡，因為歲收通常落於支出之後，因此，在所得面比在支出面更能感受到通貨膨脹。停止對虧損公司的補助，條件在於引進新的稅制，也在於透過對市場清結均衡價格的利用來找出哪些公司是真正製造利潤、哪那些是製造虧損。然而，在加速的通貨膨脹當中，是無法出現真實的市場價格的。部份的價格調整不會造就出合理的相對價格制度，反而會加速通貨膨脹的螺旋式上升。這份癥結所在相同且相互關連的問題清單，還可以再加上十幾個例子。總括來看，這對於必須畢其功於一役的重要性，提供了經濟學上的解釋。

爲了強調起見，值得將此以反面說出：大多數穩定化的整套計劃中的部份措施是對社會有利的，但是如果單獨行之，沒有其他措施同時實行的話，可能會是危險有害的。比如，如果沒有工資原則的話，使價格完全自由化，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傷害。如果政府部門的需求未能有力的控制，完全的可兌換性也可能是有害的，這種例子不勝枚舉。這些危險可不是想像出來的，是非常真實的。到目前爲止所採取的穩定化措施，一個個相繼失敗了，正因爲沒有選對正確的經濟環境，當權者急急忙忙地引進，而且所選擇的目標和經濟情況沒有配合。

對於這種經濟推理，我還要再加上兩點更進一步的論證。

首先是經濟—心理上的論證。如果我們想要停止通貨膨脹，我們必須大力改變通貨膨脹的預期心態。每個僱主和員工、商人和貨幣持有者，愈是期望通貨膨脹上升百分之二十，他愈是可能以要求工資和市場賣價至少增加百分之二十，來加以調節。穩定化的手術可以切斷這種通貨膨脹預期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條件是這樣的許諾必須來自一個可靠且令人尊重的政府。

第二項論證主要是屬於人道主義性質。匈牙利的人民因目前的經濟沈痾而遭受極大的苦難。減輕人民的痛苦是政治組織、政黨和所有政府機構的第一要務。經濟的復興蘊含著重大的犧牲，但是犧牲的時期不應該無限期地延長下去。如果要救一個人唯一的方法是要切斷一條腿，以必要的麻醉一次切除還是要比排定曠時費日的手術日程，每個星期或每個月切下一片，來得更為人道。István Széchenyi，這位十九世紀的政治改革家，也是匈牙利最早的經濟學家之一，在他的著作《信用》（*Credit*）一書中，用了拔牙這個比喻：「如果拔牙的人或手術者因為無知的心軟，只是慢慢輕輕地拔，只是用小切除來進行工作，但為時甚久，可以說是很殘忍的。」²⁶

人們對於幾乎是每週對其福祉的侵犯，很有生氣的理由。我們已經到了只要因為某些內品價格的上漲，就可以號召工人來罷工，但同時數百萬的家庭卻受到持續但察覺不到的損失，其總額雖然大得多，卻沒有招致任何抗議。我堅決地相信，大部份的人寧願選擇面對一次劇烈的震撼和繼起的痛苦，如果能真正說服他們，情況將有所改進，而不願忍受無望的折磨、緩慢但持續的經濟惡化，以及我們目前所經歷的經濟和社會的痙攣。

在我於一九八九年夏天第一次提出我的建議，並出版了本書的匈牙利版本之後，有人提出了反對意見。反對意見是說，雖然劇烈的手段是打斷遭受超級通貨膨脹的波蘭和南斯拉夫這些國家通膨的唯一方法。但是，對於像匈牙利這樣通貨膨脹率緩和得多的國家，則沒有必要採行類似的策略。

但是，決定穩定化策略的基本選擇，也就是漸進的方式和手術之間的選擇，並非通貨膨脹的規模。實際上，在幾年前，當匈牙利的通

貨膨脹率還只是個位數的時候，我即倡導在基本的政治變革中，對物價、稅收和經濟體系中的其他要素作**同步**、大幅度的重新調整。一份和Ágnes Matits合寫，後來以匈牙利文出版的研究(1987)強調了這個觀點(英文的書摘可見於科奈[1990])。匈牙利(以及整個東歐，即使那些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通貨膨脹的國家)需要外科手術，不只是因為通貨膨脹之故。因為連續局部的措施可能有害，而且不能解決全面的問題，所以需要手術。這種信念是匈牙利版論證的基礎，當我在寫作該書時，我對波蘭的計劃還不熟悉。我所提建議的基礎是在於對社會主義的經濟，總合調節和穩定化，必須和深層的、全面的**制度**改革攜手並進的瞭解而來。

波蘭盡快進行手術還有另一個原因：即其通貨膨脹的加速令人無法容忍。在我對波蘭的計劃有更多的瞭解，並有機會和其主要的設計者之一，哈佛大學的傑弗瑞·沙克斯(Jeffrey Sachs)討論過後，我更加確信我的建議是指向正確的方向。我們的討論，以及我對他作品的接觸(如Sachs和Lipton[1989a和b])有助於我對建議中的許多重要細節加以精煉。特別是瞭解波蘭的計劃有助於我重新考慮匈牙利有關可兌換性和外債的政策。

當然，匈牙利和波蘭的情況有相同也有差異之處。每一個由社會主義轉變的東歐國家，必須面對本身開始的政經條件。但是，總體政策、經濟控制和財產關係需要**同時**改變，則是所有國家共通之處。

七、人道主義和經濟的儲備存底

社會必須維持適當的儲備存底來為手術預做準備。有四種儲備是不可或缺的。

1. 最重要的是「人道主義的」儲備存底，也就是在適當的公共監管之下，可以用於緊急授予那些在悲慘困境的人的基金。手術過後，每一個人遲早都要適應新的市場情況。那些永遠無法適應新情況的人，應該以適當的福利政策加以協助，詳細內容將於下章討論。換言之，我心中所想的並不是每一個人道主義社會所少不了的永久安全網，而是手術前一兩年可用的非常緊急紓困援助。對於那些將能夠自立的人，這項援助也能說得過去。實際上，特別強調這種援助的暫時性質是很重要的。社會期望每一個能夠自己生存下去的人，遲早應該這麼做。對於那些能夠創造基本條件、過著正常生活的人，沒有必要施以父權式的保護。

2. 必須有**貨品和能量的儲備存底**，以確保人民可以獲得重要的消費性物品、燃料及其他能源的來源等等。手術開始調節時可能發生陣痛，在這種情形下，可以利用適當的國家儲備來避免嚴重的脫序。

3. 政府應該處理足夠的可兌換外匯的儲備存底，以備在暫時有困難時，支付重要的進口品。需要這種儲備存底也是因為國家銀行體系可以履行有關可兌換性之諾言。如果發生了對外幣超額的需求，應該在第一刻就由存底來加以支付。（在最先的反應之後，要以什麼方法來恢復外匯市場的均衡，則是另一個問題。）

4. 除了充作政府和私人部門的正常信用數量之外，還應該保留**儲備信用配額**。在手術期間，如果國家或私人公司遭遇了意外的流動性危機，這可以用來授予暫時性的貸款。但這應該是硬性的信用，而不是用來脫困的軟性信用。如果該公司能夠以這種貸款的幫助來度過穩定化手術，那麼這種功夫就值得了。如果該公司失敗了，這筆貸款就浪費了。以後者的情況而言，必須禁止該公司延後償還原貸款，或是

獲得新的貸款。整體手術所產生的結果，應該加快嚴格的自然淘汰過程，而暫時性的貸款應該是那些自認為強壯得可以存活下去的機構最後的機會。

四種儲備存底的財政準備金必須包含於手術的計劃中。如果平衡方程式或多或少是在均衡狀態，但是後來爲了要度過危機，必須贊助個別的援助計劃、沒有計算在內的進口，或是對公司的暫時性貸款，破壞了不確定的平衡，那麼穩定化的手術就註定要失敗了。儲備存底應事先放起來，以備這些特別的目的之用，而任何剩餘依然可以再加以投資。另一方面，除了既定的數額外，不可多用一元匈牙利福林或一塊美元於這些用途之上。

八、國際環境中的穩定化手術

穩定化手術基本上必須倚賴著匈牙利的資源和能量。計劃的起草人只有在有絕對的把握時，才能將外來的援助考慮進去。計劃應採悲觀和過度謹慎的態度。要是外援比預期來得多，那麼多出的部份總是可以用於好的用途。同時，我也認爲，正是第一章所說的那些變革以及穩定化手術本身，會大大地擴增外援的範圍。讓我們針對此點，來看一看最重要的工作。

1. 目前和選舉後產生的新政府，應該以平靜的態度重新塑造匈牙利和共產主義經濟組織（Comecon）國家的關係。長期的目標是相當複雜的。一方面，匈牙利應該減少對輸出面和進口面的倚賴。另一方面，則需要促成外貿更有利的架構。

匈牙利和共產主義經濟組織國家出口關係長期來看，最大的缺點是這些市場品質水準的低落。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種缺乏高水準、

而且對於貨品的品質沒有重大要求的商業關係，非常吸引國營公司，而且使得他們抓住這些市場不放。在這些市場，銷售產品是相當容易的事，要是在外匯市場就無法令人接受。這也是必須冷靜、但堅決地將匈牙利感興趣的範圍篩選成堅持較高品質的市場的另一原因。同時，最重要的是，即使在政治變革當中，匈牙利政府也必須特別注意維持商業的連續性。一旦簽了字，便不可單邊違反商業契約，這是誠信貿易的基本法則。絕對不可以破壞匈牙利的信用。唯有在緊急的情況之下，才可以片面取消經濟協定，而這種動作則必須得到國會的核可。

2. 關於匈牙利和西方經濟的關係，略說數語有關私人外資的問題——既然西方政府和國際組織對匈牙利的態度在公共辯論中通常被過度的強調，我們更應該說一說。當然，他們的行為對匈牙利關係重大，但是我要說西方的商人、企業家和私人公司經理人的態度，甚至更為重要。沒有「國際資本主義者」，世界上的資本主義者並沒有團結起來。他們並不是根據某個世界中心的笛聲而起舞，不管是華盛頓、波昂或東京。他們的行動是藉著嚐試錯誤的方法，由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所調節的。他們是會聽政府的說法，但是，通常對於共同俱樂部中商人朋友所講述的匈牙利經驗，會更加注意。一個失敗的熟人所說的他在匈牙利所面對的許多官僚障礙，這種慘痛的故事就足以毀掉政府的一百個保證。社會經濟體系不能有兩種面貌：對自己的國民露出醜陋的臉，對於外在的世界則呈現迷人的笑靨。我們不能一再建築殘破的小村莊；當布達佩斯的市中心擁有裝潢高貴的西式銀行，小村莊裡的人還是沒有辦法以電話和首都聯絡，而鎮上的顧客只是為了完成一項基本的銀行交易，就得排上好幾小時的隊。

匈牙利和西方商業世界的關係，將隨著匈牙利私人部門的經濟標

準、文化和自由的發展，而能所進步並成爲有機體系。一個不容易受騙、頭腦清楚的西方資本主義者，對給予的特別待遇不會有什麼信心；例如特別的免稅、特別的匯兌條件，以及只適用於外國人的特別關稅，但是，如果這是每個匈牙利國民所擁有的條件，而不是特惠，則他就會相信。如果，依第一章所言的，要是一位有企業心的匈牙利公民，可以不用忍受證照的折磨而從事商業，那麼外國公民就會以更安心的態度來做生意。如果匈牙利公民所繳的稅是統一的、透明的、平面的（flat），那麼外國的企業家就不用害怕巨額的累進稅。這份清單還可以延長下去。在這方面，需要持續、漸進和有機的發展。在手術開始之前，這些變革實現得愈多愈好。

在我看來，手術本身可以更進一步增加西方商人的信心。他們看到秩序和穩定勝過了通貨膨脹、預算赤字、扭曲的價格、和變幻莫測的稅制，必然會感到更加安心。

3. 以上所說的當然不是要貶抑匈牙利從西方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獲得援助的重要性。我在此不想論及細節，只想提出，穩定化手術是動員大部份西方援助的絕佳時機。西方的政經世界已經有許多人感到，他們已因一九七〇年代毫無節制的貸款經驗而受到傷害，尤其當他們所貸出的款項熔蝕在借款政府的手中，以匈牙利的情形來說，當權的政府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每年都提出新的改革計劃，而負債卻依然增加，經濟的病症也日益加深。

這一次出現了獨一無二的機會。匈牙利極可能會有一個自由選舉產生的國會，而新政府可能會得到國會的支持。讓我們重申，以本書的精神來看，新政府有機會提出一清楚的穩定化計劃。可以誘使外國政府加入這項計劃，而他們的支援可以採取各種形式，例如我們可能

得到幫助、得到比一般條件要好的特別貸款，以及對我們目前的債務較緩和的待遇。在我看來，外國政府比較傾向於支持預定在可見的未來，如一兩年之內執行的計劃，而不是回應一些與遙遠未來有關的模糊計劃。

4. 新政府在計劃中應該保證，匈牙利會與債權國對其債務重新進行談判，但應避免傳統上的延後償還。因為這種作為只會破壞匈牙利在金融世界的權威性。匈牙利或許可以在緊急情況的壓力之下避免延後償還。

但是，這並不是意味著匈牙利必須盲目地、毫不質疑地默認這一筆大筆債務負擔要由目前這一代的匈牙利公民來承擔。這整個國家已經遭遇了太多的苦難，在未來的幾十年，可能沒有辦法有耐心注意到實踐的新呼聲和自我設限。也不要期望匈牙利會接受更多的苦難，來換取可能在遙遠的未來，也許是二〇一〇年或二〇五〇年會實現的更美好世界的許諾。匈牙利人民目前所負擔的債務必須在未來兩三年內就減輕。

這在西方的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制定者之間，也是個頗具爭議的問題，因為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正努力要清償它們的債務。不管債務國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對於這些問題，國家中央銀行的領袖表現的方式非常相似。他們主要的準則是負面式的：「小心不要惱怒了債權銀行！」在國際銀行家的俱樂部中得到稱許是極大的恭維，足以彌補回到家以後所受到的不平抱怨。而且，那些在政治上掌舵的人通常對國際金融事務一無所知，因此毫無保留地信任他們的銀行家。如果他們自己的銀行家大叫：「如果我們不付錢的話，會有不好的結果！」以此來嚇他們的話，他們便會以適當的關注來回應，並準備強迫人民

更進一步勒緊腰帶。

債務人要看債權人的臉色，但是，債權人也暴露在債務人之下。匈牙利的新政府在宣佈其穩定化計劃的同時，也應該保證其降低債務負擔的決心。然而，卻沒有必要倉促行事，而政府無論如何也不應該任意違反任何的信用契約。但是，必須跟每一個債權人團體有個別的協商，例如西方債權人中所謂的巴黎俱樂部、各國政府、國際金融機構、東歐貿易和金融夥伴，等等。必須平靜、但堅定地試著說服每一個債權團體，匈牙利無法、而且不會根據原定的時間表來還債。匈牙利需要對其義務再做清晰的協商。在朝向手術之前的時期，便已經對盡可能完成多數的修訂定案是必要的，往後手術本身會提供持續協商的機會。

在協商的期間以及之後(我們推測)，我們必須完全履行短期利息付款的義務。然而，對於中長期的債務則有減少的機會。過去幾年，已經成功地和好幾個國家達成這樣的協議。這也許多多少少會損害匈牙利目前信用的公佈排名，但是，我同意那些認為這項缺點是值得接受的人的說法，因為，一來匈牙利到時候會名列信用排名較佳的國家之列：二來(而這也是決定性的論證)為保證穩定化手術的債務重建，不會把幾乎無法忍受的負擔加在公眾之上，這是關係重大的。

九、消除短缺的經濟

匈牙利目前同時存在著通貨膨脹和短缺的現象。^⑦在這一節中我將建議如何在穩定化手術的環境下，消除與通貨膨脹有密切相關的短缺。這種行動路線也和第一章所描述的私人企業的演進有關。

短缺症候群是一複雜的現象，其興起受到好幾個因素的影響。無

論就個體或總體的層面來看，短缺都是個問題。社會主義制度的財產關係和協調機制，以及其金融和價格體系，是造成短缺的一些原因。在匈牙利有消除短缺經濟的社會，因為過去所發生的發展，和未來將發生的改變，將同時出現在這些層面上。

我們不能期望在手術之後，短缺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會有好一段時間，我們的市場機制，會比舊式的、經過多次考驗的市場有更多摩擦，而且以調適性較弱的方式來運作。但是我們可以預期，主要指向長期、一般性的短缺經濟的主要因素，基本上會被第一章所述之社會變革，和本章所述之穩定化手術所消除。

既然所有消除短缺經濟的條件我們都已提過了，在此只要列一張簡明的清單就夠了。

1. 在穩定化手術的過程中，必須平衡總合需求和總合供給。如果我們在手術期間能做到這點，而且也能維持這種新的平衡，那麼，便消除了短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總體層面的超額需求。

我必須慎重地警告讀者們，一旦需求再度失控，很可能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誘發短缺再度出現。說得更明白一點，如果政府爲了對抗超額需求，而預防價格上漲，將無可避免地會發生壓抑性的通貨膨脹以及短缺。

這是項真正的危險。如果穩定化手術失敗了，或者在手術後幾年，總合需求再度失控，那麼，我們便十分有理由預期控制價格上漲的廣大呼聲。不同的團體將運用升高的政治壓力贊成制定價格上限，並引進價格凍結，這些措施又會導致壓抑性通貨膨脹的再度發生，而壓抑性通貨膨脹正是產生短缺的原因之一。

這是在手術時必須創造總體經濟層面真正平衡的另一項論證。如

果犯了錯誤應該是屬於超額供給，而不是超額需求的方面。

2. 我認為有必要將嚴格控制政府部門的需求，當作個別的一點來加以強調。以目前政府部門所佔的優勢來看，期望硬性預算管制盛行於個體層面的國營公司是沒有用的。在此，「硬性預算管制」是指，公司因其內部動機的結果自動地管制其支出。但是，國營公司非常不可能發展出真正的利潤動機。投資飢渴和工資大幅波動的傾向，必然會一再發生。這便是為什麼我要提議由外部和上層來限制政府部門的支出傾向。

用於這項任務的方法尚未發展出來，但是，出現的機會愈來愈大。以前情況有所不同，當時所有的管制力量都握於高層政府官僚，而這些官僚和國營公司是一體同魂的。這個全能的官僚，在每一層都表現出一種很高的支出傾向。然而，現在獨立的反制力量可能以多黨國會的形式出現。這個立法團體不屬於官僚的一部份，實際上是高於官僚之上，而且做為國家意志的核心，將被賦予對支出設限的權力。我希望運作獨立於官僚之外，更確切地說，是高於官僚之上的立法單位能夠對國營公司支出的傾向加以限制。因而，這個立法單位應該能夠對政府部門設定擴及整個經濟層面的硬性預算管制。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便能中止短缺再現的一項基本機制。如果做不到，短缺必然會再出現。

3. 消除短缺經濟基本的方法之一是擴充私人部門。私人部門已經完成這種角色的一部份：好幾項政府部門無法達到的要求，已經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私人活動所滿足。和其他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比起來，短缺在匈牙利之所以沒有那麼嚴重，實際上可以和其他一些事情一併歸功於第二經濟的範圍，第二經濟填補了部份第一經濟所留下來的缺口。

私人部門的預算管制是硬性的，其支出受到私人業主必須從自己的口袋掏錢支付這一簡單事實的嚴格限制。因此之故，私人部門的需求沒有失控之虞。結果是，不像在國家部門，私人部門並沒有產生超額需求的內在機制。

依第一章的私人部門及兩個部門比例的變動二節所說的精神來看，我希望私人部門能夠發達起來。要是大眾能夠瞭解在這些情況之下，私人動機和市場的運作邏輯，那是最理想不過了。要是企業家能夠從短缺的情形獲利的話，短缺便會像磁鐵一樣吸引企業家。供給過多的市場是無法提供豐厚利潤的。但是，一旦在供應不足的地方出現了有償付能力的需求 (solvent demand)，便會湧現流動資金來捕捉所有的商業機會。這種彈性、動機、快速認知，並利用機會的能力，以及進入和競爭的自由，可以一起為支配數百種個體短缺來鋪路。

私人企業進入各種製造和貿易領域的自由，包括自由的私人進口，能夠帶來一般所知的買方市場這種市場制度，也就是賣方為爭取買方而競爭的情況。²³

4. 價格的自由和彈性是和以上三點都有關連的一項要求。維持供應之間的總體平衡，以及確保個體層面供需之間的快速調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穩定化手術之後，一般而言，自由價格應該佔上風。

我在導論中劃分出必須畢其功於一役，和那些只能逐步實現的工作之區別。消除短缺經濟需要結合這兩類的工作。穩定化手術會產生一些消除短缺所必需的條件（總體平衡、價格多方面的自由化），但是還有些更進一步的條件，這份要件清單才能完整。這些是屬於長期性的工作，也就是那些與私人部門健康發展，以及對政府部門的需求持續而有效的控制有關的工作。

十、手術和復原

在看過穩定化手術主要的組成要素後，最後這裡還有幾點評語。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經做過本書所提出的手術。蘇聯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嚐試中止或大力減緩通貨膨脹。但是，當時環繞著蘇聯計劃的社會，特別是政治條件，和匈牙利目前的情況是大相逕庭的。

在二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世界施行了不少大規模的穩定化手術。一九四六年，匈牙利終止世界歷史上成長最快的超級通貨膨脹時，是處於東方和西方的邊界。雖然社會主義制度的某些成份已然存在（共產黨的奪權、蘇聯軍隊的存在），但是，在經濟上整體而言，還是依照私人所有權的基礎在運作。穩定化聚集了當時力促重建的所有政黨的精力，並且得到私人資金和有組織的勞工之支持。

時常為人提起的一九四八年的西德改革是很成功的，以最嚴謹的意義來看，也可以說是項**手術**：一口氣實施的改革做到了同時引進穩定的貨幣，以及幾乎完全的經濟自由化。但是，這是完成於一基本上是私有經濟的基礎上。有一些大的壟斷性組織被解體了，但是財產關係則絲毫未動。爾哈德（Erhard）因為是西德社會市場經濟的設計者而受到極大的讚譽，而他的顧問群有好多因素要考慮，但是，他們並沒有面對如實驗室中製造出人為的私人所有者這種工作。畢竟，圍繞在他們身邊的，是真正有血有肉的私人所有者。

分析其他激進的穩定化手術的經驗（如以色列或是玻利維亞的經驗）不在本研究的範圍。我們只要說，雖然這些都是在重病的經濟中施行的手術，而且這些國家的公共部門要比爾哈德時的德國之公共部門大得多，但是，以色列和玻利維亞的經濟，基本上還是屬於私有經濟，這

也就夠了。

匈牙利和波蘭是最早同時處理兩大主要工作的國家，這兩大工作即是經濟朝向以私人部門為主的轉變，以及基本的總體調節和穩定化。這種工作的結合是非常困難的。

穩定快速地施行手術，可以予人抽搐痙攣的時期將會在可預見的未來之內結束的印象。那些曾經得過嚴重疾病、或是看過親愛的人遭受痛苦的人，非常清楚使病人求醫並作出以下宣告的心態：「我再也受不了了，不管結果如何，讓我脫離這種痛苦。我願意冒手術的危險，拿出點辦法來吧！」我感覺匈牙利的人民正趨近於忍受苦難的極限。人們已經受夠了從不間斷的胡亂作為，以及伴隨而來的不確定感。我認為他們已經準備好要冒動大手術的危險。雖然手術會引起暫時的創傷和麻煩，但至少達成真正的秩序和平靜的希望。

註 釋

①無論如何，這種龐大的工程都必然要牽涉到國內外的專家，包括和政府機關沒有關係的人。在這方面我僅強調一個問題。

我們在世界上找不到一個政府在制訂政策之前，能夠傾聽所有不同政治和意識型態傾向的專家。英國在工黨執政的時候，從來沒有徵詢保守黨經濟學家的意見；而後者則是以批評政府來表達他們的立場。柴契爾夫人當權之後，則從未僱用工黨的顧問。柴契爾夫人左側的經濟學家於是向反對黨的影子政府提供建議。一般而言，我們可以說政府和其所招攬的專家之間從一開始就必須存有相互信任。他們至少必須對基本的政治和意識型態問題達成諒解。因此結論是，未來的匈牙利政府，應該從全心贊同其計劃基本原則的國內外經濟學家中選擇其顧問。

至於外國顧問，我認爲光是倚靠「依據職權」和匈牙利打交道，如國際貨幣組織的官員，是不夠的。我堅決地相信許多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家會樂意向匈牙利提出建言。有些會支持匈牙利未來的政府，當然還有些會在不同的反對黨派背後組織起來。

- ② L. Békesi接受I. Wiesel的訪問（1989，19頁）。
- ③ 下面的引言取自我在1986年爲生產者價格的辯論所寫的評論：「所提出的資料把通貨膨脹當作一種與人沒有關係的自發過程來處理，而且必須透過反通貨膨脹的政策來減慢。我認爲這是錯誤的做法。無論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貨幣的創造最終是在財政和貨幣當局的手中。只有在政府創造通貨膨脹的地方，通貨膨脹才會流行，在匈牙利，會出現通貨膨脹的過程是因爲政府所追求的是通貨膨脹的政策。只要匈牙利政府不改變其政策，通貨膨脹便不會消失。」（J. 科奈〔1990〕）。
- ④ 對於通貨膨脹預期和其他通貨膨脹的構成因素之深刻分析可見於F. Vissi（1989）。在匈牙利有關通貨膨脹的作品中，我要提K. Csoór 和P. Mohácsi（1985），M. Z. Petschnig（1986），以及T. Erdős（1989）的論文。
- ⑤ 同時，我們還是必須盡我們最大的努力，運用最先進的科學方法，來預測手術期間及之後可以期待的過程。這裡可以利用現代的總體經濟學模型。
- ⑥ 有些時期因爲受到凱因斯經濟政策的影響，赤字是故意創造出來的。目的是要藉著人爲創造的超額需求促進經濟上揚。其結果是很可疑的。
- ⑦ 本書並沒有提起，如果這些建議被接受了，應該如何翻譯成稅法的語言這個問題。我們究竟應該修改目前的稅法，還是應該創造出「白紙狀態」的新法來取代舊法，這幾乎完全是法律的問題。爲了達到概念化的目的，從白紙狀態重新出發是一種權宜之計。
- ⑧ 凡是希望對稅法基本原則做更爲一般性研究的人，可以參考如R. A. 和P. B. Musgrave（1980）和J. Stiglitz（1986年第二版）的著作。
- ⑨ 我再一次聽到參考西方的做法。但是，要發展出公民和政府之間建立信任關係的國會民主，需要好幾十年，甚至好幾百年。在西方，稅法機關對公民私生活的干預是受到法律限制的，而且公民也可以走上法庭向政府的任何行動挑戰。

但是，即使在這些限制之下，稅務機關還是時常濫用其權力。

世界知名的電影導演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在拍片時期被帶到法庭去面對稅務詐欺的控訴，這種野蠻的行為是人盡皆知的。而這件是發生在時常做為典範的瑞典。因為這些事，使柏格曼受到打擊，他移居國外，並且在自動放逐的情況下工作了好多年，雖然他對自己的家園還是有很深的依戀。多年後，他恢復了清白。但是，不客氣的稅務官僚對柏格曼和世界人類文化所造成的損失卻是無法改變的。

對瑞典或任何西方國會民主的稅制下結論，遠非本書的任務。然而，如果貫徹執行個人所得稅制的話，類似案例發生在匈牙利的可能性一定要高得多。於是這裡就產生了基本的道德兩難：哪一項是較重之惡？我們是不是應該為了防止九十九個人逃稅，而懲罰一百個人，雖然承認連同這九十九個有罪的，可能有一人是無辜的？還是為了防止任何一個無辜的人受苦，而讓那九十九人逃脫？就個人而言，我堅決地選擇後者的做法。

- ⑩ 在西方文獻中，有一種給予窮苦人民的經濟援助稱為「負所得稅」。上面的思路顯然並不反對給予這種負所得稅，因為這既不是獎賞也不是懲罰。換言之，這不能當作一種「誘因」。
- ⑪ 這是社會正義的必要，但其本身並非充份的條件。
- ⑫ 這是Rawls所建議正義準則的動態重新制訂，本書以簡化的方式加以提出。更為詳盡的處理請見J. Rawls (1971), R. Nozick (1974), A. Sen (1988) 和J. Kis (1986)。
- ⑬ 所建議的稅制基本上稅收的來源是在於所得的消費，因此沒有消費的所得依然是免稅的，如此便間接鼓勵了儲蓄和投資。
所得稅使儲蓄的人處於不利的境地這種觀念起源於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作品。後來費雪（Irwing Fisher）提出同樣的觀念，並且大加強調。關於消費稅，特別是增值稅的利弊，請參見R. A和P. B. Musgrave (1980)。
- ⑭ 我並不反對基於其他理由經過妥善考慮的少數例外，如，對酒精類的飲料課徵特別的稅，只要國會在完全瞭解這並非父權式的干預才接受便可。
順便提一下，以高稅率來對抗酗酒的有效性是有爭論餘地的。然而可以確定的

是過度徵稅和行政控制一樣，無法消滅酗酒。這反而會導致法律方面，付稅的釀酒產業的逃避，以及非法釀酒業者之出現。

- ⑩實際上當這種愚蠢的過程必須在引進個人所得稅之前反向執行，當先前的所得必須「毛額加總」，就變得非常明顯。
- ⑪扶植國內幼稚工業可能需要保護性關稅。我們在討論生產補助和保護關稅的關係時，會再回到這個問題。
- ⑫本書對稅制的好幾個問題撇開不談，如財產稅，以及對自僱者之課稅等問題。新的稅制當然必須解決這些問題。
- ⑬這當然也表示最後必須讓國會洞察預算，不能以財政的花樣來掩飾赤字的真正大小。國會應該對軍事支出等有真實的掌握。
- ⑭就此而論，見E. Várhegyi (1989)。
- ⑮失業的可能性增加，是最重要的伴隨現象之一，將在第三章第二節緊張關係的來源中再詳細討論。
- ⑯儘管表面上是對稱的，實際上這種情況是相當的不對稱。如果私人公司違反了和國營公司所簽訂的契約，而且提起訴訟，並且法庭判決了一百萬匈牙利福林的罰金，私人企業主必須自掏腰包來付這筆錢。但是，如果是國營公司違反了和私人公司所訂的契約，而且所裁定的罰金也是一百萬匈牙利福林，國營公司的經理人不是從自己的口袋，而是從政府的口袋來支付這筆錢。因此，國營公司並不害怕這些法庭程序。這是兩個部門間生意關係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沒有完全令人滿意的最終解決之道。但是，如果對於問題中有直接責任的國營公司經理人和領導者，必須從自己的口袋負擔一部份的罰金，那麼，契約的權威性應該會有所加強。
- ⑰以波蘭穩定化計劃的情形而言，這種「修正名目工資提升」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清楚這是不是對匈牙利也是必要的。
- ⑱我希望上面以直接邏輯的思考方式是能被接受的；我不想引用權威。以下我所加的，只是出於興趣。
1986年中國大陸政府邀請了七個外國專家，對改革過程進行意見交換。其中有一項討論是通貨膨脹的危險。有三位客人發言：依次是西德Bundebank前總裁

Otmar Emminger；曾經擔任甘迺迪政府經濟顧問、諾貝爾獎得主的美國經濟學家托賓（James Tobin），和我本人。他們兩人都是一生生活在資本主義環境下的西方經濟學家，對於他們體制經濟的理論和實際瞭如指掌，毫不猶疑地向中共大力建議應該以行政來限制工資。我自己是比較制度理論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專家，也提出同樣的建議。

中共政府未能注意我們的建議，因而失控的工資所引起的工資通貨膨脹，和幾乎無法滿足的投資飢渴於是加速惡化。

⑭這些例外值得尊重。參見，如I. R. Gábor（1988），I. R. Gábor和Gy Kóvári（1987）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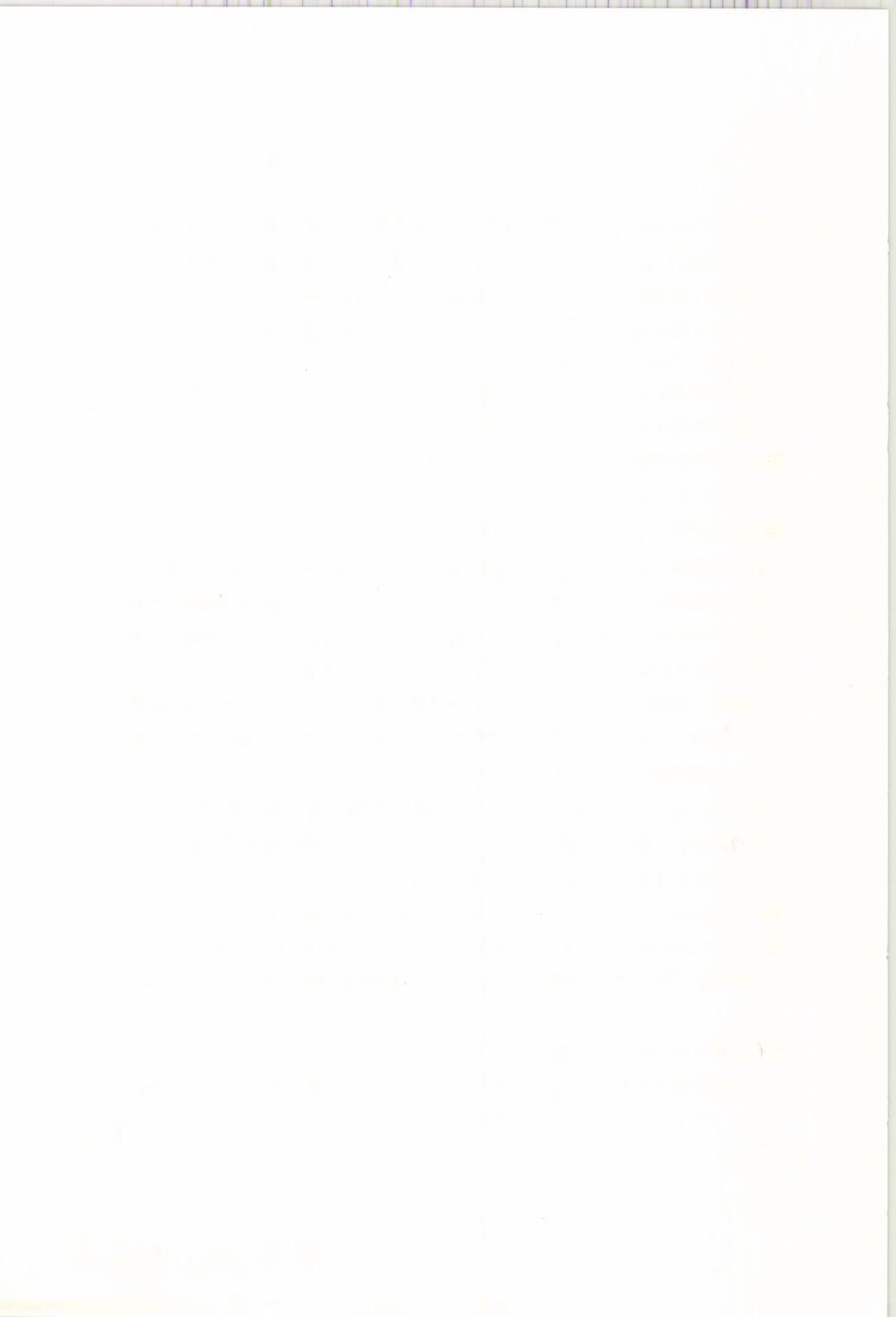
⑮消除中間商，建立農業生產者和都市消費者的直接接觸這種古老的想法，是所有都市食物市場型態的起源。目前在匈牙利，這種農業生產者和都市消費者之間的中間商業尚未發展，暫時很可以扮演權宜性的角色。生產者和購買者都會感到他們得到了好處。但是，這只能是暫時的。唯有創造最先進的精緻中間商業來連接生產者和消費者，才是持久的解決之道。各個採購和銷售組織應該彼此競爭。這種仲介功能應該由私人商業擴展至更大的範圍。在這裡，我們也需要一個真正的現代市場，能夠藉著競爭和企業家的自由進入，來降低仲介活動的成本和利潤。

我相信，大部份的經濟學家也都有這種想法。浪漫的「反市場主義」和反對「生意導向的仲介商業」宣傳活動，是沒有充份理由的，這樣只會嚇走企業家，使他們不再從事食物的貿易，不再大量投入競爭。

⑯I. Széchenyi（1979），214頁。K. Szabó使我注意到這段引文。

⑰G. W. Kolodko 和W. W. McMahon（1987）稱這種現象為「短缺膨脹」，這個辭創於「停滯性通貨膨脹」之後，停滯性通貨膨脹是指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發生。

⑱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這主要是發生於所謂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銷售者想要以提供較佳品質、較有禮貌的服務和較快的送貨，從競爭對手那裡贏取買者。見T. Scitovsky（1971）和E. Domar（1987）的作品。



第 3 章

從政治觀點看經濟轉變的工作

一、計劃的接受性

前面兩章所描述的轉變計劃被接受的程度到底有多少？當然，在每一方面都要取悅所有人是不可能的。我的計劃不是要討好所有的人。但是，在探討預期將會遭遇反對的論點之前，我將強調那些可視為很可能受到歡迎的要素。然而，即使是這些要素，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欣然接受的，其吸引力和公民的倫理和政治觀點以及經濟利益有關。

1. 本書所描述的觀念會吸引真正的**自由**人士。❶個人自由並不是唯一的價值；對大部份的匈牙利人來說，還有其他相當重要的價值，如社會的物質福祉、平等、社會正義，以及國家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這些價值時常是互補的，但有時候也會有所衝突。這裡所陳述的發展途徑，吸引那些把個人的自主權以及公民的支配權視為在等級上相同於或高於其他價值的人。這些人拒絕個人必須服從於國家的利益，以及運動、黨派、或領袖所要求之集體利益。

我們可以把上一段「個人」這個字換成「家庭」。計劃並沒有在字面意義上區分個人和家庭，而家庭事實上也正是最小的個人群體。計劃要求賦予家庭自主權和支配權，並尋求將最大可能程度的經濟決策

賦予家庭。

最近「自由」在匈牙利已經成爲一個時髦的字眼。我的研究旨在經濟領域上賦予這個字更爲具體的意義。每一個、而且是所有的個人和家庭都應該可以自由地處理他們的勞動力、產品、休閒時間、金錢和財富，到最後，國家應該放任個人和家庭自由行事，只有在某些人真的濫用自由，而影響到別人和別的家庭時，國家才應該出面干預。

2. 我深信本書所提出的構想對那些願意大膽從事**企業**（根據本書所描述意義的企業），那些願意冒險、願意投資金錢和財富的人，是有吸引力的。

我不能同意那些只看到人類行爲正確面的人。我更不會去苛責那些嚴守紀律的僱員，他們準時上下班，服從上級的指示，下了班回到家，把一天剩下的時間花在休息或處理家務上。大部份的人都是屬於這一類。我也瞭解，有些喜歡默想的人會對世界進行思考，並發出牢騷。這些人也可能扮演啓發思想的有利角色。最後，還有一些人，因爲機遇不好，雖然擁有必要的內在動機卻無法特別活躍（這一組人將另行討論）。

在強調我的想法對上述的行爲形式並沒有批評的意思的同時，我也希望清楚地指出，我的計劃並不是靠著這些類型的人。在此，我們必須回到亞當·史密斯的說法，準備爲自己或家庭而從事額外的工作，並賺取額外金錢的人，同時也會使社區受益。國民所得和國家財富不是崇高的集體主義下的產物，也不是神祕的經濟統計觀念。追求額外的所得，你也就增加了國民所得。你爲自己累積更多的財富，也會提升國家的財富。如果你爲自己蓋一棟房子，便增加了國家的住宅數，要是你抽屜中存了一千美元，你便對國家的外匯存量有所貢獻。國家

的財富不過是個人財富的總和。

人們必須改變思考的方式。富裕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是可恥的事。有一種錯誤的想法已經深入人們的骨髓：即如果有人拿得比較多，那麼這是因為他從別人身上取走了這多出來的部份。那些景況良好的人折磨著別人，要是有錢人不馬上將他們的財富施捨出來，也是件可恥的事。如果他們不願意自動這麼做的話，那麼便必須拿走他們的財富。

現在國家正遭受嚴重的經濟危機。我們不應該尊敬那些哀嚎得最大聲的人，而是那些停止發牢騷、沒有挨家挨戶求助、且著手改進自己的經濟地位的人。人們不應該抱怨，而應該逾時工作，在自己的庭院中種些蔬菜水果，投資自己的事業，和別人合作並設立公司，從國外帶進國內需求甚殷的產品來銷售等等。所有人都有數以千計的機會。「天助自助者」這句古老的諺語，真是再適切也不過了。政府的援助應該施於那些真正無法自助的人。但對於那些有能力，卻因為被動、怠惰，或懦弱而未能做到的人，既不值得去苛責也不值得去同情。這些人是社會主義的受害者，因為在過去幾十年，社會主義已經削弱了他們的個人動機。雖然新的道德教育也是必要的，但是，光是教育的結果並不會就帶來改變。公眾的態度會隨著社會的改變而改變，人們遲早會明白，每一個人都必須開創自己的命運。

這是對第一點的實質補充。本書所提出的觀念對那些要求個人(或家庭)自主權，以及那些想要利用這種自主權的人是具有吸引力的。也吸引了那些能夠、並且願意開創自己的動機、活動和企業的人。

3. 這個觀念也可能吸引那些擁有自己的**財富**或希望獲得財富的人。此處，我心中所想的是範圍包羅最廣的財富，範圍從最小的單位(一小片花園，或是數量不多的私人存款)，到中小規模的單位(家庭住宅、私

人店面或工廠)，再到所有較大的單位。但是，不管財產的規模如何，所有者都必須受到保護，不受國家任意行爲的干預。

出現將焦點擺在特定所有者團體的利益的黨派和機構，是健康的政治多元化的一種制度，有些是專門、排他或主要在保護小規模的農民，而其他則支持都市的中下階級或大規模的企業主。當然，也有些政治力量懷抱著較寬廣的計劃，能夠「跨越」好幾個較小的所有者團體。本書並不是要對這些組織提出建言。所有把私人財產安全自由發展當作是首要之務的政治力量，都會認同這裡所提出來的想法。

本研究的目的不止是要鼓勵私人累積，而且也要提出可以清除財富累積障礙的政策。從農業中舉出一例：我並不建議政府重建對富農（Kulak）的管制，這些富農在稍早已經被無情地剷除掉了。^②我也不提出人爲的「農民再度小康化」的建議，我要提議的是：採用農村資產階級化的過程。我們應該都樂於見到藉著類似丹麥、西德和美國農場一樣，配備有現代科技設備的資本密集農場實質發展之出現，在農業的生產上，雖然利用愈來愈少的勞動量，卻能擔負起愈來愈大的產量。^③

除了農業之外，轉變的路徑也可能吸引那些願意爲穩定的富裕而犧牲和儲蓄的人。我不想鼓勵商業冒險家不放過任何一點可以累積的金錢，然後帶著這筆錢逃跑。這裡所提議的經濟政策是要尋求對那些年復一年地節省，把錢投資到自己的企業上，並且使這個企業從小公司成長成中等規模，後來再變成大規模、甚至巨型公司的人，在物質、道德和法律上能得到保障。

列寧寫過小規模的生產一天天、一小時一小時地都在創造資本主義，他是對的。那些被這種可能性嚇壞的人，顯然不能隨著本計劃所

描繪出來的發展一同前進，因為他們甚至不想讓最成功的小規模生產者脫離小規模生產。這些人所採取的立場是，擁有一小塊地或一個小工廠是沒有什麼關係，如果業主事業經營順利的話，把錢花在豪華的旅行、或是蓋一棟華而不實的避暑別墅也沒有問題。但是，必須以官僚干預的方式來阻止他們從小規模的生產者變成真正的資本家。本研究全然拒絕這種想法，本書是要尋求建立累積私人資本所需要的自然條件。這個計劃是要吸引那些將此視為一可靠機會的人。

4. 穩定化手術支持**停止通貨膨脹**的展望。在我看來，這一點將會吸引數百萬人，不過，那一小群由通貨膨脹過程中攫取利益的人除外。想一想如果政治團體許諾要停止通貨膨脹，擔負起履行手術的全部責任，並**信守諾言**，將會得到多大的政治支持！有許多人會為了停止通貨膨脹而非常願意有所犧牲。

很遺憾的，在無數的漲價當中，還沒有人做過這樣的承諾。這便是為什麼人們把這種情形看做是無可救藥的原因之一。人們現在感到憤怒，因為每一個星期，官方都會宣佈價格的上漲，可是次日又會變得更加憤怒，因為即使沒有任何正式的宣佈，價格依然持續上升。實際上，如果我們想一想全國經濟的平均情形，以實質消費來看，問題並沒有像大眾的心情所暗示的那麼嚴重。有廣大的社會階層因名目工資的增加，使得價格上漲得到補償，有時候工資的上升甚至超過價格的上漲。但是，大家依然對價格的不斷上漲感到憤怒。這便是為什麼明確的穩定化計劃將會大受歡迎，即使倡議者事前公開宣佈這將造成極大的震撼，以及一次非重複性的重大價格上漲。但是我們必須鄭重的強調，這種穩定化計劃只有在倡議者信守諾言時，才會繼續受到歡迎。

5. 消滅短缺的經濟的諾言是這個計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正如同通貨膨脹的情形，很遺憾的，實際上沒有任何的政治潮流或黨派擔負起這個責任。但是，這卻是民眾抱怨最多的地方之一；無論是村民或鎮民、年輕人或老人、窮人還是富人，都身受短缺、排隊、和受制於賣方之苦。短缺困擾著消費者，而且時常干擾生產者的工作。以前，對那些跨越奧、匈邊界的人，最美好的經驗之一便是馬上瞭解到，只要有價格，所有東西在奧地利都可以買得到的。這便是兩種制度最明顯的差別之一。消除短缺也可以產生類似看得到的改變：這可以向匈牙利的人民證明，制度已經有了真正的改變，而且匈牙利人終於能夠享受買方市場的好處。

6. 這裡所描述的經濟政策，將會吸引所有關心國家財產的命運，以及受夠了公帑被浪費使用的人。這些人要求所有處理**國家金錢**的人，應受到嚴格、公開的政治監督。

7. 對於那些喜歡**政府所有權原則**的人，這個計劃既不是非常吸引人，也不是特別驚人。我們所說的不只是國營公司的經理人，還有那些長久以來、而且現在還是社會主義原則的熱心支持者，以及抱持著生產工具並非私人所擁有的內在價值觀的人。這裡所提出來的經濟政策要我們注意，不可對國家所有權做攻擊性和不負責的清算。這計劃也警告不要冒險從事相反的行動，以類似不負責的態度激烈地消滅私人財產。這個計劃希望能創造兩個部門間真正的、而不是假的競爭。私人部門所扮演的角色應該和其能力成正比，以證明其相對於官僚政府所有權的優越性。私人企業主應該有購買某些政府部門單位的機會，但是，只能以他們能夠負擔的步調，而且要憑著自己的資金以及他們所能得到的信用額度（提供他們自己的財產當作擔保品）。

這個計劃不會阻止真正自治機構所有權的發展，或是真正合作所有權的發展。

而這一切都能因一項實質發展的結果而達成。我們還要等上許多年，才能看清實質的資產階級化之後，政府所有權所佔的比例還剩多少。不管怎麼樣，這一比例應該少到足以強迫政府部門的行為配合私人部門的行為，而私人部門當然是採硬性的預算管制，是真正的市場導向，追求穩定的商業政策，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對那些依然相信政府部門的生存能力的人，政府部門的這種改變應該促使他們積極的工作，而不是憤怒的抗拒。再怎麼說，這個計劃還是比那些想要一舉消滅政府所有權的計劃來得吸引人。

8. 我們所提議的政策要求中止**對國家資源和財產的浪費**，無論有什麼藉口都必須中止。這種現象使人民感到困擾，甚至憤怒。幾十年來，口號所宣傳的觀念是，國家的財富便是人民的財富。這只說出了一半真理。正如同這個國家的一千萬人民顯然不能自己控制複雜的生產過程一樣，我們也不能證明，實際上也無法證明上面的陳述是對的。如本研究已經說過的，國家的財產屬於所有人，但是也不屬於任何人。

但是，口號有一部份是對的，因為這個國家人民的勞動和犧牲蘊含在國家的財富中。人民有權知道這個大寶藏的命運。這裡所提出的計劃，要求所有的銷售都必須在公開和公平的商業條件下進行。這一受人歡迎的想法可能會為計劃贏得支持者。

9. 國家財產不能以有如倒閉大拍賣的最低價格出售給外國。在此，我們同樣需要高瞻遠矚的**國家政策**，而不是短視的孤立主義、對外國人無理的仇視或恐懼，或是反西方的偏見。如果外國商人在匈牙利購買公司、設立辦公室和商店，或是加入匈牙利的企業，而且這些企業

對匈牙利人民都是有用的，那麼便會有極大的助益。許多匈牙利和西方新合資公司的開幕典禮，雖然廣告見諸各種媒體，還有文件交換和香檳慶祝，但是並不構成成功的指標，我們倒是願意看到，可以客觀證明這些交易真的是對匈牙利有益的具體分析。

我們必須以法律設限阻止外資的全力入侵。我們不是要利用官僚形式的禁止來破壞外資的利益，而應該盡可能清楚坦白的指出我們所歡迎的限度，以及我們對超過和侵犯的概念。

這種自信但卻沒有任何盲目愛國主義痕跡的國家政策，很可能會產生強烈的吸引力。

另一個有關這個計劃的國家特色的評論也是值得一提。本研究一再要大家注意，沒有必要一成不變地模仿西方商業世界的制度。這種警告並不是根植於匈牙利遲早應該建立一擁有自己特色的證券交易所，以取代學習紐約、蘇黎士和東京的證券交易所的信念。我這種不入時的警告，是因為我相信有許多制度，只有在實質的歷史發展之下才能健全地進化。

過去幾十年，有許多制度無法生根，是因為這些是強加在社會上設計不良的人為幻想。匈牙利歷史發展的新階段將會自然產生市場、經濟管理、以及商業世界的各種組織形式、法律制度、及社會行爲。這些顯然會因為外國的例子以及與西方夥伴的接觸而受到影響。且讓我們盡量地向他們學習，但是要學得有自尊。贏得外國銀行家或實業家的許可並非第一要務，畢竟，他們給予許可常常是依照表面的印象。良好的形象必須在國內獲得。

10. 最後，本研究所描繪出來的政策可能還有另一項吸引人之處，即從混亂中創造出**秩序**。絕大部份的匈牙利人感覺到他們的國家現在

是處於動盪、瓦解和混亂的狀態下。天天都有新的規則，今天說的事，和明天說的剛好相反。施行互相矛盾的措施，經濟經理人或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哪些該遵守、哪些可違背；法律沒有權威可言。人們對於違法不會感到特別不安，大不了被捉到的時候被驅逐或解雇罷了。

同時，人們把「秩序」和一些可怕的觀念聯想在一起，例如坦克、下獄，以及大膽直言的人的消失，許多人把「贊成秩序」看成是「重新史達林化」的同義字。根據一位匈牙利著名的社會民主社會學家，桑多·史札來（Sándor Szalai）常常被人引用的諷刺說法，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軍營或妓院。那些不喜歡營房紀律的人，就必須忍受妓院的混亂。

但是，我還看到了第三種選擇性。匈牙利需要秩序，但不是軍營型式的秩序。我們所建議的政策，希望描繪出這種秩序是怎麼達成的。讓我們終止對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疑慮，擺脫因價格一夕數變而無法計算的情況。應該要有穩定的法律來保障個人的自主權、私人的財產，以及儲蓄和投資的安全。政府的預算應該平衡，必須終止不受限制的支出，以及印行鈔票來抵償支出的做法。

因此，這是一個贊成秩序的計劃，而這也可能是其吸引力的主要來源之一。

二、緊張關係的來源

我不想喚起虛幻的希望。這個計劃有其吸引人之處，也有令人排斥的地方；會引起同情也會造成抗拒。贊成和反對所採取的立場並不能落入簡化的馬克思模型，也就是某一階級的利益受到保衛，而別的階級的利益則受到攻擊。如同以馬克思的意思來看「階級」這個字，

同一個階級中的不同成員對於所提議的政策，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反應。實際上，再進一步說，即使同一個人對於計劃的反應也可能贊成反對兼而有之。雖然在我看來，本研究所描繪出來的政策形成一個完整的整體，但是，許多人可能會覺得他們願意接受某些論點，但是卻拒絕其他的。因此，我們可以預期有各種緊張關係，我只提一提其中的一小部份。

1. 政府部門的員工工資。如果面對政府部門員工的抗拒，而想要採用所提議的經濟政策，將會造成大災難。事實上，這樣根本無法進行。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值得思考一些外國的例子。

有一個例子是，比較戰後德國和英國的發展。戰勝的英國，工黨得到政權並將好幾個工業國有化。同業工會的力量有驚人的成長。重分配的戰役來了就不走。工會以進行大罷工來為組織起來的工人尋求較多的工資。不只一次，在生產中佔有關鍵地位的相當少數工人團體就能使整個產業麻痹。雖然英國並沒有停止經濟成長，而且也沒有到達危機的地步，但是進步卻相當地緩慢，遠落於英國的競爭者之後。

戰敗的西德所發展出來的情形則不同，在穩定化手術期間，是由自由—保守聯盟所掌權，後來則和自由—社會民主聯盟輪流統治；有很短的一段時期，則有大聯盟的出現。但是，從頭到尾經常性的因素則是同業工會和政府以及私人部門建設性的合作。換句話說，以布爾什維克輕蔑的描述來說，就是存在著「階級和平」。受創嚴重的西德經濟中的三個主要演員——私人所有者手中的部門（大、中、小規模）、政府官僚，以及由工會所代表的勞工——瞭解對重分配的爭論將會是自殺的途徑。延續本研究稍早所使用的意象，主要的是將手中的麵包變得愈來愈大塊，而不是對我們手中的麵包爭吵不休。

我不想將戰後英國和西德大為不同的發展，追溯到有利於西德的單一因素。但確實我們剛才注意到的那些差別是主要的，而且可能是最重要、最具解釋能力的因素。

讓我們從波蘭這個和我們比較接近的國家舉例說明。過去的十年到十五年一直到最近，成立國家團結政府時，員工和身為僱主的政府之間有著鬥爭。這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鬥爭，因為在團結工聯方面追求民主自由的奮鬥和一般的工會活動（也就是想要提高名目工資的罷工運動）糾結在一起。這同時是國會民主和經濟災難之準備的英雄式結合。這種鬥爭最像絕食抗議，因為政治英雄寧可死也不願意放棄原則，然而其他數百萬的人民通常只願意在很短的過渡時期，擺出這樣的英雄姿態。此後，他們不僅想一次吃飽，而且要天天吃得飽。他們想要麵包和肉類，更重要的是，他們想要一個安靜舒適的生活。然而，這種生存的物質條件卻遭到經常停工的破壞。波蘭最近的改變，可能已經創造出經濟上主要角色之間可能有所協定的聯盟條件；這些角色包括：官僚、政府部門的經理人、私人部門，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門的員工。

現在讓我們從國外的例子回到匈牙利的情況。研究中所描繪出來的經濟政策，呈現給政府部門的員工是什麼樣的遠景？上一節所列的十點，有許多對他們應該也有吸引力的，因為其中大部份都是「與階級無關的」。比方說，有可能一個沒有想要開創自己事業的工廠工人，樂於見到村後兄弟的私有農場欣欣向榮，或是自己的兒子加入了鎮上的私人企業。況且他也是受到官僚諸多限制包圍的公民，因此所提計劃中的自由主義和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會使他的生活好過些。

但是，我並不想混淆真正的困境。如同第一章的國家部門和第二

章的總合需求管理等章節中所明白宣佈的，我是鼓吹**嚴格的工資原則**。個中的含義是在穩定化手術期間凍結政府部門的薪資，或只允許小幅度的上漲。真正穩定化計劃的實施將會顯示出，如果價格會上漲，而且僅此一次時，上漲可以到多大，我無法提出具體的數字。但是穩定化手術所定下的名目工資水準，必須以鐵腕來執行。如果在這裡放下繮繩，便會全盤皆輸，一切又會回到原來的狀態：失控的工資將帶來失控的物價；如果依照煽動性的要求而把價格壓下來，將會有大規模的短缺，等等。我們便會回到手術之前的情況。大變動成了徒勞無功，而且之後要進行另一次手術便會困難得多，或者根本不可能。

要說服政府的員工事先同意接受這種自我犧牲的工資原則也許不可能。但是，必須努力使他們相信，如果國家要逃避經濟大災難，這一點是絕對必要的。最後，當手術完成時，他們也是改變的受益者。這並不是一方所贏的剛好等於另一方所輸的「零和遊戲」。在這裡，每一個人都可能是贏家。今天，西德工人所得到的比他們的英國同伴還要多。當經濟終於復甦，生產成長、通貨膨脹下降，價格可以信任，所賺得的匈牙利福林不再在口袋裡侵蝕掉，而儲蓄的購買力也保持穩定，工人也會受益。

幾十年來，員工一直被剝奪罷工的權利。現在他們開始瞭解手上握著一項有力的武器。我承認要抗拒使用這項力量的誘惑並不容易。

同業工會運動已經產生了競爭。任何以歷史學家或政治社會學家的角度來觀察目前的情況的人，會發現許多工會官員的行為是很容易解釋的。到目前為止，他們一直被指控和執政黨以及政府官僚狼狽為奸，而且充當他們的「輸送帶」。現在有許多人覺得這是證明情況已經不再是如此的時候了。這一步受到工人的歡迎，而且沒有風險，現在

沒有人因為煽動罷工而被祕密警察帶走。

我並不是說工會必須放下他們的雙手。同業工會的官員應該提防對工人的真正傷害。^④他們應該在完全清楚自己是在社會上具有很大份量的情況下，參與制定新政府的經濟政策。但是，他們必須小心地處理罷工這把兩刃刀。畢竟國家經濟的復甦首先是在於經濟中的主要演員是否能彼此意見一致，再者是他們是否能遵守協定。

2. 失業。稍早我們已經提過失業的威脅。雖然冒了一些重複的風險，在此我們還是在緊張關係的來源中再次提到。

已經有人發出下面的要求：只有替原先所有的工人找到新工作之後，才能將工作廢止。在我看來，實現這項要求是沒有任何保證的。任何政府做出如此的承諾，將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尋求積極參與國家復甦的工會運動，是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的。

穩固的市場經濟也無法保證做到這點。生產如果能更快速而有彈性地配合當前的市場情況，某一處有工作，而別處工作受到刪除的情形便愈普遍。像這樣快而有彈性調適的生產是很合宜的。

在第二章所描繪的重大手術當中，實現這種工作權的要求將會特別荒謬。計劃中的訊息正是我們不能、也不想坐在辦公桌後面來決定「結構的政策」，而是將供需的相互調節交付給市場。沒有辦法事先定出市場價格，因此就無法預測哪家工廠將會永久遭受損失。我們必須坦白承認，這項手術將引起重大震撼。因此我們怎麼能夠保證，對於每一個在大變動中丟了工作的人，都會有擁有機器或辦公桌的另一家工廠張開手臂在等待著他，甚至還有別的公寓在等著他？

除了這做不到的承諾外，倒是可以做些實際的承諾。本研究區別了過渡的措施，以及建立勞動市場和工作權之間長期而持久的關係。

至於說到的過渡措施，第二章中的人道主義和經濟的儲備存底部份已經提到在手術期間，要預存有「人道的」儲備。對於所有因穩定化而陷於困難的人，必須給予援助，直到他們能夠適應新環境為止。至於研究出援助該採什麼樣的形式，或是應該附加什麼樣的條件，我不認為這是本研究的任務。我所加的評論並不是要用在分配援助的規模或大小，而是就其精神而言。這並不是令人感到丟臉的布施，而是社會和那些並非因自己的錯誤而曾遭受嚴重創傷的人團結一致的表現。對於在困苦歲月中需要這項幫助的人的尊嚴，應該有人道的尊重。

回到較長期，我們必須學會接受摩擦性失業總是存在的這種觀念。（我們也應該注意，所有行業剛好都有摩擦性失業，包括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只是我們對其規模所知甚少。）一個經濟調節能力愈強，工作或甚至整個工廠或產業消失的情形就愈普遍。套用奧地利出生的偉大經濟學家熊彼得（Schumpeter）有名的說法，發展的條件是**創造性的毀滅過程**，而在破壞所及之處，便有失業。因此，我們必須建構出和摩擦性失業有關的制度體系和法律規範，範圍從失業救濟金到再訓練計劃、到住宅的可變動性以及由一地遷移至另一地的機會。這一方面非常需要政府和同業工會之間的合作。

最後，對抗持續性大規模失業最重要的安全措施便是經濟成長。實際上，說得更強烈一點，經濟成長是**唯一**的安全措施。匈牙利和許多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便是充份就業。這並不是因在憲法中包含有工作權而達成的，而是利用特定的經濟成長策略。但是，在較早的經濟制度中，維持這項成就的方法並不是透過使用罷工、威脅，和政治壓力來堅持充份就業的「既得權利」的鬥爭。目標是經濟必須能夠再起飛，如此成長才能創造更多的工作。

5

雖然我們彼此提防著失業的恐慌，有時候是出於正當的原因，有時候則是太過擔心，但是，也有許多經濟的分支機構是遭受勞工短缺之苦。未來這種情況將更為嚴重。服務業部門今後的成長將會快得多，而且必然會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我要特別強調私人部門成長的角色。在未來幾年，如果能除去發展的官僚障礙，私人部門將能夠吸收大部份由「大手術」所釋放出來的勞動力。

3. 窮人的問題。如果所要發展的腳本中，政府代表了經濟觀點，而人道觀點卻扮演了**反對**的角色，那麼對於穩定化和國家經濟的繁榮都將是致命的打擊。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來表達這種極可能造成傷害的對立態度。政府可能站在富人那邊，而那些支持窮人的人就必須抗拒政府。或者，還有另一種二分法：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技術官僚，而反對黨的角色則是鼓吹福利政策。^⑥

我希望讀者能夠感覺到本書的每一行都鼓吹著對每一個人的關懷。計劃的基本目標是要增進一般大眾的物質福祉。但是，我無法規避以下的問題：嚴重的經濟災難會使最窮的公民處境更加困難。因此，我想要對福利政策有幾點建言。

首先，我要重複說出，目前福利政策最重要的措施便是控制通貨膨脹，任何真正認為窮人需要幫助的人應該全心地支持穩定化計劃，而且拒絕所有破壞這個計劃的建議。

我要說的第二點也是再度提醒：在穩定化手術開始之前，必須留下準備金好對那些暫時有困難的人提供幫助。

第三，需要一涵括數年的福利政策計劃。有許多人比我還有資格對這種計劃的細節發表意見。讓我藉這個機會對那些多年來為窮困和

處境不利的人以實際行動熱心奔走的人，表達我的敬意。⑦他們現在當然準備要加入其他許多專家，共同制定這樣的計劃。就我本身，我願意在本書中對這個問題的經濟面和倫理面提出一兩點意見。

在制定福利政策計劃時，兩種相對的意見難免會有所衝突。需要無窮，而資源有限。所有的福利政策制定者，所有有良心的福利政策官員，以及所有社會問題的研究者和作家，都可以提出包羅數以千計的貧窮和苦難的悲慘例子和個案的完整清單。凡是對同胞有一點同情心的人，看到或聽到這些情況，沒有不受感動的。另一方面，國家則債台高築，處於悲慘的景況。對於有社會責任感的經濟學家而言，顯然只有有效的生產成長和經濟復甦，才能使這個國家走出困境，這需要投資，而且假設工資可以提供真正的誘因，以及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對那些給予企業最大動力的人高所得。此外，爲了長期的發展，必須改進教育和科學研究。這份清單可以再寫下去。

在我看來，唯一的可能是，對福利政策支出設定合理的上限。應該不需要每天小吵不斷，讓「福利政客」和「窮人鬥士」對抗鐵石心腸的「財政官員」。畢竟，這便是民主國會和有關國家預算的負責任辯論的目的。讓每一個國會議員，從有關福利支出的觀點，在心中牢記著自己的政治責任。議員在作決策的時候，必須將所有其他的支出項目都考慮進去，而且也要記住支出必須從稅收中來平衡。

最後，必須順利達成有效期爲一年的國會決定。我想如果可能的話，事前兩三年把事情決定下來會比較有用，如此可以爲參與規劃福利政策細節的工作和機關，提供計劃工作的架構。他們所設計的計劃應該是有彈性的，指出應該保留的工作，也就是哪些是情況發展得比較有利時可以施行的，以及哪些是情況比預期的還糟時可以省略的工

作。但是，我們必須大致規劃出，目前匈牙利可以用於福利目的的支出有多少。必須從這一點，而不是瑞典福利給付的數量，來開始思考福利政策，當國家的疾病已經治癒，而每人國民所得也已經達到目前瑞典的水準，我們可以重新考慮福利支出所佔的比例。

我強調國會議員的角色不是沒有原因的，人們認同他們在社會中的功能。我們可以預期財政部長在向國會發表演說的時候，會強調財政的觀點，這也是他的責任。新聞界挖掘貧窮和苦難的驚人案例，並利用這些來影響輿論和國會議員的良心，這也是可以預想到的。但是，最後還是要做決定；以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說，稀少的資源必須加以分配。做這種決策的權利和政治責任是屬於國會，也只屬於國會。

對於窮人這個問題，我還有另一個意見，同樣是有關政治、倫理和經濟層面的主題。我認為如果減輕貧窮的話，窮人的生活將有所改善，而不是靠先前富裕的人加入其貧窮的行列來改善其生活。我知道這觀點是有爭論的餘地，但是，無論如何，我還是要強烈地表達我的意見。如果拿走一些我認為是「太過有錢」的人的所得、儲蓄或財富，對我來說，算不得是道德補償。因為多少才叫太多？假如說有人比我多賺百分之五十，一切還都沒有問題。好吧，讓他賺兩倍多的錢。但是五倍或六倍之多又怎麼樣呢？那真是可恥的不公平嗎？

這樣的論調是無法辯護的。沒有人有權可以規定何種水準的所得或財富，在道德上是被許可的；或者劃出一條界線，超過這條線就成了不道德。一旦我們開始以這種方式來判斷，就走上了通往沒收私人財產的道路。

因此，我建議我們不要以響亮的辭藻來反對「有錢人」，也不要以此來安撫匈牙利社會中的窮人。不管電視新聞報導以不贊許的口吻播

報了多少次有關人們購買奢侈品或是靠近巴拉頓湖(Lake Balaton)的別墅，領取養老金的人桌上也不會有更多的肉。必須有人把肉給領養老金的人，這才是真正的福利政策，而不是平等主義的說辭。⁸

如果這個國家背後已經有了長時期的中產階級發展，如果已經建立了可觀的私人財產，如果我們有因為知道子孫可以繼承誠實辛勞和做生意所累積的財富之動機，那麼，我表達的方式可能不會這麼極端。換句話說，要是我目前是法國公民的話，可能會支持重分配稅收的措施，雖然以西方世界的公民身份來看，我還是認為瑞典所實施的重分配極端形式太過火了。我認為，即使在瑞典，這種過度的做法也會成為使人們降低表現、以及阻礙健康的財富累積之反動機。但是，既然我不是法國人或瑞典人，我便必須針對匈牙利目前的問題。

此處，我想強調我在第一章所說的。我們還只是在剛開始重建中產階級的過程。議程上主要的項目，還是要使私人部門中每一個參與者能夠安心，要向小農、開始現代化的農民、私人工匠，以及大私人公司的業主保證：「不要怕，往前衝，累積財富吧！」政府必須向這些人保證，不會將他們的東西充公，無論如何也不會取走他們「多出來」的所得，因為政府希望他們能將多餘所得自願花在投資上。政府必須使他們相信，既不會欺騙他們的繼承人，也不會迫使他们必須採用各種技巧來逃避遺產稅。而且必須明示，政府不再鼓勵他們基於子孫反正無法繼承的理由，而由自己把所有的財富花用殆盡；政府必須宣佈，寧願見到朝代的創建者，而不想看到貪婪短視的冒險家，因為前者會變成真正穩固的企業家。

雖然表面上我們好像脫離了福利政策的主題，前面所說的其實是很重要的。所有塑造輿論和所有在國會中對於國家金錢事務有最後決

定權的人，都必須瞭解，社會煽動和平等的言論，取代不了依照預算所能承受的真實物質負擔而制定的具體福利政策行爲。

三、強勢政府之必要性

唯有強勢政府才能實施本研究描繪出來的經濟政策。這適用在主要於第一章所提出的逐步改變，以及第二章所描述的大手術。許多先前的工作需要堅定和力量。政府必須平息本身各階層阻礙私人部門發展的傲慢態度；必須嚴格執行國會所設定之財政和貨幣政策，並確保財政和薪資原則。

當然，「強勢政府」有好幾種。伴隨著大動亂和市場經濟加強的穩定化計劃，也可以由壓迫性的極權政府，如智利或是土耳其之類的軍事獨裁來實施。我們可以提出嚴格的經濟論點來加以辯駁：無論是皮諾契特（Pinochet）或是政變之後圍繞在他身邊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都不會在目前擁有龐大政府部門的匈牙利經濟中輝煌騰達。但是，除了經濟論點之外，我並不準備以**政治和倫理**的理由來考量這項變數。不過，不管其力量來源在於壓迫性措施的政府所可能成就的經濟成果爲何，我都強烈反對爲穩定化付出這樣的代價。^①

另一種可能性是，力量來自受人民支持的政府，這種政府經由自由選舉被賦予真正孚人望的委任，以有力的手來矯正經濟。且讓我沿用第二章的意象。我們甚至不用取得病人的許可就進行手術，只要將病人麻醉，做醫生認爲該做的就是了，但是，文明社會不容許這種做法，醫生必須向病人解釋，爲什麼需要動手術，其中有什麼危險，最後要徵得他的同意才能進行手術。在我心中，這才是我所建議的手術唯一被許可的路徑。手術是一定要做的，但是，做爲病人的匈牙利人

民，必須透過他們所選出的代表來表達他們的同意。

猜測未來匈牙利政府的組成不是本研究的目的——這已超出我的研究範圍。在這方面我只有一點意見。本研究所討論的政治、經濟和倫理衝突，也反映在每一個黨派和運動之內，比如說個別黨派中存在著小派別和團體，或是特定黨派計劃中時常出現的自我矛盾和前後不一致的形式都是。我們可以發現，正反的觀念同時受到鼓吹，或是極爲重大的矛盾卻被含糊其辭。然而，這些矛盾衝突確實存在，而且經濟益加困難，這種情形便會更加惡化。

在一般俗語和政治學上，結合這個觀念有兩種用法。狹義的來講，是指在一政府中相互結合的某些黨派或政治力量。廣義的含義則是指，某些黨派、運動、團體或社會力量之間，從事共同任務的某種合作形式。（在西德，艾登諾爾〔Adenauer〕和爾哈德〔Erhard〕有所結合，透過基督教民主黨私人部門和同業工會運動的協議，禁止工會運用其罷工的權利。）我是採「結合」這個字的廣義，不涉及結合中何種力量將在政府中扮演直接的角色，以及哪一方將處於政府之外，但是並不加以阻礙。後者可以做爲具有建設性的反對黨，但是，並不在基本的經濟事務上尋求衝突。

至於匈牙利未來的結合（廣義而言），需要一個對自己的未來有信心的真正有企業精神的私人部門。但是，這個私人部門不應該面對一個因害怕反對力量，而處處在每一個機會設下障礙的政府官僚。而且不應該使產業界的工人感到因爲變革而有所損失，且不得不採取和同業工會競爭的行動，而咬牙切齒地和政府政策作對，經濟轉型的成功端賴於可能發生於這些勢力之間的衝突是否能溝通，並達成和平的協議。

⑩

本研究嚐試總結在未來結合（狹義及廣義而言）中的參與者意見必須

一致的工作。如果他們成功了，並且信守協定，那麼這個國家的經濟便有希望走上正途，並且使發展加速進行。如果他們失敗了，結合也將瓦解，如果一開始或是經過短暫的特赦時期，就遭到攻擊或摧毀，那麼，經濟將繼續無望地向下滑。

註 釋

①在美國的政治語言中，「自由」（相對於「保守」）這個辭有特別的意義。本書對「自由」這個字的使用，是採歐洲政治和知識的傳統。其意義在下面幾句話中很清楚地表示出來，第一章中也是採同樣的意義。

②Kulak這個俄文代表富農。

③如同前面的一些例子，在此我也不認為參考西方的例子是合適的。光是說：「那好，即使在美國和好幾個西歐國家，小農也是受到補助的。」是不夠的。這是個相當具爭議性的問題，許多人認為，這是西方國家經濟政策的缺失而非優點。很可能有些國會議員支持補助，不過是想吸引更多的選票。我們也可以想到匈牙利的國會議員也會受到同樣考量的刺激。但是，既然我不想競選國會的席位，因此大可以暢快地說出我心裡的話。

我所說的轉型期間的人道主義需求也可以用在這裡。匈牙利農業的現代化必須在人道的環境下進行。譬如說，如果有一新型的小農場將要退出農業合作社，延長非重複性的經濟援助，或是特別的長期信用，當做是「開始的動力」是說得通的，這可以使新農場不致負債。

但是在稍後的階段，私人農場應該暴露於像其他私人部門所運作的相同嚴格的市場條件下，不應該給予這些農場永久的政府補助。他們應該可以取得短、中、長期信用，但是，這些信用的條件不應該比用於私人部門其他領域的條件來得寬鬆。

很可能長期而言，小公司要比沒有效率的合作社更具有生產力。如此，小公司就能生存。但是，也可能設備差的小農場落在中小規模現代化的農場之後，而

且如果沒有政府干預的幫助，小農場可能會失去地盤。在此情況下，應該給予這小農暫時的通融援助，直到他和家人找到更適合他們的新生活方式。但是，我們無法接受的情況是，社會中具有工作能力的某一階層，或是某一種經濟形式，只有透過政府預算的援助才能生存。

❶ 我不想建議同業工會反對積極參與塑造國家經濟政策。但是，我確實要強調，未來個體層次的工作是相當龐大的：這些工作包括地方對員工權利的保障、爭取較佳的工作條件、形成對抗傾向於濫用權力的地方經理人之聯合陣線，以及消除公司內部的緊張關係等。也許在這方面可以做的要比目前已經做到的多得多。而且，還有其他問題是需要保障整個行業的利益，而這也需要工會的積極參與。但是從上面的情況看來，所有這些工作無法簡化到單一目標，也就是提高重分配的要求，以及其個別行業的加薪要大過別人所獲得的加薪之要求。如果所有的行業都這麼做，便會導致我所警告的情況：工資原則將會鬆散，而且工資一價格的螺旋式上升將會重新開始。

❷ 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架構內，超額勞動力的吸收，主要是透過所謂的強迫成長的特別成長策略來確保的。這種策略的缺點很多，例如資源的浪費、經濟結構產生扭曲等。

如同上面所強調的，我們期望經濟成長能創造新的工作。但是，我們希望這是由和諧的成長政策所達成的，沒有數不盡的缺點和強迫成長的扭曲。

在此我只想指出成長這個問題的理論面，因為篇幅的限制，不容我細述。

❸ 匈牙利人採用了一個類似德語Sozial-politik的術語，即英美作者中所稱的福利政策。

❹ 見I. Kemény和Zs. Ferge (1988, 1989) 以及O. Solt (1985) 等人開創性的作品。

❺ 在這裡，我要重複先前有關社會正義準則所提的一點。社會正義首先和最重要的要求是，最窮困的階層之處境能有持續的改善。於是，這就刺激了較佳表現及更多企業的動機。而最有效率、最勤儉和最幸運的人，能夠累積龐大財富，這種刺激是不可或缺的。

❻ 壓制性的集權制度更能有效的做到總體調節的工作，以及穩定措施的執行，這

種看法非常流行。這是錯誤的：對四十四個集權制度和三十九個民主制度進行比較的結果，證明這些制度中沒有哪一個比其他的更善於解決這些問題。見S. Haggard 和R. R. Kaufman (1989)，63頁。

- ⑩討論支持取代集權政權的新民主之脆弱性的研究，已有人將之編纂成一有價值的選集（見J. M. Nelson [1989]）。這些研究是根據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經驗。在許多方面，東歐的情形卻不相同，但是，還是可以找到相似之處，即爲了在政治和經濟上穩定新的民主，一些基本社會團體之間必須意見一致。

後 記

雖然我是以第一人稱來寫作本書，但是個人相信，從頭到尾我都努力保持客觀的態度。說完了我必須說的事情之後，我希望再加一點個人的註記。目前匈牙利爆發了一股傳記潮，我並不希望再加入這個行列。但是，我無法避免在最後的註釋中加入一兩點傳記式的細節。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當時我是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一名年輕的研究員，領導著一小群人著手改革匈牙利經濟的建議。由許多方面來看，當時所編纂的一百五十多頁材料中，可以預見到後來在一九六八年的改革中，成為具體化的觀念。回想起來，我認為那份建議相當天真，即使曾經全部加以運用實施，也必然無法解決任何基本制度的問題。

三十三個年頭過去了，其後我從未再起草另一份全面經濟政策的建議。我有些研究產生了一些有關經濟政策的結論，而且偶爾也會提出局部的建議，但是，我再也沒有寫過全面的計劃。

過去幾十年來，我一直認為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現存的社會主義」，如同在社會主義圈子和社會主義國家之外所提到的），以及瞭解並解釋這個經濟制度如何運作，是我的神聖使命。我把自己看作一個活生生事實的觀察者和分析家。寫下這本冊子，不過是踏出我將繼續認定是我的使命這種自定角色的一小步。在這研究中，我改變了角色，因為這是個獨一無二的歷史機會。經過了好幾十年，這似乎是匈牙利第一次出現

一個我能很有自信提出我的意見的國會和政府。而且未來的國會和政府必須在千辛萬難之中開始工作。因此，要是我的心中有了一些建議，這正是我必須提出來的時候。

我試著以很快的速度來寫這份研究，當然這不能做為書中任何錯誤的藉口。總而言之，這次我並沒有做到時間較為充裕的研究中所許可的多次原文修訂。雖然文章寫得很快，但是思想本身卻不是即興而起的。這些問題我已經思考了許多年，而這些想法和我幾十年來所做的研究也有密切的關係。這是源自於我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以及我想要把該制度和過去以及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各種環境加以比較的嚐試，這本小書是「經濟政策小冊子」，卻是一位作者過去花了幾十年，而且希望未來也將精力集中於此的科學研究成果。

在從事早期（和未來）研究範疇時——在描述性—解釋性，亦即所謂實證科學的理論作品——我總是免不了要問自己，我的主張有什麼**預測力**。如果到目前為止發生了這些事，我們能預期未來會發生什麼？這個問題總是縈繞著我，幾乎像是個揮之不去的反射作用，而且我問自己：這項研究所提議的這些會通過嗎？當然，那些和我討論過這些問題的人，也會提出同樣的疑問。

我不知道。我並不存幻想。我知道目前有強大的力量提出反對實現這些理想的意見，我知道在等待實現這些議案所需要的脆弱結合的危險。但是，這次建議還是有機會的。我希望我們不致錯過了這個機會。

參考書目

- Alchian, Armen A. and Demsetz, Harold. 1973.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no. 17 (March).
- Antal, László. 1979. "Development—with Some Digression: The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in the Seventies." *Acta Oeconomica* 23, nos. 3~4: 257~273.
- Antal, László. 1985. *Gazdaságirányítási és pénzügyi rendszerünk a reform útján* (The Hungarian System of Economic Control and Finance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Barone, Enrico. 1908. "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st State." In F. A. Hayek (1935), pp.245~290.
- Bársony, Jenő. 1989. "Hol tart a tulajdonreform ügye?" (Whither the Ownership Reform?) *Közgazdasági Szemle* 36, no. 5: 585~596.
- Bauer, Tamás. 1976. "The Contradictory Position of the Enterprise under the New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15, no. 1 (Fall): 3~23.
- Békesi, László. 1989. "Jövedelmi reform—elosztási ígéreték

- nélkül” (Reform of Incomes—without Promise of Distribution). Conversation between Iván Wiesel and László Békesi. *Társadalmi Szemle* 44, no. 7: 16~23.
- Belyó, Pál and Dexler, Béla. 1985. *Nem szervezett (elsősorban illegális) keretek között végzett szolgáltatások* (Services supplied within a Non-Organized, Mainly Illegal Framework). Manuscript. Budapest: Szolgáltatáskutatási Intézet, KSH.
- Bergson, Abram. 1948. “Socialist Economics.” In H. S. Ellis (ed.),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Homewood, Ill.: Irwin, pp.1412~1448.
- Brus, Wlodzimierz. 1972. *The Market in the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Economic Management. 1988. “A szocialista piacgazdaság megteremtése: Tézisek a gazdasági reformkonceptiót kidolgozó munkabizottságok számára” (Crea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ses for the Committees Working Out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Reform). *Figyelő* (December 8), pp. 1 and 17~20.
- Csoór, Klára and Mohácsi, Piroska. 1985. “Az infláció tényezői, 1980-1984” (The Main Factors of Inflation, 1980-1984). *Gazdaság* 19, no. 2: 21~39.
- Demsetz, Harold. 1967.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no. 2 (May): 347~359.
- Domar, Evsey D. 1987. *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 An*

- essay on Isms*. Mimeographed. Cambridge, Mass.: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473).
- Erdős, Tibor. 1989. "Átgondolt gazdaságpolitikát! A külső és a belső egyensúly, a gazdasági növekedés és az infláció problémái" (A Well-Considered Economic Policy: The Problems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Equilibrium, Economic Growth, and Inflation). *Közgazdasági Szemle* 36, no. 6: 545~557.
- Ferge, Zsuzsa. 1988. "Gazdasági és szociális érdekek és politikák"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rests and Policies). *Gazdaság* 12, no. 1: 47~64.
- Ferge, Zsuzsa. 1989. "A negyedik út" (The Fourth Way). *Valóság* 32, no. 4: 7~19.
- Fisher, Irving. 1942. *Constructive Income Taxation*. New York: Harper.
- Furubotn, Erik G. and Pejovich, Svetozar (eds.). 1974. *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 Gábor, István R. 1979. "The Second (Secondary) Economy: Earning Activity and Regrouping of Income outside the socially Organized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cta Oeconomica* 22, nos. 3~4: 291~311.
- Gábor, István R. 1988. "Lépéskényszerek és kényszerlépések: Jegyzetek kétévtized kormányzati munkaerő- és bérpolitikájáról" (Being Forced to Take Steps and the Forced Steps: Notes on Governmental Labor and Wage Policy over Two

- Decades). *Közgazdasági Szemle* 35, nos. 7~8: 803~807.
- Gábor, István R. and Galasi, Péter. 1981. *A "második" gazdaság: Tények és hipotézisek* (The "Second" Economy: Facts and Hypothese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Gábor, István R. and Kővári, György. 1987. "A munkaerőpiac állami koordinációja és a bérszabályozás" (The State Coordination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Wage Regulation). *Gazdaság* 21, no. 4: 48~58.
- Haggard, Stephan and Kaufman, Robert R. 1989. "Economic Adjustment in New Democracies." In J. M. Nelson (1989), pp.57~78.
- Hankiss, Elemér. 1989. *Kelet-európai alternatívák* (Eastern European Alternative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Hayek, Friedrich A. (ed.).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Hayek, Friedrich A.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uhász, Pál. 1981. "Társadalmi csoportok együttműködése az első, második és harmadik ökonomiában" (Cooperation of Social Groups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Economies). *Fogyasztói Szolgáltatások*, no. 4.
- Kidric, Boris. 1985. *Sabrana dela*. Beograd: Izdavacki Centar Komunist.

- Kis, János. 1986. *Vannak-e emberi jogaink?* (Do We Have Human Right?) Budapest: Független Kiadó.
- Kolodko, Grzegorz W. and McMahan, Walter W. 1987. "Stagflation and Shortagefl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Kyklos* 40, no. 2: 176~197.
- Kornai, János: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rnai, János. 1990. *Vision and Reality, Market and State: New Studies on the Socialist Economy and Societ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Wheatsheaf, and Budapest: Corvina (forthcoming).
- Kornai, János and Matits, Ágnes. 1987. *A vállalatok nyereségének bürokratikus újraelosztása* (The Bureaucratic Redistribution of Firms' Profi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Kovács, János Mátyás. 1990. "Reform Economics: The Classification Gap." *Daedalus* 119, no. 1 (Winter): 215~248.
- Laki, Mihály. 1989. *Alternatívák és az alternatívok: Az új politikai szervezetek gazdasági nézetei* (Alternatives and the Alternatives: The Economic Ideas of the New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Manuscrip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Információs Szolgálat, August 4.
- Lange, Oscar. 1936~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 nos. 1~2 (October 1936

- and February 1937): 53~71 and 123~142.
- Lavoie, Don. 1985.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ngyel, László. 1989. *Végkifejlet* (Denouemen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Liberman, Evsey G. 1972. "The Plan: Profit and Bonuses." In A. Nove and D. M. Nuti (eds.), *Socialist Economics: Selected Readings*, pp.309~318.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 Mises, Ludwig von. 1920.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F. A. Hayek (1935), pp.87~130.
- Musgrave, Richard A. and Musgrave, Peggy B. 1980. *Public Fi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McGraw-Hill.
- Nelson, Joan M. (ed.). 1989. *Fragile Coalition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New Brunswick and Oxford: Transaction Books.
- Niskanen, William A. 1971.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
- Nozick, Robert.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 Péter, György. 1954a. "A gazdaságosság jelentőségéről és szerepéről a népgazdaság tervszerű irányításában" (On the Importance and Rol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in the Planned Control of National Economy). *Közgazdasági Szemle* 1, no. 3:

300~324.

- Péter, György. 1954b. "Az egyszemélyi felelős vezetésről"(On Management Based on One-Man Responsibility). *Társadalmi Szemle* 9, nos. 8~9: 109~124.
- Péter, György. 1956. "A gazdaságosság és jövedelmezőség szerepe a tervgazdaságban I~II" (The Rol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Profitability in the Planned Economy I~II). *Közgazdasági Szemle* 3, no. 6: 695~711, and nos. 7~8: 851~869.
- Pető, Iván . 1989. "Polgárosodás, restauráció nélkül"(Embourgeoisement without Restoration). *2000* (August), pp. 5~8.
- Petschnig, Mária Zita. 1986. "Inflációs feszültségek és megoldásaik" (Inflationary Tensions and Their Solutions). *Gazdaság* 20, no. 4: 38~51.
-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chs, Jeffrey D. and Lipton, David. 1989a. *Exchange Rate Convertibility*. Mimeograph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Sachs, Jeffrey D. and Lipton, David. 1989b. *Money and Credit Policy to Achieve Low Inflation*. Mimeograph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Sárközy, Tamás. 1989. "Egy törvény védelmében I~II"(In Defense of a Law I~II). *Figyelő* (August 24 and 31), p.3.
- Schroeder, Gertrude E. 1988. "Property Rights Issues in Eco-

- conomic Reforms in Socialist Countri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1, no. 2 (Summer): 175~188.
- Scitovsky, Tibor. *Welfare and Competition*. 1971. Homewood, Ill.: Irwin.
- Sen, Amartya. "Freedom of Choice: Concept and Content." 1988.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 nos. 2~3 (March): 269~294.
- Solt, Ottília. 1985. "Szegények pedig nincsenek" (There Are No Poor). In G. Havas, J. Kenedi, and Gy. Kozák (eds.), *Isten éltesen Pista: Kemény István 60. születésnapjára* (God Bless You, Pista: On the 60th Birthday of István Kemény). Budapest: Samizdat.
- Stiglitz, Joseph E. 1986. *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2nd ed.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Storey, David J. (ed.) 1983. *The Small Firm: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London and Canberra: Croom Helm,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un, Yefang. 1982.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in Theoretical Issues." In K. K. Fung (ed.), *Social Needs versus Economic Efficiency in China*. Armonk, N. Y.: M. E. Sharpe (works originally published between 1958 and 1961).
- Széchenyi, István. 1979. *Hitel* (Credi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Szelényi, Iván. 1986. *Szocialista polgárosodás* (Socialist Embourgeoisement). Manuscript. October.

- Szelényi, Iván. 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 With the contribution of P. Manchin, P. Juhász, B. Magyar, and B. Marti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Tardos, Márton. 1980. "The Role of Money: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Enterprises in Hungary." *Acta Oeconomica* 25, nos. 1~2: 19~35.
- Tardos, Márton. 1988a. "A gazdasági szervezetek és a tulajdon"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the Question of Ownership). *Gazdaság* 22, no. 3: 7~21.
- Tardos, Márton. 1988b. "A tulajdon" (The Question of Ownership). *Közgazdasági Szemle* 35, no. 12: 1405~1423.
- Taylor, Fred M. 1929.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 no. 1: 1~80.
- Tímár, János. 1985. *A társadalmi újratermelés időalapja* (The Total of Man Hours Available for Social Reproduction). Manuscript. Budapest: Marx Károly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Egyetem.
- Várhegyi, Éva. 1989. *Results and Failures of Monetary Restriction*. Mimeographed. Budapest: Pénzügykutató Rt.
- Vissi, Ferenc. 1989. "Infláció a gazdaság stabilizálásának időszakájában" (Inflation during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Economy). *Gazdaság* 23, no. 1: 5~28.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邁向自由經濟之路：匈牙利社會主義制度的轉向
／雅諾斯·科奈 (Janos Kornai) 著；王健全，
黃美齡譯。--初版。--臺北市：遠流，民83
面； 公分。--(自由主義名著譯叢；11)

譯自：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 the
example of Hung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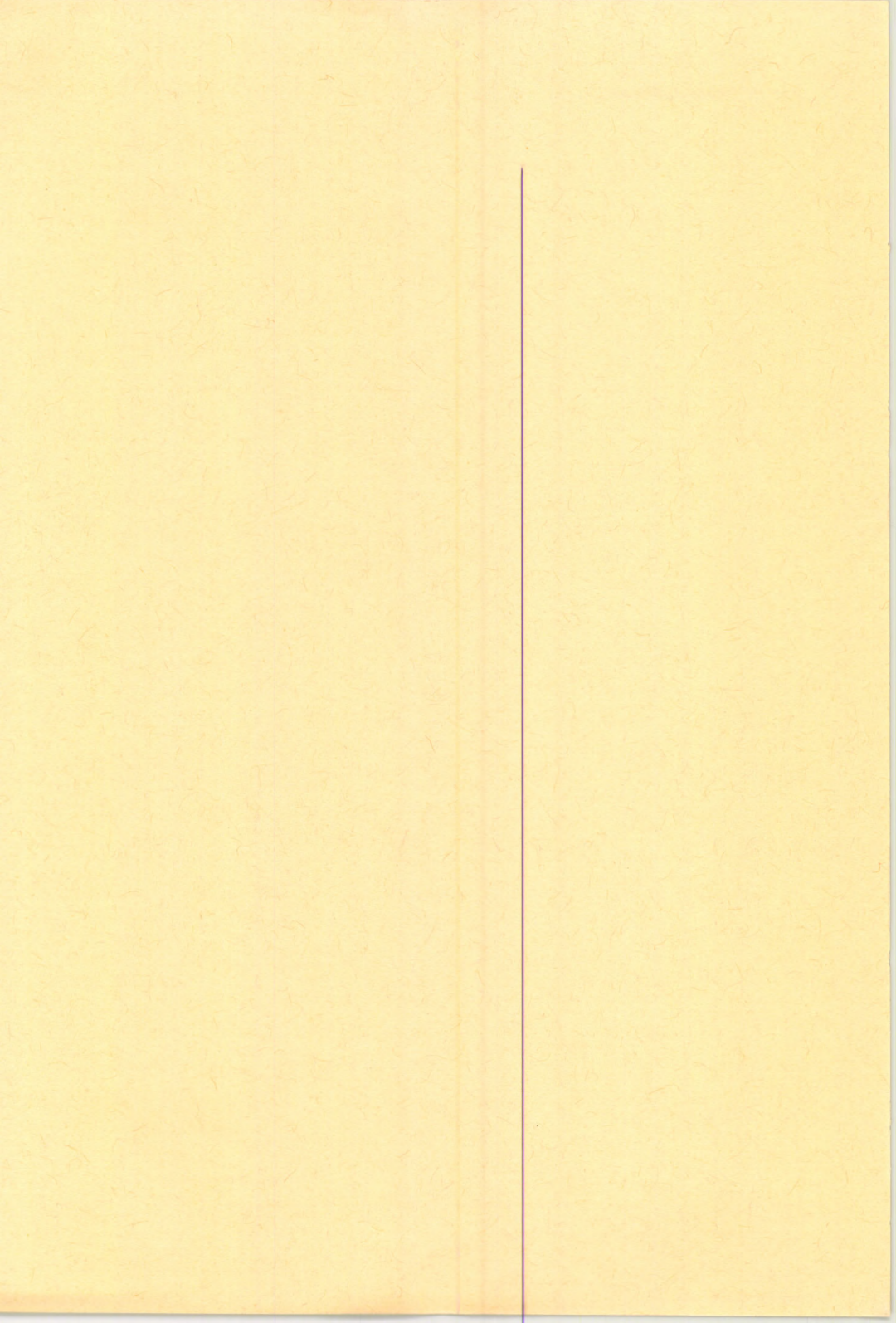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32-2270-1(平裝)

1. 經濟 - 匈牙利

552.442


83003677



【譯者簡介】

王健全，一九五九年生於彰化。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美國普渡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工業技術學院企管系兼任副教授。著有《政府研究發展租稅獎勵工具與業者反應之探討》等專論，並譯《點石成金》一書。

黃美齡，一九六四年生。清華大學外語學士、輔仁大學英文碩士。目前服務於貿易公司，並兼任輔仁大學公關室英文祕書。譯有《人民與國家》（遠流）、《資本主義與自由》（久大）。

 遠流出版公司

ISBN 957-32-2270-1 (552)



9 789573 222705

L7611

NT\$200